

韶關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韶关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一个忠党爱国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

- 缅怀邓重行同志革命的一生……………莫远声等(1)
- 粤北的“全国优秀教育世家”……………段吉榜(16)
- 沈秉强的一次传达报告……………古 衡(32)
- 阳山县土改工作情况点滴……………饶纪家(41)
- 对新丰县实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忆……………张 弘(58)
- 连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南杰(67)
- 接管旧税务,开办新税务……………何 湘(80)
- 韶关市、县城镇储蓄发展纪略……………徐伟坚(84)
- 我市人民购买公债和国库券概况……………徐伟坚(98)
- 我市发行企业债券情况综述……………徐伟坚(105)
- 简述粤北棉纺工业的发展情况……………冯东廷(107)
- 韶关三个棉纺厂选址的前前后后……………冯东廷(114)
- 粤北区直属机关肃反运动概述……………田和平(122)
- 轰动全粤的“大暴动”
- 乐昌平定土匪暴动经过……………高鸿丹整理(128)
- 记解放乐昌时的几件事……………张 艺(147)
- 全歼空降于粤北的蒋帮特务……………张惠全(156)
- 解放初我市宗教界的一些情况……………田和平 刘国丽(160)
- 抗战时期粤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廖桂洲(164)
- 对北江农军学校的姐妹校——南韶连
- 政治讲习所的回忆……………郑拔夫(174)

原仲元中学蒙难记·····	邵明耀(189)
我参与“枫连线”工作的片断·····	谢琼孙(191)
韶关沦陷后的“枫连救济线”·····	邵明耀(197)
一个居台同胞在抗日前后的爱国事迹·····	谢琼孙(199)
南岭煤矿的春秋·····	刘玉泉(208)
乳源瑶、畲族房屋及桥路建筑·····	许化鹏(214)
对武溪公园的回忆·····	李竹园(221)
补白资料：长江商团军·····	刘森华(223)
鸣谢·····	编者(224)

一个忠党爱国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

——缅怀邓重行同志革命的一生

莫运声 王江 赖茂生

盘明 叶树青 司徒柱

邓重行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一生光明磊落，勤劳勇敢，忠党爱国，廉洁奉公，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正如悼词对他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邓老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然而每当我们这些曾在他领导下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战友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无不深深地怀念着他。

邓重行，又名邓慈，1908年9月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官窑大榄乡，17岁起当店员，21岁（1929年）办起精制樟脑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天真药学社），以维持生计。在一批进步人士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于193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弟弟邓楚白（原中共北江特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母亲郑宝，妹妹邓雪英，堂弟邓子华，以及弟媳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1935年秋，经邓楚白介绍，邓重行收留了因在东莞县从事革命活动暴露了身份的中共党员王汝能在其家隐蔽。是年

冬，在王汝能的带动下，在大树社创办了不收学费的知行农民子女夜校。从此，大榄乡有了党的组织。

1936年秋，邓重行任家乡奎光小学校董事长，聘请革命青年和中共党员为教师，中共南（海）顺（德）工委成员王义昭（现名王仕钊）为校长，并用家庭手工业——生产樟脑的收入，发展农民夜校8所，为乡村400多名失学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并向农民子弟宣传党的抗日爱国思想。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邓重行又邀请由中共领导的广州艺协剧团，到大榄乡演剧数天，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和开展向八路军献军募捐活动。同时，还组织了一次由奎光小学和8所农民夜校学生约600余人组成的抗日救国的化装大游行活动，取得了动员、教育群众起来抗日救亡的很好效果，于是大榄乡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1938年8月正式成立了乡党支部，使大榄乡成为南海县抗战爆发后最早建立中共组织的地区之一，而且又是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根据地之一，这与邓重行的热心支持和积极工作所分不开的。邓重行还动员了数名革命青年（大多是奎光小学教师）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这些同志后来为党的革命事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邓重行在开办学校和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受教育和锻炼，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革命才有出路。1938年9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邓重行在革命的征途上开始了新的旅程。

一、艰苦奋斗，创办《新华南》

邓重行入党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参加广东

省动委会政治工作队，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组织分配他到翁源三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的省党部、省政府及军方的机关都撤往粤北韶关，中共广东省委也随形势而北迁韶关，一时间韶关成为战时的省会，又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人口聚增。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办一个机关刊物——《新华南》（半月刊），并委派邓重行为《新华南》杂志社经理，负责筹办工作。邓接受任务后即从翁源三华前往韶关，找到罗沙巷（今和平路）8号二楼约30m²房屋，作为《新华南》社址，并把房屋打扫干净后，即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去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找到主编石辟澜同志。几天后，石辟澜也搬到《新华南》社来住。社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借来几件家具，两人打地铺过夜，因陋就简，开始工作，石辟澜负责编辑和写文章，邓重行负责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不久，又调来了司马文森。本社的工作包括写稿、组稿、编辑、印刷、校对、发行等都是他们三人自己干。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新华南》创刊号于1939年3月28日正式出版发行。由于《新华南》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且因其笔锋犀利、战斗性强，在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孤立反共顽固派，抗击日寇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华南人民抗日救亡的指路明灯。《新华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的发行，每期都被抢购一空，由于刊物流通遍及粤、桂、赣、闽、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寻找借口，进行破坏和阻挠，甚至几度勒令停刊，指令各印刷厂，不准给《新华南》印刷。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邓重行同他们进行据理力争。为了保证《新华南》能按期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

的需要，邓重行克服重重困难，多次冒险去湖南等地求助别的厂家进行印刷，从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新华南》的阴谋。

二、无私奉献，创办韶关（即原曲江）“工合”

在《新华南》刊物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印刷十分困难的时候，东南“工合”办事处派苏俊从赣州南下韶关，找到邓重行、石辟澜，商议筹办韶关工业合作社的事情，说及中央已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美国友好人士艾黎和斯诺是创始人，各地成立“工合”办事处或事务所；“工合”业务独立自主，实行垂直领导和管埋，不让国民党的党、政、军插手，以防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包办，排斥异己，贪污舞弊等；艾黎和斯诺建议我们在韶关把工业合作社搞起来，认为只要有技术、有原料、产品有销路，和有利于抗战就可以成立工业合作社，并获得“工合”总部的贷款和支持。于是，经三人研究后，很快就把筹办印刷、樟脑、机器三间工业合作社的方案确定下来。后来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指派邓重行暂时负责筹措工作。不久，又调来一批党员干部，分派邓重行负责筹办印刷社；殷杰、邓子华负责筹办樟脑社；钱树标负责筹办机器社。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先后办起曲江樟脑社、曲江印刷社和曲江机器社。这是广东建立得较早的三间工业合作社。

印刷社建在河西一块晒布场。他们自己动手盖起杉木结构竹织批荡的厂房、宿舍，共有300平方米。开始筹建时，一无字粒，二无技工，困难重重。邓重行花钱疏通《中山日

报》（国民党办的日报）的几个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助熔铸字粒，先后输送出来的字粒约有二千磅，于是解决了字粒问题。同时，又动员《大公报》、《中山日报》等几家报馆的一些技术工人来印刷社工作，解决了技术劳力问题。之后，又克服了诸如物资奇缺等各种困难，使《新华南》能自己印刷，自己发行。此外，还承印了30多种进步报刊，以及印了党组织不少重要文件。工余之暇，同志们都聚集在一起读书、看报，唱《救国军歌》、《游击队员之歌》等抗战歌曲，或组织球赛，因生活愉快，大家把印刷社称为《印刷工人之家》。后来，《新华南》社也从罗沙巷迁到印刷社附近。

樟脑和薄荷脑是军需民用的医药品和化工原料，战前，它的产、销基地在上海、原料基地在江西。上海沦陷后，产、供、销渠道被切断，因而全国各地都缺少精制樟脑和薄荷脑的供应。经党组织同意，邓重行把自己战前在家乡南海大榄村开设的一间樟脑家庭手工业作坊，连同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经验等，全部无条件地奉献给党。他把机器设备、技术工人分三次从家乡妥善地转移到韶关，在河西五祖路大塘边租用一间约60平方米的民房，作为工场、宿舍，办理了组社手续和申请贷款，因陋就简地建立起“曲江樟脑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生产和经营，这时期，邓重行担任印刷、樟脑两社的理事主席。

由于当时韶关是个落后的山城，没有工业，要组建一间机器生产合作社，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料，乃至简单的工具，当地均全无供应，又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日机在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桥梁，城区到处狂轰滥炸，所需的物品要到沦陷区或半沦陷区的广州、三水等地采购，困难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邓重

行、钱树标等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把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工具等很快地购运回来，在东河坝的一块荒芜之地上，建起一座有500平方米的杉木结构、竹织批荡的厂房和宿舍。创办起“曲江机器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生产和经营。当时，社内有翻砂、打铁、铸铜、铸铁、金属加工等功能，还有车床、刨床、钻床以及各种修理机具等设备，一般小型的机械零部件自己可以设计、制造，对各种汽车、轮船、农具，民用机械、军用机械等都可以进行修理。基本能解决当时韶关的军需民用的工业机械用品问题，充实了韶关抗战的工业实力。

由于印刷、樟脑、机器三间合作社善于管理，经营有方，生活福利安排得又好，各方面都搞得有声有色，因而，社员积极性很高，也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钦佩和支持。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合”总部对此也很重视和支持，1940年2月中共中央直接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来韶关视察“工合”工作、艾黎也从重庆专程赶来韶关视察。邓重行遵照党的指示，代表省委热情迎接艾黎来韶视察指导“工合”工作。艾黎视察后，对三间“工合”所取得的成绩很满意，赞扬印刷社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建起来又顺利地投入生产，而且印刷了这样多对抗战有利的刊物，工作做得很好。对樟脑社生产的樟脑饼和薄荷脑也大加赞扬，认为该产品价值高，销路好，对抗战有利。艾黎认真观看了这些产品和生产流程后，夸奖了韶关“工合”艰苦创业的精神，表示要大力支持韶关“工合”。他当即批准向樟脑、印刷两社各增加贷款3万元，机器社4万元。艾黎因此与韶关“工合”和邓重行本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参与一些国际活动时，大都事先来韶关视察、听取邓重行创办“工合”的经验，了解韶关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然后再在国际会议上作宣传和募捐。

1941年至1942年，艾黎和美国进步人士卡尔逊将军也曾多次来韶视察，并受到邓重行的热情欢迎。由于艾黎和斯诺夫妇以及卡尔逊将军在国际上对此进行宣传，使韶关“工合”闻名于中外。深得海外华侨与世界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有的把捐款指定汇给韶关“工合”，有的与韶关“工合”建立了友好交往，韶关“工合”是全国“工合”的组成部分，它成为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渠道之一，这与邓重行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所分不开的。

由于邓重行创办的韶关工业合作社、旗帜鲜明地为抗战服务，因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也都害怕和仇视“工合”。然而，不少仁人志士却走到“工合”里来，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事业而忘我劳动。在韶关工合的带动下，从1940年至1942年，南雄、始兴、仁化、乐昌、连县等县也先后办起工业合作社，韶关的发展尤为突出，她先后办起樟油、农具、榨油、面粉、缝纫、制鞋、织布、油墨、锯木、手工艺、家具、营造、纺织、电镀、皮革、烟卷、印刷、装钉、牙刷、五金、铁器、文具以及工业合作联社等20多间合作社，还有一个樟脑社农场，一间荣健学校，一个专门发电的机器工业合作社。“工合”事业的迅速发展，为取得粤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广筹资金，支援抗战

邓重行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坚持为革命开展党的地下财经工作和组织工作，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地方革命斗争。

如，由邓重行等同志创办起来的机器合作社，能自行设

计制造油墨机、榨油机、制糖机、面粉机及各种农具等，还能大修小修各种机械、军械、汽船、汽车等。这在当时是韶关最大的企业，且又独家经营，既有效地解决工业机械的军需民用，支援了抗战，又为党筹措了活动经费，社里把月中所获纯利的55%上交党。

樟脑社的主要产品是樟脑和薄荷脑，（从江西吉安购进原料进行加工），产品投放市场后畅销全国，这既解决军需和民用，又获厚利上交党。从1940年8月每月提取利润一万元，上交中共广东省委，从1941年2月起增加到每月为两万元。此外，还扩大再生产，建工场、宿舍、营业部，与此同时，不断改善社员生活，除给社员分红外，还为党提供了几笔数额较大的款项：

（一）1942年初奉中共中央指示，接待我党从香港沦陷区抢救脱险出来的爱国人士，中转疏散到桂林，重庆等地，费用共三万元。粤北省委事件后，1942年下半年樟脑社奉令把物资疏散到桂林，先后将价值20多万元物资运去桂林销售。把所得的款项全部上交省委。

（二）前北江特委驻清远县城，是新建机构，经济非常困难。1941年，邓重行即从樟脑社筹款五万元，（1）在清远上廓街开设一间茂昌旅店，作为特委与所属各县的联系点，（2）创办一间日产十篓火柴的《猴王》牌火柴厂，赚点钱维持特委机关的日常开支。（3）开设一间粉笔厂为中共地下党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作掩护。（4）与群众合作，在文洞开设一纸伞竹骨加工厂，作为与沦陷区广州进行贸易的据点。

（三）1940年，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邓重行从樟脑社集资7000多元光洋，在河西马停留购买到山地100多亩，兴建

房屋三座共360平方米，建立起“曲江樟脑合作社农场”（简称农场）作为中共北江特委革命据点。农场开办初期，由于同志们不懂得山田山地的耕作技术，种下去的水稻和其他作物都全部失收，连种籽都收不回。1941年，邓重行经北江特委同意从清远老区调中共党员赖茂生来农场负责管理，情况渐渐改变，后来每年都自给有余，直到解放。

农场虽然位于韶关市西郊6、7华里的荒山僻野，但由于农场地处粤北山区中心地带，又是我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我党我军重要的活动地点，粤北省委，北江特委，曲江中心县委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曾在农场召开过重要会议，研究部署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沟通北江特委与党中央、“南委”、香港分局和省委、以及湘南、赣南和广西党组织的密切联系；为革命斗争传递情报；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输送物资弹药，收留部队伤病员等；为粤北人民抗日保家和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勋。

1940年8月，中共北江特委分为前北江特委和后北江特委，邓重行还肩负着前北江特委和后北江特委以及省委的财经工作，他奔走于韶关、清远、三水、南海、英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党的财经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

1940年冬，邓重行受特委派遣，前往南海、三水前线和半沦陷区发展党组织，组建抗日游击队伍，在南（海）、三（水）、番（禺）沦陷区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委员。随后，邓又被分派回大榄乡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工委临时机构正设在邓重行的祖屋，工委先后组建了两个武装中队。“南三番”工委正式成立后，因是新建机构，没有经费，为了党的事业，邓重行这次又卖了两间房屋，把所得之款除部分用作修

还先父欠人的债务外，其余作为工委和武装队伍活动的经费，武装队伍因而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两个中队后来发展成为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

1942年粤北省委事件后，党中央指示，粤北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实行“三勤”，邓重行在险恶的形势下，仍坚守阵地，领导着樟脑社，印刷社和农场，坚持日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到1944年日寇向粤北进犯，形势紧张，省临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全面恢复党组织活动，并开展武装斗争。邓重行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战斗，在着手工业合作社和农场的工作时，于同年6月中旬参加了王炎光在农场主持召开的有关研究樟脑、印刷两社疏散撤退和配合特委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问题的四人会议，不料于6月22日深夜，我党领导下的韶关合作社整个系统，遭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邓重行等13人不幸被捕，在此之前，领导印刷社的北江特委书记李守纯及其爱人陈志良也已被捕入狱（6月19日）。

被捕的同志全部都关押在韶关“基庐”内，他们经受着严刑拷打的严峻考验，个个都表现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气概，从不吐露党的情况，特别是邓重行和李守纯，不管敌人怎样拷打，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对难友进行教育，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李守纯等3位同志在狱中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光荣牺牲。邓重行为此感到无比的悲痛，对敌人的残酷手段感到无比愤慨，于是在狱中更加坚持斗争。

自邓重行被捕入狱后，韶关整个合作社系统，除机器社和农场仍保存外，其余都全部解体。至于樟脑、印刷两社，因王××强要把它搬迁到广西梧州去，不到两个月，梧州却先于韶关沦陷，从而使这两个社的机器、财产全部丧失殆

尽，两社员工遂无依无靠，流离失所。

邓重行等同志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被家保释放的有李福海等，然而，邓重行却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作是《新华南》的重要人物不准保释，还欲解往重庆的“白公馆”去，其时因碰上日寇入侵韶关，整个“基庐”再度撤到江西“三南”，途中，邓和另外12名难友（6名中共党员，6名广州儿童剧团团员），被寄押在当时的国民党南雄县政府内，后又转押到江头长潭尾村。在此期间，邓重行一面鼓励难友坚持斗争，一面做看守人员抗日救国的思想工作，同时还帮助他们干磨米、挑水、打柴等杂务，渐渐地取得了他们的好感，于是，敌人对他们放松了看守，邓重行与其他同志一起，乘机机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越狱行动。经过一翻准备，他们终于在1945年3月4日黎明前集体越狱，成功地逃出了魔掌。邓重行越狱出来后，直奔北江特委驻地英德浣洸，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5年，日寇再度进犯粤北，整个粤北地区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简称“挺二”）司令官莫雄是我党统战对象，则退入小北江英德大湾圩驻扎，是时小北江尚未沦陷，浣洸是鱼米之乡，平时连阳一带均以此为货物转运集散之地。日寇占领大北江之后，浣洸成为敌后前哨，中共北江特委所在地。广西八步，湖南西南等县所需食盐均取道浣洸购进，山货、土特产品也集运浣洸销售，因此，浣洸人口一时骤增，经济甚为活跃。

在北江特委领导下，邓重行勇挑党付托的财经重担，为党筹措经费，于是办起了昌兴运输公司，上级委任李学林为经理，马秀居任副经理，以“挺二”为掩护，经营运输小北江的山货，土特产，运回食盐，往返于小北江以及北江至广

州之间。当时连江口大北江都是敌占区，过连江口要通过日寇封锁线，沿途关卡甚多、盘查甚紧，因此走这条水路必须意志坚强，灵活机智。不过路途虽险，但沿途关卡也有我地党同志在接应、斡旋。所虑的是美国盟机的轰炸扫射，因北江河是日寇占领区，盟机飞行员无法辨认是日伪船只还是民船、只要在北江河道上见到船艇就轰炸扫射。有一次，在横石附近遇空袭，船夫胡细虾当场丧生、马秀居低头伏地，子弹从头皮擦过，幸免于难。去洲心次数多了，日寇见河面上停泊的船只，大都是挂昌兴公司旗号的，怀疑是大官僚作后台或是共产党的，曾几次进行严格检查，邓重行因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且一表斯文，日寇认为他是老板而遭捆绑几次，但都因盘查一无所获，才作罢。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邓重行都身先士卒，亲临船前跟班指挥。后来为减少意外，把白天行船改为下午、黄昏和晚上行船，避免盟机的袭击；又从走洲心改道走清远、源潭线，如此两头变换，避开日寇的检查。因本钱少，只能自运兼办代运，收取运费，就是这样一直做到日寇投降前夕，在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交的款项若按今时币值换算，相当于购买20辆现在的东风牌大货车所需的钱，还有利于缓和湘、桂一带人民食盐的需要。此外，还在青莲开办了一间榨油厂，在英德锦潭办了一个北山硫铁矿场，在连县东陂买了3片大杉林，还砍下3000多条大杉木，运抵香港卖得16万港元，再将这16万港元购买5船盐运回广州出卖，得款30万港元，此款后由黄松坚如数上交给中共广东区党委。

邓重行善于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共同抗日。为发展壮大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他曾多次向“挺二”的莫雄求助武器弹药，以充实我党的武装力量，

莫雄都如数照给。如，1945年春，省委决定派邬强、李东明的北江支队北上翁源、英东，蔡顺发、邓楚白的西北支队北上英清边区，而这些地方均属莫雄的驻防地，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以东江纵队曾生的名义写信，派邓重行持信去大湾找莫雄，向其说明来意，邓说：“我这次来见司令官，是我们有两支队伍，快要进入贵军防地，怕产生误会，我们是抗日部队，和司令官友军一向友好相处，为了彼此配合共同对日作战，曾司令派我来拜会司令官。”莫雄表示欢迎，连声说：“你们来北江抗日真是求之不得，以后大家好好配合打击敌人。”临别时莫雄赠送了“七九”步枪的子弹一箱，手榴弹两箱。又如：一次邬强写信交由邓重行带三位同志到大湾找莫雄、求助提供“七九”枪子弹5000发，驳壳枪子弹500发，莫雄均愉快地照给，并派副官林先华押船护送到连江口交我游击队，以帮助粤北抗战。

抗战胜利后，1946年邓重行调往香港任《华商报》有利公司经理，中共香港工委财委会委员。

四、为政清廉、光明磊落

邓重行在那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历尽千难万险，创办工业合作社和昌兴运输公司、均赚到不少钱，且全都交给了党，而邓重行却自奉俭朴、过着艰苦的地下党的生活。

解放后，邓重行受上级安排，回内地任华南粮食公司经理，他遵照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按华南分局指示，迅速调来一个火车皮的光洋，给韶关开办北江区贸易公司。北江区贸易公司成立后，由李学林任总经理，胡达

任副经理。他们迅速组织收购大批粮食上调给华南粮食公司用来支前。为解决战后韶关人民食盐紧缺的困难，邓重行又迅速调来一整列火车食盐供应韶关人民，从而安定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使粤北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因而更加拥护党、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

邓重行不但在资金上和物资上大力支持韶关建立商业网点，发展山区经济，而且还亲力亲为。1950年春，他带领一批业务技术人员来韶关作指导，帮助北江区贸易公司先后建立起一批企业，如韶关的（当时叫曲江）粮食、食盐、土产、百货、花纱布、油脂等八大专业公司。从1949年底至1950年4月，韶关所属各县也在北江区贸易公司的带动和帮助下，也都先后建立起各县的贸易公司，开展经营业务。韶关八大专业公司成立后，也纷纷向下对口建立各县的专业公司，使国营商业企业在城乡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后来由于党内极“左”路线的影响，在各次政治运动中，竟把这样一位忠党爱国，廉洁奉公，为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了功勋的同志，作为怀疑对象进行无情打击，并受到不应有的处分。然而，邓重行同志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他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他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胸怀大局，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受一点冤屈，算不了什么。”后来他还说：“回忆往事，苦甜皆有。几十年来，我有过顺利的时候，也有过受挫折的时候，既享受过胜利的甘甜、也经历过失败甚至死亡的考验，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是右派，我都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革命的道路虽然是曲折

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加在邓重行头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得到平反。1981年，他被安排到广东省百货公司当顾问，1984年离休，享受厅级待遇，1985年《华商报》史学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1987年因患重病而辞去副会长之职，但又被聘为顾问，直到1989年7月4日因病重而与世长辞。为了纪念邓重行革命的一生，原广东省粮食公司同仁在追悼会上敬题挽联：

重在党业变私产以乐资党需所重伟大。

行遵党章处逆境而笃信党策其行光明。

（紧接第31页）

后继有人，他们的第五代，饶纲伟之子饶志东已在始兴县衍平小学任教。饶纲范之子饶智灵、女饶秀琴已分别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和汕头大学艺术设计系师范班，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便可继承祖辈的事业，走教书育人之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注：饶振澜《始兴中学同学录》序言（民国九年）。

参考资料

1. 李大光《始兴饶文波（振澜）先生行状》
2. 饶纪仁《我的家庭》
3. 《韶关文史资料》第八辑105—112页
4. 《始兴文史》第五辑57—61页
5. 《中国当代教坛名人辞典》267—268页

粤北的“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段吉榜

1990年12月23日，《羊城晚报》报道：“全国又有30户世代从教的家庭获得‘优秀教育世家’殊荣。昨天下午，主办单位《家庭》杂志社为这些从各地南来欢聚的家庭代表举行了颁奖会。……这30户‘优秀教育世家’都是有三代以上成员从事教育工作，并有成员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广东省的两户家庭榜上有名。他们是：饶平县一中江孟君老师一家，三代五人从教；始兴县太平镇第一小学饶纲范老师二家，四代四人从教。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李星万、广东省副省长卢钟鹤、广东省教育厅长许任之到会颁奖。”

李星万、卢钟鹤、许任之接见了出席颁奖会的饶纲范，并合影留念。

这一消息如拂面春风吹进粤北大地之后，在韶关市、及各县的党政领导中和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始兴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县教育局、县教育工会派代表前往饶家祝贺，同饶纪仁、饶纲范父子进行了座谈，赠送了镜屏等纪念品，并合影留念；12月31日，始兴县长胡浩民专程前去饶家表示祝贺。

1991年1月1日，中共韶关市委副书记时述花、市教委主任谭华邦、中共始兴县委书记罗继胜等领导登门祝贺，同

时送上彩色电视机和高级音响，以资表彰和奖励，并同饶纪仁、饶纲范父子进行亲切交谈，高度评价了他们以教育工作为己任，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充分肯定了他们几代人对始兴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认为饶纲范一家受此殊荣乃当之无愧；并号召全市教育工作者向他们学习，使粤北的教育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

“四代四人从教”，所指的是饶纲范和他的曾祖父饶显周、祖父饶振渊、父亲饶纪仁。而他们四代人 中 从教者甚众，只是由于他们四人是饶家四代众多从教者的优秀代表，历史将公正地评说他们四代人的业绩。

饶显周（1866、3——1919、7），字宴琼，始兴县高营村人。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父亲饶学源由农转商，颇有名望，但以未能多读书为一生憾事，而尽力助子就学。在父亲的勉励下，他牢记“贫不可废读，富不可忘耕”的庭训，发奋刻苦，学业有成，23岁时考取郡庠附生（秀才）。但他无心仕途，而居家致力于地方公益，为改变家乡的文化落后状况，振兴始兴教育出力。他于清末民初年间，利用县城北门关岳庙作校址，创办振兴学堂，招收邻近子弟入学。该校后改名为振兴学校，抗战期间又改为保民学校，一直办到1949年解放，成为城郊小学的前身。为提高邑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

嗣后，他赴韶州经商，仍继续对振兴学堂给予资助。由于受家庭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关心国家大事，赞成民主革命。邑人钟智仁、钟江因参加了同盟会，其亲友

皆怕受株连，都敬而远之。而饶显周不但经常与他们交往，还慷慨给予经济赞助。钟江为报知己，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撰文《饶公宴琼先生像赞并序》，曰：“饶公宴琼，行谊纯粹，尽人能言，固无俟余多言也，然余不能已于言者，清末革命潮起，余亦卷入旋涡，庸人多避之若浼，惟公引而近之，爱而助之，因深服公识量迥越恒流，自民五后，余奔走闽桂，未得与公接晤者数年，适民十由桂回省，闻公已归道山，言念及之，每为沮丧，客岁公长哲嗣文波君，谬以教职，相升畀听夕共处，见有父风，并获拜公像，识春风之在座，感朝露而樱怀，安得无言乎。”予以高度赞扬。

饶振澜，字文波，生于1886年11月。自幼秉承家训，负笈游学，学业有成。先后毕业于两广优级师范和国立广东高等师范。1914年在仁化高小任教。1915年初回乡参与筹办始兴中学，并负责拟订学校规章制度。是年4月26日开学后，担任历史、地理、博物教师。8月，任学监主持教务工作。

1917年夏至1930年，饶振澜任始兴中学校长。其间军阀战乱频仍，始兴为南北通道，校舍经常被过境军队占住，使弦诵讲学之地，陷为戎马锋镝之场，被迫经常停学。在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不荒废学生学业，他下决心寻找僻静之处上课，于是将学校一度迁往文明书院（现机关幼儿园），1924年又被迫迁往石下老茶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把学校办下去，两年后才迁回原校址。

饶振澜不仅教学有方，而且治学甚严。他身为校长，仍兼任一些学科的教学，对学生总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处处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校员皆能积极维持定制是循，学生亦能致力坚凝作业不辍，盖时变而教育不随而俱者，此本校之精神也。”（注）同时，他为了进一步

提高教学质量，不但自己虚心诚恳求教于人，并广为招贤纳士。先后聘请了始兴仁里村的陈及时、陈及官，黄所村的吴胜尧，石下村的李贤伟、李大邦，石桥头村的钟江，乌石村的卢章甫、卢道南，县城的陈美椿等一批在始兴较有学识的知名人士，加盟始兴中学教席，并推行教学改革，因而培养出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如张光第、邓良生、钟远徽、李大光、刘世焱、张显歧、陈彝康、饶纪绵、李集翊等一批有作为有建树者。当时的优秀毕业生中先后考入高等学府的也不乏其人。

1924年，始兴县设局修志，饶振澜被委任为总经理（兼），负责经费的筹措和管理。在财力无多的情况下，他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做到算无遗策，对各种开支调度合宜，得以从经费方面保证了县志在1926年出版。

1930年2月，他调任始兴县教育局局长后，重视发展始兴教育事业。大力提倡各乡废私塾办新学，纳入学制轨道；在农村开办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推行扫盲工作；建议叔父将其经营的“兴利栈”办成兴华书局，专门经营中小学课本和文化用品，从而方便了全县师生；为了培养师资，他亲自创办了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并一度兼任校长。他从1930年起就重视培养本县高级人才，积极筹集款项，设立始兴大、专学生奖学金，鼓励和支持勤奋好学的有志青年赴外地高等学府深造。在当年受奖学生中，现在尚能查考者，有中山大学理科郑衍畴，医科饶振维，农科朱达龙、陈尚权，工专机械科饶振纲、李天柱；暨南大学商科饶振濂；上海持志大学张国魂等。现任省政协常委、原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张显歧回忆说：“振澜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始兴各方面的人才，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时，就多次收到他亲自批给我的奖学金。”

此外，他对文化设施颇为关心。为纪念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和解决群众文化娱乐场所，在1936年，他主持筹建始兴的中山公园和中山图书馆，并一度兼任馆长。为充实中山图书馆藏书，满足群众学习的需要，他邀请有关单位和邑中知名人士，联名吁请邑人张发奎将军给予资助。张将军慷慨解囊，捐赠了《万有文库》丛书、《四部丛刊》和其他图书共四千册，从数量上和种类上丰富了馆藏书籍。他曾主持筹款将文庙维修一新，并安排有管护人员。在任局长期间，还支持设置退休教师养老金，使一些生活困难，年老不能任教的教师老有所养。如执教数十年的老教师陈锡龄，其养老金就是在他的亲自关照下得到妥善解决的。

饶振澜任教育局长后，还于1931年秋至1932年间，因始兴中学校长李大邦辞职而兼任校长。由于这段时间学校的经费稍为充裕，他就把学校的发展前景时时放在心上，筹划着建造一幢教学大楼。因此，他精打细算，紧缩各项开支，还以身作则只领微薄工资，与教职员工同甘共苦，筹措了三千多银元，并请人设计好了建筑图纸。但在接任者上任后不到一年，这笔资金就被挪作它用而花光了，他每念及此都甚感遗憾。

饶振澜自幼受父亲思想的熏陶，在广州读书后，又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思想进步，性格开朗，且倾向革命，故而能热情支持民主革命事业。1926年，北伐大军过境时，他积极协助政府支持北伐军，带头献粮献草，组织加工军粮。是年冬，国民政府从广州北迁武汉路经始兴，他被推举负责组织接待的工作。当国府主席兼军事部长谭延闿、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随员一

千多人抵达始兴时，对他所组织的隆重欢迎，热情接待，以及丰富多彩的联欢甚为满意。是时适逢谭延闿得知他先祖几代人的事迹而大加赞勉。抵武汉后，又亲笔题写了“南国家”四个匾额大字和一把题有“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半入奩。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邛侯三万签。”诗句的纸扇，托始兴县长谭炳鉴转交给饶振澜，给予褒奖。他是一个爱憎分明之人，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爱国之诚，他动员儿子纪汉、纪晋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不愿子弟参加反共反人民的行列，于是，又要两个儿子回乡执教。1945年后，他先后担任始兴县教育局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继续为家乡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1949年，他积极营救和保释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拘押的中共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周才忠、周旺村、欧占先、邓华谈及其家属、以及无辜的群众多人。1949年5月，中共五岭地委派五支队队长邓文礼策动国民党始兴县长兼自卫总队长饶纪绵举行武装起义。他受邓文礼之托，积极参与秘密联络工作，并亲自给饶纪绵转送信件，护送中共地下党干部杨泰湖与饶纪绵见面。9月，他参加了饶纪绵武装起义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50年，始兴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时，他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并作了大会发言。

饶纪仁，字海山，生于1917年5月，在其父亲的教育、影响和指导下，从1935年起就开始了他一生的教书生涯，曾任小学教师和校长。抗战期间，他考入广东国民大学，1945年因粤北沦陷而辍学。是年10月至1958年7月在始兴中学任教，先后担任过初中、高中和简师班主任，还兼任过语文、生物、地理、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教研组长。1954年曾在广东

教育学院中学生物教师研究班学习，1957年曾一度担任副教导主任之职。1958年8月，调始兴县罗坝中学任教。1959年8月调南雄师范任教，并兼中师班主任。1960年8月再调往罗坝中学任教。1961年调回始兴中学任教。1970年2月调始兴县墨江中学任教，直至1986年10月退休。其间于1982年至1983年兼任始兴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中学地理师资班专职教师。

饶纪仁在45年的教书生涯中，坚定不移地从事教育事业，热心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辛勤耕耘，自爱自重，真正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以高尚的思想品德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作为教师，他对学生非常关心，既从思想、学业和生活上严格要求，又通过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和教育学生，把一片爱心化为满腔热情奉献给学生。他对所有学生坚持一视同仁，并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因人施教。尤其对犯了错误的学生，他不是简单处理了事，而是耐心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尽力教导。解放前他在始兴中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盗窃了老师的钱，按校规应该开除学籍。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对这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使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自觉地退回赃款，以求得被盗老师的谅解；另一方面建议学校当局给该生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作开除处理，从而挽救了该生的前途。

饶纪仁在始兴中学和墨江中学任教期间，曾多次担任班主任。他坚持把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读报、写日记，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集体；培养学生尊师爱友，刻苦勤奋，好学上进的优良品行。因此，他所担任班主任的毕业班，平时风气良好，毕业时升学率也较高，走上社

会后，大多有良好表现。如1945年至1948年，他担任班主任的始兴中学甲班，51人参加升学考试，其中，5人考上省立志锐中学高中班，16人考上韶州师范，其余的除考入南雄中学、曲江中学外，均考上本校高中班。

他对学生认真负责，还把他们的痛苦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如1948年他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该班一个姓易的学生，在毕业考试前的一个周末傍晚，与留校的同学到墨江河里游泳，不幸误入木排底而溺死。饶纪仁老师在电告其父亲的同时，考虑到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于是发动师生捐款购买棺木，处理后事，还将所剩款项赠与其父，并于第3天下午在班上主持了对死者的追悼会，其父十分感激。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加深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学生对老师对学校的感情。六十年代，有一名患先天性嘴歪的学生，入学后因不时遭到同学的讥笑而感到苦恼，饶纪仁发现后，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教育全班学生，此后，班里没人再为难这个学生了，使其能安心学习。那时，他担任一个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有两个学生有志力争升学，但都因家庭经济困难，家长难以支持，而思想苦闷，情绪不高。他了解情况后，多次进行家访，说服其家长，并根据他们家庭困难的情况，鼓励这两个学生报考韶关师范。后来，他们二人在韶师毕业，参加工作后各有建树，一个成为县级领导，一个担任中学校长。

在教学上，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上课时，采用直观教法，启发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五六十年代在始兴中学期间，他为教好生物课，而自制了不少动物、植物的标本和挂图。尽量做到讲什么课，就有什么标本或实物拿来作教具。没有的，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形象地勾画出来。他边讲边

画，运用语言和手势，引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并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业生产基地。他还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经常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观察和实验，如控制水稻青化阶段、光照阶段的实验和玉米、南瓜人工授粉的实验，西红柿嫁接马铃薯，月光花嫁接番薯，荷包豆药物浸种、科学施肥管理等，各种实验均有成效，尤其是月光花嫁接番薯成效明显，他个人用月光花嫁接栽培的4棵番薯，每棵产薯36斤以上，其中一棵达48.3斤，拿到县城展览，人人称奇，这样一来提高了学生开展各项实验的积极性。1962年至1966年，他在始兴中学教地理期间，为了配合教学，争取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在校内修建了气象观测园，除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测外，他个人每天观察3次，坚持了4年。七十年代在墨江中学任教期间，学校有个100多亩旱地和15亩水田的农场，学校要他负责整个农场的生产技术指导工作，他不辞劳苦，每个环节都亲自动手。如水稻的选种、浸种、育秧和田间管理，都认真进行操作和指导，并从县农科所买回水稻、小麦、番薯、花生等良种，在学校农场进行表证对照试验，不管刮风下雨，或是烈日当头，他都能坚持不懈，从不马虎了事。

几十年来，他十分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坚持经常学习，博览群书，丰富知识；同时，虚心向同行学习，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1950年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语文、生物、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教研组长，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地组织好教研活动。他身体力行，对青年教师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使不少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提高。1982年，他还编写了《始兴乡土地

理》作为补充教材，在教研活动时，他分别在墨江中学和始兴中学以“始兴乡土地理”为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进入八十年代后，他积极响应教育部门的号召，结合教学搞科技创造发明。1982年他设计的“世界各地时差验对仪”，分别荣获县科委地区科委颁发的一等奖和二等奖，1983年设计的“地球公转与四季的形成仪”和“地球自转偏向力仪”，分别获得县教育局颁发的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些仪器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有利于开发学生智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他还热心于史志工作。1985年以来，先后为《始兴文史》撰写《始兴中学简史》、《始兴早期农业科研概况》、《始兴气候与农事》等史料文章。1987年，又为新编《始兴县志》编写了《始兴地理志》并受聘为《始兴教育志》编写组顾问。

饶纪仁几十年来教书育人，虽年逾古稀，头发斑白，但见满园桃李，且效力于各行各业而倍感欣慰。他的学生，有的已成为教授、专家，有的已担任军队团级职务，还有很多分别走上了市、县机关各级机构和学校的领导岗位；尤其使他甚慰的是，有一大批弟子学有所成之后，沿着他的足迹从事教育工作。不少学生没有忘记他，经常给他写信，表达对老师的思念。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学校校长、高级教师梁学文来信说：“时光一晃过了40多年，现在恩师已逾古稀之年，弟子我也年近花甲……40年前始中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多么令人依恋。”曾任空军团级干部、现在广州市白云机场工作的刘志乔来信说：“从1948年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30多年，但您那种对学生平易近人，严格要求，耐心授课的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广西电影公司任科长的

罗铎来信称赞他：“您是我学生时代唯一印象最深的老师，我们以前虽没有书信来往，但每次有亲友从始兴来，我都要打听您的情况。”79届考上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如翠写信给他：“老师您已年过半百，为了我们青年一代，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材，真是呕心沥血。并不辞劳苦经常到我家辅导，这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饶纪仁从事教育工作45年，把教师的职业作为一种责任重大，又很光荣的职责来对待，以人民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把自己的学识和良好品质奉献给了学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由于他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为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而他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肯定。1957年被评为中学优秀教师，出席省第一届优秀教师代表会议。1975年至1985年连年被评为先进教师。1980年至1984年，他被选为始兴县一届、二届政协委员，1985年起兼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1984年至1986年任始兴县第二届政协副主席。1984年被评为广东省先进教育工作者。1988年评定为中学高级教师。

饶纲范，生于1943年，1962年参加教育工作，先后在始兴县狮群小学、城郊中心小学任教。现在是始兴县太平镇第一小学高级教师，从事数学、自然等学科的教学。他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象园丁一样辛勤耕耘，将整个身心倾注于教书育人的工作上，为国家积极培养年轻的一代。

1962年5月，他在江西省新余钢铁学校毕业并留厂工作，后因新余钢铁厂停建，而改行回始兴县狮群小学任教。虽然用非所学，但他虚心学习，善于动脑，又有父辈的言传

身教，不久就成了能有章有法地进行教学的内行，也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并先后担任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1978年调城郊中心小学任教后，除每年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外，还兼任学校教研组长、县教师进修学校语文函授班辅导员、县小学语文教研会理事。面对“满堂灌”、“填鸭式”的陈旧教法，他苦苦思索着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孜孜不倦地寻求教与学的最佳途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城郊中心小学的7年里，他担任的毕业班语文科教学质量在该乡多年名列前茅。在教学中，他联系教学实际，认真钻研教材教法，不断总结经验，先后在《始兴教研》期刊上发表过5篇经验文章和论文。1983年所写的《在教学中如何使文道统一》的教研论文，在县教研会上获奖。1983年5月，在全县小学课堂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他荣获课堂教学一等奖。

1984年9月，饶纲范调到县太平镇第一小学，担任数学教学工作。此其间他结合课堂教学，开始对电化教育在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索。为此，他用心钻研电教理论，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挤出钱来购买电教基础理论书籍。在排得满满的工作日程里，他自学了《电教知识》、《电化教育学》、《心理学》、《幻灯投影教学及其软件设计》。还订阅了《中小学电教》、《电化教育》和《广东电教》等刊物。他一边研究电教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一边不断地实践、总结、提高，直至取得成果。他结合电教实践撰写的两篇电教论文先后在《广东电教》上发表，还编写了《电教目录》、《自然实验仪器册》和《录相编目》，用以指导电化教学。

从1984年开始，除教学外，他还担任全校教学仪器、电教设备的管理和电教实验以及电教软件的制作等工作。虽然工

作量大了，但他从不叫苦叫累，经常加班加点，也没有要求过补贴，反而干脆搬到离家只有十多分钟路程的学校去住，一心扑到电教工作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学校有70多位教师，教学投影片需要量很大，他急人之所急，有求必应，凡有老师求助，再忙他也答应下来，然后，认真分析教材，设计草图，有时就是挑灯熬夜也及时完成。同时，还教会老师如何去操作。几年来，他设计制作的各学科投影片约460多框。

1987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韶关市教育局电教站的指导下，在完成实验方案《小学数学几何形体系列投影片的设计和应用》的设计后，为了及时赶制出来，他“闭门造车”，奋战了整整一个暑假，克服各种困难，绘成了这套系列投影片的51框草图。后又数易其稿，还在试用中广泛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历时一个春秋，终于定稿。1988年7月，这套投影片被送到省电教馆，参加普教系统电教教材评比。有关专家、教授对这套投影片的选题内容、设计思路、制作工艺及应用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被评为特等奖，并由省电教馆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翌年又在“89·上海”全国电教教材邀请评比会上获进步奖。1991年4月，他制作的《〈自然〉动感投影片》被评为省优秀电教教材一等奖。此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使用方便的电教仪器柜和装有万向轮的投影推架，方便了教学。

为了电教事业的发展，他在省市县的电教工作会议上，把自己多年积累、总结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同行；在韶关市和南雄、始兴县举办的电教基础理论学习班上，他现身说法认真授课；对来校参观学习的外地领导和同行，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制作方法并虚心请教。

他的成绩的取得，是与他安心山区，热爱家乡的情怀分不开的。1988以来，他有多次去韶关、深圳和广州工作的机会，但他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党和人民对他那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应有的荣誉。1982年被评为始兴县先进教育工作者；1985年被评为县的先进教师；1988年被评为县的先进科技工作者；1989年荣获县科技成果一等奖、粤北铁合金厂教学优秀奖和县优秀知识分子荣誉称号；1989年9月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1990年1月当选为“粤北风流人物”。7月，他的事迹被收入《中国当代教坛名人辞典》。11月，获省记功并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1991年1月被评为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在一片赞扬声中，饶纲范没有陶醉，他说：“我做的工作还很少，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今后更要努力工作，报效国家。”现在，他又在编制《分数、百分数、比例教学系列投影片》。

（二）

这个教育世家，自饶显周以来的四代人中，先后任教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共有23人之众。现以代为序简述如下：

第一代

饶显周（略）。

第二代

饶振澜（略）。

饶振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先后在云浮县云浮中学、始兴县始兴中学任教。

第三代

饶纪汉，解放前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起先后任教于曲江、始兴、仁化、南雄等县立中学和省立南雄中学、1950年起在省立韶州师范、韶关地区师范、韶关师专等校任教，抗日期间曾参加前线部队政宣工作，建国初期，参加韶关地区社会改革历次运动有关政宣美工义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六十年代初曾当选为韶关市第四届、第五届人民代表。

华细英（纪汉之妻），解放前后曾在始兴县、韶关市任小学教师。

饶纪晋，解放前肄业于国医学院，曾在始兴县立简易师范教导主任兼教员。1949年9月以后，一直在始兴中学任教直至退休。其间，曾兼任教研组组长、高中班主任。他工作勤恳，认真负责，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欢迎和尊敬，曾多次受到上级奖励并评为先进工作者。

饶纪仁（略）。

饶纪寰，解放前于中山大学毕业，在韶关省立志锐中学任教。1949年后，历任北江中学总务主任、副教导主任，韶关中学、韶关市第一、第二、第五中学副校长，多次评为韶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956年当选为韶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1962年起任韶关市政协常委。1982年起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员会常委。民进韶关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起任省政协委员，韶关市政协副主席，韶关市第七、八届人民

代表。1986年被评为韶关市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曾惠芳（纪寰之妻），1954年起先后在北江中学、韶关中学、韶关市第五中学等校从事教务工作。

饶纪功（振铎之子），曾在始兴县任小学教师。

第四代

饶纲森（纪汉之子），在韶关市第六中学任教。

饶纲伟（纪晋之子），曾在阳山县任小学教师，现在始兴县太平镇教研办公室任教研员。

陈德忠（纲伟之妻），曾任民办教师。

饶纲钧（纪晋之子），曾在仁化县附城小学、仁化师范任教师，仁化县教育局任教研员，现在韶关市政协任科长。

黎丽娟（纲钧之妻），现任韶关市东岗小学教导主任。由于工作成绩优异，被评为特级教师，武江区和韶关市劳动模范，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

饶纲训（纪晋之子），曾任始兴中学教师，现任始兴县教育局教研员。

卢清莲（纲训之妻），现在始兴县太平镇一小任教。

饶纲德（纪仁之子），曾在江西省新余钢校和始兴县太平镇一小任教。

饶纲范（纪仁之子）（略）。

饶纲震（纪寰之子），现在韶关市第六中学任教。

骆月玲（纲震之妻），现在韶关市第六中学任教。

饶丽茹（纪寰之女），现在韶关市第一中学任教。

饶丽莎（纪寰之女），现为韶关市第五中学职员。

现在，这个“全国优秀教育世家”（下转第15页）

沈秉强的一次传达报告

古 衡

1957年3月5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除6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之外，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等城市以上的各级政协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当时，广东省仅有20多个市、县成立了政协，韶关作为一个我省较大的专区的中等城市，亦有幸分配到列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名额。

这一年的元宵过后，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当年任北江专员公署副专员、韶关市民革筹备委员会负责人、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沈秉强，经市政协的推举，代表韶关市政协，前往首都北京，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这次会议开幕前，沈秉强和全体出、列席会议的人员一起，应邀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并分组进行了讨论。

同年5月4日至12日，沈秉强副主席又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肖隽英所作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和陶铸主席所作的“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如何帮助中国共

产党整风，正确区分和处理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政协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继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之后，政协韶关市委员会也于6月24日至29日召开了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把学习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沈秉强副主席在大会作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及陶铸主席在省政协会议上报告的传达报告”。这个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讲话的主要精神。他在传达报告中强调，正确理解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指示精神，对我们今后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属于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敌我问题虽也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性质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两个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处理敌我矛盾要实行专政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而是用民主的办法。即有领导的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因此，凡是思想问题，都应采用讲清道理，辨明是非，批评和教育说服的方法。”

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在什么地方？沈秉强副主席在传达中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出：“在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意见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意见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当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合理的，比任何社会制度都要优越，这是不容置疑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执行制度的人，如犯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就会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完全相适应，就会产生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两个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但在剥削阶级被消灭，所有制已经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时候，这些矛盾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我们全体人民已经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政治路线——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沈秉强在传达报告中说：“我们必须从团结出发。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当然很正确地解决了党内的矛盾，即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使党走上新的胜利。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人民内部。毛主席说，没有第一个‘团结’，一斗就会斗烂，变成不可收拾。因此，我们对待人民内部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要从团结出发。”

“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混淆起来，不是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是不容易弄清的。不满政府，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面就有两种不同的批评，有来自人民不满的批评，也有敌人的批评。我们有些人就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肃反中把好人当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当反革命来斗。毛主席说，我们的肃反工作不是坏，而是很好，但也有缺点。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他还谈到，“毛主席在讲话中并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各方面的问題，都作了极精辟的解说和指示。”

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沈秉强副主席谈了自己的认识。认为毛主席对“我国正处在大变动的环境中，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的问题提出，是非常适时必要的。我们有了这个方针，今后的工作便有了正确的方向。毛主席从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看到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提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这是毛主席继实践论、矛盾论之后，在哲学上的进一步发挥，在新的环境中的运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范例。”

传达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传达陶铸主席的“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精神。陶铸主席的这个报告，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重要讲话，结合广东的具体实际而进行的。

沈秉强副主席在传达中讲到，“陶铸主席告诉我们，矛

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指导工作必须承认矛盾，正视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进而解决矛盾。……人民内部既然一定存在着矛盾，如果不肯加以正视，相反却企图加以掩盖，那么，小的矛盾就会变成大的矛盾，甚至会紧张起来，闹出乱子的。要是我们承认矛盾，正视矛盾，当矛盾还没有紧张尖锐的时候，就把它揭露出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正确加以解决，我们就能更好地团结全体人民，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为什么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很不勇敢、很胆怯呢？一个原因是有些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面对着的都是尖锐的敌我矛盾，他们解决敌我矛盾是有经验的，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露出来，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我们的同志还找不到新的办法来适应它；另一个原因，则是有些同志耽心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会被敌人利用来制造谣言，破坏我们。这些同志不了解，就是我们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敌人也是一样要造谣，要破坏我们的。但是，真理始终是真理，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是矛盾论者，我们不怕承认和正视客观存在的矛盾。”

在当时的情况下，广东人民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陶铸主席指出，我们广东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十二个方面：第一，农民方面的矛盾；第二，工人方面的矛盾；第三，失业人口不能很快就业的矛盾；第四，中小学毕业生大部分不能升学的矛盾；第五，华侨、侨眷方面的矛盾；第六，盐民、渔民、船民方面的矛盾；第七，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第八，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方面的矛盾；第九，转业军人方面的矛盾；第十，少数民族方面的矛盾；第十一，老根据地方面的矛盾；第十二，供应不足和物价有些上涨方面

表现的矛盾。”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上，经过与会者的充分的讨论和提出意见建议后，陶铸主席作了总结发言，就这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个方面如何解决作了阐述。沈秉强副主席在会上作了扼要的传达。

传达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整风运动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要正确贯彻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决定进行一个全党整风运动。首先要反对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次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是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加强团结，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他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批评方法来解决的。批评是调整社会关系，克服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之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问题，在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所存在的矛盾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在马列主义真理基础上统一起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对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而有人借着“放”、“鸣”的机会，颠倒是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进而推翻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取消社会主义的事，他在这一部分的传达报告中指出：“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不但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可抗拒的信

念，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祖国的独立、富强，就没有我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就不能保证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这些事实是非常明显的。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引诱我们全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吗？”沈秉强副主席认为，这些人的企图和阴谋，都是“枉费心机”的。

在沈秉强副主席作传达报告之后，出席政协韶关市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组织学习报章上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全文。

5月28日，政协韶关市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还组织了大会发言。有29位委员纷纷上台或用书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并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和所联系的群众，提出自己的意见。许多委员认为，听了沈秉强副主席的传达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韶关市这次政协会议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中心议题，我们认为是恰当的”，“使我们今后在解决韶关市矛盾方面有了更明确的方向”。郑长勤主席也就如何正确处理韶关市人民内部的十大矛盾问题进行了报告。

委员在发言中说：“在这次会议里，我们听取了沈秉强副主席传达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及陶铸省长在省政协会议上的报告，在会议上，我们还热烈地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更加明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道理。其次，还使我们认识到今天祖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的领导而获得的。”

为了发表自己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认识，5月28日的委员大会发言，沈秉强副主席第

一个上台，再一次阐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他以一名民革成员表示：“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个统一战线中的社会人士，应该如何去帮助共产党整风呢？我认为，在大‘放’大‘鸣’中，在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时，必须遵照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所指示的六项标准，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明确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除‘三害’，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如果离开这个立场和目的，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谈不上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

5月29日，政协韶关市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点写进了关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沈秉强副主席所作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陶铸主席在省政协会议上报告的传达报告’，还结合阅读了六月十九日公布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过讨论和认真学习后，一致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号召全市各界人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为实现毛主席的指示，为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及省

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决议而奋斗。

“会议并听取和讨论了郑长勤主席所作的如何正确处理韶关市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认为郑主席的报告，是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又结合韶关市的具体情况而提出当前韶关市主要存在的十方面的矛盾及所采取的正确措施，表示同意。号召全市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及全面完成韶关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正确处理韶关市人民内部矛盾而奋斗。”

附：沈秉强简介

沈秉强（1893—1970），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人。1915年至1920年间，曾任香港中外新闻报刊编辑，还与他人合办新闻通讯社，宣传爱国民主思想；抗日战争前后，曾任广东省府参议、十九路军参议、第四战区粮食处中校处长等职，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二十多年，曾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县府知事、县长、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二区（北江区）专员公署专员等职；1948年在香港加入民主促进会（即“民革”前身），并参与策动北江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北江治安委员会顾问、韶关市人民政府委员、韶关专员公署副专员、广东省和韶关市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韶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4月以反革命罪判刑，1970年2月冤死狱中。1980年11月，此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阳山县土改工作情况点滴

饶纪豪

1951年秋，北江专区全面铺开各县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1月下旬，中共北江地委举办土改工作干部学习班，对来自各条战线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进行短期培训。文教战线的北江中学、韶州师范学校部分领导和教师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当时我是北江中学的总务主任，同廖拔成副校长一起，被分配到以粤北文工团为主体的、由地委宣传部金阳部长亲自率领的赴阳山县土地改革的工作队。12月初，我们乘坐一艘大木船沿着小北江日夜兼程赶赴阳山县。当时的阳山县城还比不上现在的一般小圩镇。在中共阳山县委的安排下，我们又集中学习了3天，主要是听报告，熟悉情况，然后分片分组奔赴开展土改工作的区乡。当时，上级发给每个土改工作队员一个布制胸章，作为统一标志。（见42页的插图）我被分配在五区小江乡、大坪片。直接领导我们工作队的除金阳部长外，还有陈培兴同志（参加县委领导）、梁木同志（兼五区区委书记），还有文工团的领导张小庄、崔耀钟等同志。在小江乡稍作逗留，熟悉乡村情况后即分别背上背包，下到乡村。

大坪片土改工作队有10余人，由廖拔成副校长任大坪工作组组长，我担任资料员。下到大坪村（又叫第十村）后，由农会干部安排到最穷最苦的贫雇农家实行“三同”（即同



图为土改工作队员的证章

（上图为正面，下图为背面）

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工作队每人每天交给“三同”户12两米票（由阳山县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可在当地粮店兑现粮食的票证，见43页插图），另交人民币2000元（解放初期的人民币，约合现在人民币2角）。我的“三同”户主陈兴广，双目失明，年过半百，其妻约40余岁，尚有一年轻守寡媳妇，三人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困悲苦。当时土改政策严格要求所有土改工作队员一定要住贫吃苦，明确依靠，以便

掌握真实阶级情况，顺利开展工作。因早些时候有些乡村农会曾一度被地富反坏分子暗中控制和操纵，干部不纯，工作出现问题。所以，要求工作队入村后第一步工作就是要通过“三同”，住贫吃苦，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在此基础上选根定根，扎根串连。即寻选出苦大仇深、作风正派、最可靠的贫雇农作为根子，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抓紧培养和提高，再通过他们开展串连诉苦，提高阶级觉悟，逐步扩大贫雇农阶级队伍，树立贫雇农优势。这当中要做很多艰苦深入和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才能打开局面，转入清匪反霸斗争。我们这些从教师岗位转到农村来搞土改工作的同志，可以说既无群众工作经验，也不善于同工农结合，仅生活上离开城市，还要住贫吃苦，一时之间就很不适应，何况又是下到“天下最穷之僻壤”（唐朝时韩愈对阳山的评语），一日三餐吃的是玉



米粉煮的稀粥，当地叫“麦羹”，菜是临时从腌埕里抓起来的酸“芋合”（即芋头的茎干）。晚上还要组织贫雇农串连诉苦，算苦账挖穷根，熬到三更半夜，真是饥肠辘辘，很不好受。但想到广大贫苦农民长年累月如此，我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尤其想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很快就认识到，参加土地改革正是我们知识分子锻炼改造的好机会，条件越是艰苦的地方，也正是最能锻炼人、改造人的地方。因此，我们这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土改队员都能下定决心，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工作。我在阳山县参加土改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乡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参加过整队会议多次，并先后被评选为北江专区土改工作模范和阳山县一等土改工作模范，受到中共北江地委和阳山县委的表彰奖励。但我认为，这仅仅是我向工农学习，加强自我改造的开端。下面我想就参加阳山县土改工作时写的和发表在《北江土改通讯》、《阳山土改通讯》上的几篇报导资料，从几个侧面忆述当时土改工作的一些做法和情况：

一、深入骆屋，打开局面

1952年5月，阳山县第六次扩大干部会议整干后，我被调到小江新兴乡第九行政村担任工作队小组长。骆屋是第九村的一个自然村，有30多户人。过去在该村地主骆发（后被镇压）的统治下，造成了九村农民村与村间和姓与姓间的不团结。如骆屋与邓屋邹屋就有极深的矛盾。解放后地主骆发仍死心不服，指派爪牙先后杀死农民积极分子邓水成和邹土

成，把邓屋、邹屋和骆屋间的宗姓仇恨加深。因此邓屋和邹屋的群众说：“骆屋没有一个人好人”。土改开始，邓屋和邹屋的群众顾虑极大，不敢参加开会，每晚都要工作队同志亲自接引和集合数十人手持木棍才敢出来。针对这个情况，工作队曾大张旗鼓展开政治攻势，把骆屋几个为首的恶霸分子扣押了，给群众撑腰，群众顾虑才初步打消。但骆屋群众却又在敌人的继续挑拨下，反而加强了骆屋内部宗派性的团结，一点很小的事也扯到村与姓方面来争论，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而且还形成了骆屋群众的敌我不分，贫雇中富地，好坏一家亲的局面。自阳山第六次整干会议回村后，我首先自我批判了过去存在的右倾思想，认识到过去阶级观点模糊，把骆屋群众普遍看成不可靠的想法是错误的，从而带头深入到骆屋群众中去。6月初搞反霸活动时，首先发动和争取了一向被群众视为“狗腿婆”的贫农妇女陈石莲，让她在大会上带头报上当，报出地主骆发分散给她丈夫骆金球（退租、退押时任民兵中队长，因欺压群众，包庇地主，贪污勒索被扣押）收藏的白银五百一十五元四毫。于是立刻改变了群众对她的看法，同时还带动了群众普遍报上当。事前，我更抓紧这一机会，打通与她有极深仇恨的妇女委员陈杏（其夫邓水成因扣押骆金球后被地主骆发指使爪牙暗杀）的思想，由陈杏在大会上主持奖励。当时陈杏在大会上说：“过去我是瞧不起陈石莲的，因她思想不通，走地主路线，但现在她思想进步了，认识了地主的罪恶，反出了地主的阴谋，报出了上当，靠回我们穷佬仔一边，是我们一家人了！我们大家拍手欢迎她吧！（掌声）现在我代表群众意见和根据报出有功，多数有奖的政策奖励她。”（掌声）当时陈石莲十分感动，也站起来说：“天下农民一家亲，这是地主剥

削大家的血汗，我应该全部交出来，不应受奖”。后来在群众的一再坚持下她才接受了部分奖品。此事对群众的教育极大，改变了“骆屋没有一个人好人”的错误看法和初步缓和了村与村、姓与姓之间的宗姓矛盾。不久，陈石莲又在小组的热烈讨论后光荣地被串入了贫雇农小组，而且表现得很积极，她串连发动了骆屋其他妇女积极参加对敌斗争。

由于发动了陈石莲，敌人在骆屋的破坏活动也暴露出更多，如他们曾半夜召集骆屋群众秘密开会，统一思想言行，应付工作队的访贫问苦；鼓动群众签名，控告邹屋、邓屋的干部等情况，同时也暴露了老实贫雇农不敢讲说的的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进行具体分工，深入农户，实行个别发动，把骆屋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参加斗争，并因此进一步摸到了敌人的底，斗争也就逐步深入，群众觉悟逐步提高。在斗争中我们摸到了地主骆发主谋暗杀农民邹土成，晚晚半夜集合其爪牙开秘密会议的线索，结合追讯，初步掌握此案的凶犯和暗杀的经过，并在群众的要求下，经请示上级批准，把一向破坏土改和漏网的凶犯骆火安扣押了。在扣押骆火安以后，骆屋群众纷纷报上当和报出了骆火安一贯造谣恐吓群众，挑拨宗姓矛盾的破坏事实。因此，骆屋群众的敌我界线初步分清，骆屋的局面也基本打开了，并为一年多来尚未侦破的地主谋杀农民案件找到了充分可靠的线索。

（上述资料详见《北江土改通讯》1952年7月12日第86期）

二、发动农妇陈石莲报上当的经过

为了在骆屋打开局面，我广泛深入到骆屋群众中去，起

初，通过同劳动认真开展对贫雇农的思想发动工作，但收效不大，碰到困难很多。经过反复思考，最后确定以争取陈石莲报上当为突破口，耐心做好她的思想工作，启发帮助她提高阶级觉悟。由于陈石莲是个年轻妇女，而我一向存有“发动妇女，实在不易”的思想，因此，平日同妇女谈话或启发诉苦时，总是相对无言。按理，和妇女谈话，不但要懂得拉家常，还要懂得她们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习惯，了解她们的心思。由此一来，我一碰到困难思想上就很自然地会产生“妇女工作还是女同志干比较方便”的想法，当时虽然口里不说，但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特别对发动青年妇女，更不大胆，思前顾后的。当决定要发动陈石莲时，就考虑到她是年轻妇女，丈夫骆金球（解放后任民兵中队长）又在去年“双退”时因包庇地主骆发和贪污勒索，欺压群众被扣押了，加上骆屋和邹屋、邓屋（两姓村民）一向有极深的宗姓矛盾，邓、邹两姓群众普遍说：“骆屋都是坏蛋，没有一个人好人。”而骆屋群众又觉悟不高，敌我界线不清，“地富中贫雇，好坏一家亲。”我虽计划分化骆屋内部，把老实贫雇农争取过来，尽快打开局面，也确认陈石莲是最有利的争取对象；但开始时却不敢抓紧亲自去做，思想上存在依赖女同志去发动的思想（因当时还有位姓曾的女同志在）。另一方面还认为陈石莲是年轻妇女，丈夫已扣押不在家，去她家找她不方便，怕群众猜疑，怕坏分子钻空子造谣。和她同劳动，又怕群众说我和“狗腿婆”（反报前群众普遍这样讥笑她）劳动，因此，一段时间里仍观望不前。后来曾同志调走了，责任无法旁推了，我才下定决心亲自来发动她。初时，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找她，只是找机会在路边或在麦地跟她谈，以后渐渐才敢去她家了。但每次到她家，见妇女们在门口经

过，神秘的张望，思想上又感到难为情，尤其怕坏分子钻空子造谣，群众产生误解。但同她谈一次，她的思想就进一步，我的信心也就增强了。直到6月5日，她说出了在解放后，地主骆发分散耕牛和白银五百一十五元给她丈夫隐藏，并暴露了“过去思想不通，有顾虑，又无人帮助解释，所以一直不敢报出来”的思想，于是我抓紧鼓励她，培养她，同情她过去被人鄙视的遭遇，启发鼓励她在群众大会上报上当，当时运动正转入反阴谋，报上当阶段。第二晚她就在群众大会上带头报上当，鼓舞和带动了群众也大胆登台报上当，掀起了“反报”高潮，邓屋、邹屋群众也因而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但骆屋群众反而对她不满。她来找我：“同志，我的心很难过”，“麻旺说我丈夫在走地主路线，还好意思当众报出来，真是十足的狗腿婆。”我立即给她撑腰、鼓气，她才说出工作队入村后敌人的破坏活动，如半夜召开骆屋的群众会，挑拨宗姓斗争，定出应付工作队同志访问的办法等。这样就帮助我掌握了敌人搞破坏的很多情况，摸清了骆屋的底，追出了地主骆发主使帮凶暗杀农民邹士成的线索，马上采取措施，从而把敌人猖狂破坏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不久，陈石莲被串连加入贫雇农小组，并放手让她串连发动了骆屋一大批后进妇女，使小江九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同时，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发动妇女工作的重要性。

（以上资料详见《阳山土改通讯》1952年7月14日第88期）

三、牛柱塆怎样查出漏网地主？

1952年8月，我被调到第一批土改重点下坪乡牛柱塆。那时该乡开始转入划阶级的阶段，但在宣传政策、召集群众来开会时，有的说头痛，有的说肚痛，有的说生产离不开。结果，原定下午一点钟召开的会议，到三点半都来不齐。划分阶级时东叫西叫也叫不来，即使有的来了也人在心不在，他们不是打瞌睡就是蹲在一旁不出声，情绪十分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工作队马上深入下去，依靠贫雇农了解情况，结果得出该乡由于自然村分散，过去工作不深入，造成土改第一阶段“煮了夹生饭”，敌人未受到打击，气焰仍极嚣张，贫雇农优势未树立，顾虑极大，村政权仍为化形地主梁鸿（前段划为中农，过去曾当过伪甲长，欺霸群众，有血债）的直接和间接掌握，通过他的一班爪牙（过去被认为是积极分子），如：一个小组长（是喃旮佬），一个旧军人（当过七、八年国民党兵），一个二流子，两个中农（其一是伪甲长、强奸过妇女，有血债；另一是喃旮佬，有过抢劫行为），一个复退军人（中农、被梁鸿通过其坏分子父亲拉了过去），大肆进行破坏，到处造谣恐吓群众。如4、5月间梁鸿造谣说：党的政策是“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致使富农普遍害怕。他又恐吓入了小组的贫雇农说：“你们入了小组的要小心，不要乱讲，讲得多就错得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受过他的恐吓，普遍害怕，不敢讲话。在过去诉、挖、算、运动时，他又通过其爪牙控制群众不得诉由他所害的苦和算他剥削、压迫的帐。贫农梁彦诉他剥削债利时就立即遭到他的爪牙恐吓说：“谁敢算梁鸿

的？！”害得梁彦一连九夜睡不着觉。牛柱榜28户贫雇中农中有26户借过梁鸿的债，受过梁鸿的剥削、霸占，但没有一家敢起来控诉他，于是梁鸿也就继续逍遥法外。分配果实时，他竟猖狂地说他不是中农，是贫雇农，强迫群众分给他一百斤谷。发放救济粮时他说要多少就多少，群众敢怒不敢言。该村梁禄永（中农、过去曾贪污，是年春在西岭教书）向主席团提意见和揭发他一伙的罪恶，竟遭到惨痛的报复，说他诬告干部，破坏土改，把梁禄永从西岭叫回来，迫认是恶霸地主，私藏黑枪27支，并要他保证今后全乡生命安全，禄永不承认，他们就鼓励群众扣押，进行非法斗争，拳打脚踢，并暗中扞手指、脚趾，用火红铁钳烙身，禄永被摧残致手指足趾骨断腐烂，遍体鳞伤，其家人送粥来也给冲了水和不许吃饱，欲致梁禄永于死命。群众不同意这种做法就被恐吓说：“爱地主”。以后将看守所迁到新屋湾时，梁鸿等还继续挑拨村姓矛盾和房头纠纷，使村姓间不团结，强弱房间闹意见，群众害怕，顾虑重重。我们工作队摸清此情况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扣押了梁鸿，重新扎一批根子。但由于政治攻势声势不大，其爪牙仍未分化瓦解并继续暗中活动，故群众顾虑仍未彻底打消。因此，当工作队准备转移去附点时，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就恐慌地说：“同志，我们头都洗湿了，你们要给我们剃下去，没有工作队的同志在，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是年8月31日，全区在下坪结合人民法庭对地主恶霸展开猛烈斗争后，工作队再次深入该村，并个别打通农干积极分子的思想，布置他们一起深入下去，包干发动，终于进一步摸出梁鸿在划阶级前经常集合爪牙秘密开会，一方面划低他自己的阶级成分，另一方面又阴谋划高粱禄永和梁贤（禄永

的叔父，旧农会长，因贪污被扣，也受过非法斗争）的阶级成份，并暗中将一条命案威胁梁木指证是梁贤干的。结果划梁鸿的阶级成份时无法划下去。为此，9月2日晚工作队组织了一次群众控诉会。将梁鸿押来，指出他一贯破坏土改的罪恶事实，表明工作队的态度，然后号召农民兄弟起来揭穿他的阴谋，报出上当，使他的爪牙也开始动摇，群众顾虑才开始打消。纷纷大胆控诉，有些边诉边报上当。梁如说：“我入了小组，你个契弟（广东语，对人的蔑称）问我开会讲什么，恐吓我开会不要多讲，说讲得多会犯大错，害我入了小组不敢讲话。”他的亲房冯超也报出藏有他分散的财物。群众越诉越恨，贫雇农小组在工作队的支持下立即宣布对他进行斗争，这样做干群情绪都高涨了。会后群众说：“压在心上的石头搬开了。”贫妇赵苟娣说：“同志，我刚才说病不能来开会，老实说我不是什么病，我的病就是怕恶霸。”其他妇女也兴奋地说：“如果明天继续斗梁鸿，我们就不去玩节了！”（中元节后探亲）男的则说：“如果明天继续斗梁鸿，我们一定到，农活误不了”。

经过斗争梁鸿后，敌人的气焰初步给压低了，于是对他们抓紧进行分化瓦解，有分别的对待，一方面召开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讨论释放梁禄永、梁贤、陈春（寡妇，不劳动，因私奔被群众扣押），指出过去扣押和斗争这三人是不符合政策的，说明这是梁鸿搞的诡计阴谋。积极分子的思想通了，如青年积极分子梁财说：“过去我们参加斗争梁禄永，用枪头打他，现在才知道上了梁鸿转移目标的当。”于是一致决定让他们三人在大会上保证不会对人报复后，当众给予释放。另方面考虑到，有部分梁鸿的亲房会有所顾虑，怕受牵连，我们乃分工串连发动，打消他们的顾虑。此外也估计到敌人

不会甘心，还会百般阻挠释放三人，于是深入组织力量，准备用群众的优势来压倒他们。在大会上我们大力宣传政策，进一步揭发敌人搞陷害的阴谋，打击敌人。晚上，抓紧召开齐心会，让群众充分暴露思想后同他们总结追根，把过去上下卷不团结的根源集中追到梁鸿身上，这样群众觉悟提高了，斗争情绪也普遍高涨了，敌人的内部随之瓦解，牛柱塆土改反霸斗争的局面也进一步打开。（以上资料详见《阳山土改通讯》1952年9月24日第114期）

四、培养青年农干的一些做法

我刚调到下坪乡牛柱塆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农会干部少而弱。原因是旧的垮了台，新的还没有培养起来，自然村又分散，群众调动不起来。当时唯一的一个农会干部梁全是新扎下的一个青年根子，在群众中还未树立起威信，也未具备领导一个村的能力，加上当时敌情严重，局面尚未打开，积极分子顾虑重重，普遍不愿当干部。主要原因是看不到前途，怕“变天”，怕敌人报复；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不识字，自卑。他们说：“不识字，怎能当干部”。如梁全说：“现在梁金逢（旧组长、不纯）什么都不管了，群众天天叫我写证明，我一个字都不识，求人又困难，真是头痛，还是让识字的来当干部吧，我做个积极分子好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面工作，一面加紧培养积极分子和新的干部对象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特别是当时上级又要求第一批土改重点要转入划阶级的阶段，任务紧而繁重。因此只好下决心在工作中尽快培养起一批能领导群众斗争和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好干部。

首先，我选择了四个好的青年积极分子，把他们组织在自己身边（对其他也注意照顾），有重点地加以培养。给他们讲形势、讲前途，逐步消除他们怕变天的思想和各种顾虑，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教他们如何领导小组、领导斗争和联系群众，以及如何个别串连发动后进等，并经常注意解决他们的生产顾虑和家庭拖后腿的问题。如梁章的最大顾虑是无人放牛和看管鸭子，另一方面怕看到他哥哥不高兴的面孔。梁财则怕其叔骂他“不干工作（生产）到外面玩（实则开会）”。对此，我就经常找他们的家属谈话，打通思想。其次，是教他们识字学文化。这是他们青年干部最渴望的和最感兴趣的。不过首先要打消他们怕困难和认为识字难的思想，坚定他们的学习信心，说明识字如识人，见一次就熟一次，以及记字如记姓，见字如见人，见字忘音就如人忘姓，教他们不要怕困难，要有信心和恒心，并保证在结束土改前教会他们识很多字，这样他们对学文化的兴趣增加了。于是同他们订学习计划，每晚学习一小时。但这一计划经常受到工作或开会的影响，而未能很好地坚持。在学习内容上，先教他们学记数的码字，再教他们学常见的字。并结合读报（《粤北农民报》）讲时事，进行思想教育；还通过教唱各种歌曲（如农民报上的山歌）来识字。此外还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来进行教学，做到见什么学什么。如每次和梁全到田心围去汇报时，路上就教他读墙上的标语，随后逐渐教他们学写条子，先拟好几种乡村常用的便条稿，如通行证、买卖证、结婚登记证等，教他们运用。这样他们识字很有进步，其中梁全进步较快，很快就学会了记数和写简单证明。

除了尽量抽空教他们学文化外，更重要的是注意进行思想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另

外，也注意帮助他们改进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如散漫、拖拉、睡懒觉、急躁、粗枝大叶等。工作上则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思想顾虑。当发现他们思想有变化时，就个别布置他们互相摸思想，（他们互相间较易暴露问题）摸出后及时帮助解决。如梁章因顾虑生产，曾一度表现消极松劲；梁水林怕当干部、得罪人，怕将来会释放梁鸿（恶霸）而遭报复，甚至怕蒋介石回来，因此不愿当干部。通过他们互相摸出这些思想情况，就布置他们分工串连打通思想疙瘩，如梁全和梁财摸到梁章和梁水林的思想顾虑，便通过他俩去串连做工作。做到随时掌握干部思想，帮助干部进步。

至于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方面，则通过帮助他们领导斗争，掌握大小会议和总结工作来提高，即使很微小的问题也提出来给他们研究讨论。如分配物资时，新屋垌的群众说好的和新的物资多分到牛柱垌了。牛柱垌的群众也说好的和新的多分到新屋垌了（其实是填坑补缺，新旧搭配两村都差不多），但他们（干部）也随声附和，于是加紧教育他们，不要做群众的“尾巴”，指出群众有不正确的意见必须耐心解释，给予纠正，这样才能领导群众前进，否则不但不能正确领导群众，相反的象这件事就很容易造成内部不团结和村姓闹意见，这样他们就很快接受过来。由于重视了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他们进步很快。在划阶级到建立政权约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培养了7个以上的小组长（有能力掌握一个贫雇小组）当干部（其中妇女一人），最好的如梁全和梁财，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评功选模中被选上了第一和第二等模范，梁全还当选为农协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兼宣传委员。

（以上资料详见《阳山土改通讯》1952年11月14日第133期）

五、牛柱塆抽田补田怎样做到人人满意

牛柱塆于10月11日转入分配土地，由于没有充分做好群众思想发动工作，结果抽田和补田工作一开始就走了弯路。如抽田前虽注意打通中农思想，但忽视培养典型，让他们能在大会上带动大家，因此，一开始就给一个自私的抽田户争先作报。他自报抽出的田都是瘦田远田，群众不通过，他就生气地跑回家，结果小组报不下去。经过动员，重新讨论怎样抽田才能公平合理，一面培养贫农伍进作典型带动，他应抽出当时能产谷400余斤产量的田地，自报时他自愿把一块能产840斤产量的上好田抽出（后已照顾补回好田），受到群众的欢迎，也影响了其他抽田户的思想。如当初不肯抽出好田的毛德裕，在典型带动和群众的耐心说服下，也同意抽出部分好田，使抽田工作进行顺利。群众反映说：“抽田抽得公，分田一定分得公。”

牛柱塆田地少，要从外村补入能生产23,000多斤产量的田地（其中有一半是留作兴建公路用的），因此边远田多，近村田少。由于补田前思想发动也不够，农民争要近田的思想很普遍，团结互让精神很差，这是工作队始料不及的。他们说：“近田跑十转，远田还未跑得一转。”补田榜（用来补缺的田）公布后，群情紧张，贫苦烈军属优先在诉苦基础上自报要求补入的田丘后，群众给予照顾通过，余下的便不再相让了。在比劳比苦时，妇女伍秤同贫农梁彦比劳比苦，争持不下，干部和群众无法评下去，只好暂时休会，以后再评。

这一情况发生后，工作队便一面采取动员群众多选几份合心田以供评判；一面抓紧召集干部和评议组（分配前经民

主选出)开会,商量办法,分工串连,包干个别打通群众的思想。另外征得群众同意,授权评议组根据实际情况折衷调整,提出公平合理方案,征得争田户的同意,经群众通过后分配下去。这样才打开了僵局。其中只毛苟妹一户因群众批评她自私自利,生气不来开会,后来由评议组配置,未及时征求她同意,结果她仍表示不满意,后经过她在大会诉苦,并说明其夫瞎眼等情况,要求多分一份近田,终于得到群众谅解,作了相让调整。分配结果,群众普遍满意了。

(以上资料详见《阳山土改通讯》1952年11月1日第128期)

六、土改生产两不误,修好陂圳保丰收

阳山小江下坪乡,地势高,气候寒,稻田只能种一造,每年收割后还要引水浸冬,否则稻田就会干涸爆裂,第二年就会失收。因此,农民的耕作十分辛苦,他们为了引水灌溉田地而要日夜劳动。如遇天气干旱时,为了看守田水经常要在田基过夜。当乡里没收征收工作开始后,农民都集中力量搞分田工作,农干和积极分子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照顾生产,地主分子则乘机破坏,丢荒田地。后进群众因不明白政策,思想有顾虑,认为现在分田了,自己的田将来不知分给谁,怕白给别人做,因而大部分水田都干得龟裂了。发现这种情况后,工作队即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唤起大家注意,并强调要做到“土改生产两不误”。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思想动员,从而扭转了部分农户对分田的不正确思想。会上通过集体修陂圳的意见,每家保证田水要满,并责成所有地主必须在分田以前保证田水不干涸。这样,群众在

“土改生产两不误”的动员下，纷纷行动起来，搞好生产。如新屋塆群众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把两个水陂和一条水圳修好了，使稻田都灌满了水。全乡都为第二年的生产积极劳动，打好基础。（详见《粤北农民报》1952年10月19日）

七、帮助农干克服松劲退坡思想

下坪乡在10月27日完成土改后，干部普遍滋长松劲退坡思想，认为“土改完成，万事大吉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年青的怕耽误生产，不愿当民兵；年老的怕麻烦，不愿当代表；做干部的想换班，不愿当干部。农协主席兼乡长梁用说：“选举新农协干部时，我正患病，我以为此次可以不当干部了，不料又被选上。”

11月1日，全县10个完成土改的乡干部集中在阳山训练，通过党史、人民民主专政，增产节约等一系列的革命教育和前途教育，他们主动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也认识到了松劲退坡的危害。一致表示：要坚决干下去，否则就是忘本，就对不起共产党和毛主席。当他们看到了苏联画报上集体农庄庄员们所过的那种美好幸福的生活，和看到苏联集体农庄用拖拉机耕田的幻灯片时，他们的思想就更加激动了。如生产委员冯解说：“共产党毛主席二万五千里长征，过大雪山，吃草根树皮，这样艰苦都是为了我们农民翻身，和使我们大家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我回村后，决心带头搞好互助组，增加生产，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他们表示，回村后，一定要带动群众，普遍订好增产节约计划，搞好冬耕。

（以上详见《粤北农民报》1952年11月19日）

对新丰县实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忆

张 弘

新丰县1949年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51年1月开始，到1953年4月，全面结束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地主、公偿、寺庙、学校的土地进行没收后，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和佃中农，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了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交换、剥削并存发展的情况下，会向两极分化，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同时，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生产力低下，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才能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和剥削，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并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1951年12月和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制订了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规定不能采用暴力剥夺，而必须采用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

采用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办合作社，即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逐步发展。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要逐步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发展生产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小农经济逐步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变革。

1953年4月，我县土改结束后，我分配在中共新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年冬，从上而下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粤北区党委即召开举办初级社试点工作会议，我县由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奕岳、一区区委书记黄中钦和二区区委书记黄克洪等3位同志参加。回来后，带工作组分别到一区黄陂、二区军屯两乡试办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谓初级社，就是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员个人所有的土地作股入社，归社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组织的生产劳动。合作社的总收入，除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缴纳农业税和提留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外，一部分按土地分红，另一部分按劳动日分红。

1954年2月上旬，黄陂、军屯两个初级社区正式成立，选出了社主任和社管理委员会。5月中旬，中共粤北区党委举办第二期办社干部学习班，我县派出20多名干部参加，我也参加了这期学习班。那时感到很新鲜，参加学习的同志都很认真地学习和讨论。学了一个星期，回到县后，县委把我们分到各区重点乡去办第二批9个初级社，我和张帆同志（县妇联主任）到县委的重点黄陂乡去筹建黄陂第二农业

社。

当时我们下乡工作，还同土改时一样，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张帆主任虽然刚生下小孩几个月，但还是带着小孩、保姆下乡。她住在建社筹委会主任陈子文家里，我住在乡长胡克传家里。建社的具体做法，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运用当地具体事例，说明小农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难免发生两极分化；宣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宣传自愿互利的政策。与此同时，挑选与训练建社骨干，组织建社筹委会。在充分做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召开报名入社大会。

起初，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青年，感到入社光荣，但也有不少思想顾虑，主要有四怕：一怕入社后不自由，二怕人多咀杂生产难搞好，三怕田地、耕牛入会后吃会吃亏，四怕劳力弱减少收入。针对农民的这种思想，我们在宣传工作中，主要抓住：第一，运用当地具体事实，说明小农经济是私有的、分散的、落后的，底子薄，经不起天灾人祸，一遇灾难，就会卖田地、借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农村会两极分化，城乡资本主义又会抬头，农村又会被资本主义占领的道理，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共同解决生产上的困难，才能走共同富裕道路。第二，讲清组织互助合作的好处，互助组比单干优越，合作社比互助组优越。①合作社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因地制宜，适宜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有利生产；②劳动力统一使用，能用其所长，可以把富余劳动力用来开展副业生产，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③人多力量大，可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产

量；④能积累资金，将来可以购置农业机械，提高生产力。第三，讲清党对发展互助合作的政策，是自愿、互利。我们的口号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要具备四个条件：一、能认识合作社的优越性；二、懂得土地、耕牛、农具入社的具体政策；三、相信合作社能增产增收；四、心愿、心愿、全家愿。第四，讲清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

在思想发动成熟后，即召开入社对象大会，报名入社。报名入社时要求每个社员都到会，进行“三报”：报姓名、报认识、报决心。报名后，经社员大会民主讨论通过，就成为正式社员。

经过半个多月工作，于6月中旬举行报名入社大会。这个联组有80多户农民，大部分都提出过申请，但因这是试办，没有经验，只批准对合作社较有认识、要求入社较坚决的16户贫农和下中农入社。

第二步：认真贯彻互利政策，充分发扬民主，做好“三评”工作（评土地产量，评劳动力底分，评耕牛农具折价）。从6月15日起转入第二步。我们首先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各户占有土地、耕牛、农具的情况，土地常年产量情况，以及各阶层对土地、耕牛、农具入股的具体意见等，然后由筹委会根据群众意见，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作出初步方案，交社员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制定方案：①土地根据土质、水利、阳光、耕作难易等条件，划片并等，定出各等产量。共分为8个等级，最高亩产800市斤，最低亩产600市斤，据此计算各户入股土地的产量。②劳力与土地分红比例，实行“四六”分红，即：按各户入股土地产量分给四成的稻谷，其余除生产投资、农业税、提留一定的公积金、公益金外，

按劳动日分红。③评劳动力，对每个社员，根据其劳动力强弱、熟练程度、技术高低等因素，评定劳动底分。在方法上，先评出各等的标准人，然后逐个进行自报公议，最高10分，最低的7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④评耕牛入股。我们首先介绍别地有4种办法：一是将各社员的耕牛，根据当时市价，折价入社，牛款由社负责分期付款；二是带牛入社，在评定各户牛价的基础上，牛款由社内按田亩或按劳力负担，各户互相抵销，多退少补；三是评定牛价，公养公用，保本付息，分期分批由社收买；四是私有、私养、租用。采用何种办法，让社员酝酿。经过反复酝酿、比较，筹委会据根大多数社员的意见，采用带牛入社的办法。选出三、五个老农组成评耕牛小组，再邀请耕牛经纪人当“参谋”，对各户耕牛进行评定牛价，按田亩与按劳力分担，计算到户，多退少补。

第三步：民主选举干部，成立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制定合作社章程，组织生产。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选出7人的社管理委员会，陈子文为主任，李国英（女）为副主任，陈子敬为会计。然后把50多个社员编为3个生产队（两个农业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划分了耕作区，开展副业生产。各队选出正副队长和记分员。

在生产中，当时就根据不同的工种，实行了3种包工形式：一是临时包工制，主要是农业生产，如割禾、犁田、耙田等，每亩给多少工分；二是包工包产包成本，超额奖励，如养猪、养鱼等；三是长年包工，如牧牛。

这一年，全县11个农业社，比上年增产粮食28.6%。

1954年9月，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大部分乡都要普遍试办合作社，县重点乡——黄陂，入社农户要达到

60%以上。我们驻黄陂工作组七八位同志，从9月25日开始，作新的分工，县人委秘书科长苏声驻一社开展扩社工作，县妇联主任张帆驻二社开展扩社工作，我和团县委的骆昶英到岭头联组新建第三社。当我们进村时，农民的思想比较紧张、混乱，普遍怕不准入社。因为前段当地联组干部宣传有些片面，做法欠妥，把一些农民的入社申请书退回给农民，并写上：“你这个人自私自利，觉悟不高，没有条件”等语。因而，有的怕入不了社，人家会说自己落后，不光彩；有的怕入不了社，拖拉机一到，自己的堰田会被调换耕山田。我们便通过各种会议或个别谈心，正确地、全面地宣传党的政策，讲明目前还缺乏办大社的经验，不可能一下子大家都入社，总要分期分批入社。暂时未入社的并不是落后。只要是完全自愿，积极要求入社，迟早总是可以入社的。对暂时未入社的人，也不会调换远田、山田给他耕的。在消除思想错觉的基础上，按建社、扩社的步骤进行。结果，第一社扩大到127户，第二社扩大到56户，第三社57户，全乡入社农户共240户，占全乡总农户的56%。

与此同时，全县107个乡镇中，有72个乡都在进行建社工作，到1955年春节前，全县办起新老社148个，入社农户437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3.9%。春节后，苏声同志调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刘守经同志到黄陂来，任工作组长，我和他一起对合作社的按件计工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研究。当时普遍采用的按件计工办法，只是一项一项农活定工分，如犁田一亩计多少分，插秧一亩计多少分。这样定，农活与农活之间很难平衡。后来，我从苏联奥沙基柯等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中得到启示，他们实行按件计酬，首先制定劳动定额。我们便在黄陂各社进行试点，结合我们的生产实

际，首先把一项农活，标定劳动定额（即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一个中等劳动力，正常劳动一天所能完成的质量和数量），然后把各种农活进行排队，根据农活的劳动强度、技术性程度分为5个等级，规定各个等级农活完成一个劳动定额应得的劳动报酬（工分）。实行这个办法，就较好地解决了各农活之间报酬不平衡的问题，较能体现按劳取酬。而且有了劳动定额，便于制订短期作业计划。因而，得到社干社员的欢迎。当时，粤北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萧少麟，到新丰兼任县委书记，他深入到黄陂调查研究，发现这一经验后，非常重视，指示我把这一做法带到面上去研究，然后写成文章。我便以中共新丰县委生产合作部的名义，写出《农业社推行按计工制的初步经验》一文，6月4日在我县的《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向全县推广。不久，粤北区党委的机关刊物《粤北通讯》作了转载。区党委农村部还召开各县驻重点社工作组组长座谈会，由我到会作了介绍。7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华南农村》相继转载。9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经审定，我这篇文章被编入该书，标题改为《个人计件制和小组计件制》。10月，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

这时，我县县委很重视巩固社的工作，建立了一支由36人组成的专职办社干部队伍，分别驻县、区重点社，大都长年吃住在社干部家里，专心致致地帮助农业社搞好经营管理，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和良种，贯彻“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县、区、乡领导都坚持“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各部门大力支持农业社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发展农副业生产。因此，1955年，全县148个农业

社中，大部分都办得比较好，水稻亩产比上年平均增产10.4%。增产的112个社，占75.6%；保产的7个，减产的29个。这时，有部分社员出现收入减少现象，思想波动，还有个别社员退出合作社。干部中也产生了“办社容易巩固难”的情绪。

1955年秋，县委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新丰县委联系本县实际，批判所谓“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决定秋前新建112个社，原有的148个老社进行扩大，秋后再新建389个社，到年底入社农户要发展到占总农户的62.6%。12月9日，县委召开整党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继续反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右倾”观点，批判所谓“前怕龙、后怕虎”的思想，指责“某些同志办事情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强调“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956年1月上旬，县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强调“放手依靠支部办社”，一方面继续扩大老社与新建一批初级社，另方面试办高级社。由于不断反右倾，不断修改合作化规划，在1955年的秋冬，全党的农村中心工作就是建社、并社、扩社以及转高级社。开始是一些老社（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后来出现不少刚办起来的初级社，接着就转为高级社，甚至有的直接就办高级社。到1956年2月10日，全县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1%，其中入高级社的农户就占总农户的68%。作为县委工作重点的黄陂、松园、会前3个乡，合并转为6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1.4%，基本上全部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什么叫高级社呢？就是劳动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不同，分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两种形式，其基本区别是：初级社搞土地参加分红，而高级社则取消土地分红，完全实行社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新丰办高级社，是1955年12月在黄陂、松园、会前等乡开始试办。我当时驻黄陂，是月23日集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通过总结两年来办初级社的成绩，在肯定初级社优越性的基础上，认识初级社由于土地参加分红，对土地少、劳力强的社员劳动积极性有一定的影响，高级社就能解决这个矛盾，高级社比初级社更具有许多优越性。接着宣传高级社的政策、做法。当干部普遍要求转高级社时，便组成筹委会，把黄陂乡原有3个初级社合并转为高级社，然后宣传政策，讨论具体方案。主要内容是：①土地无条件取消报酬，变土地私人所有制为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除自留地以外，全部土地归合作社统一经营；②自留地，一般每人5—8厘；③各户原负担的公、余粮任务，全部转由合作社负责缴交。

这时，由于大势所趋，入社、转社象“大风暴”一样，农民纷纷申请加入高级社，仅一个月时间，黄陂、松园、会前3个乡，91.4%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1956年1月21日，3个乡的社员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向县委、县人委报喜。

1956年，新丰县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由于社员劳动积极性高涨，县、区又加强了对农业社的领导，在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全县粮食获得丰收，增产11万担，比上年增25.2%，年终人均分配（不含家庭副业收入）达70元，人均口粮在550—600市斤之间，83%的社员比上年增加了收入。（下转第79页）

连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南杰

1952年，党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决定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省、地、县委对中央这一指示十分重视。我受组织的派遣，于1954年秋参加了韶关地委统战部为了做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而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落实党的赎买政策，搞好试点厂（店）公私合营工作。回县后向县委汇报了会议情况，经县委决定，先搞连县火柴厂和埠康米机，并完善连县印刷厂公私合营，总结经验，向全县工商界推广，酝酿在来年掀起公私合营高潮。我从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作，现经回忆，写出如下三个问题。

（一）连县私营工商业的兴衰和特点

连县毗邻湘桂，连州成为连阳四属山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有不少名人，被贬于此，有着悠久的历史。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府机关及大专院校等约有40多个单位迁来连县。那时候，商业兴旺发达，星子镇有八邑会馆，连州街有南海、番禺、顺德、三水、广州、清远、湖南、广西等会馆，应运而生，后演变为广商会、楚商会、土商会。捐款摊派比例是，广商会占60%，楚商会占30%，土商会（连县本

地商)占10%;计商家有6,500户,从业人员9,600多人。抗日胜利后,大商家们“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回广州、香港经营的不少,到1949年10月前,只剩下2,788户,从业4,202人,占40%(去了60%)。到解放后1950年冬统计,有中小户商家1,252户,从业有3,071人;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因土改有部分商户地主兼工商业,或工商业兼地主的,被退租退押给农民而破了产,到“三反”、“五反”时,少数不法商人腐蚀干部施加五毒或处以补税等又倒闭了少部分商家。

那时连县私营工商业有四多三少的特点:

①外地经商多,占89%;②会馆多,将达20个;

③肩挑摊贩多,从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据《西学东渐记》一书记载:“连州南风岭(南风坳),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劳动人民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④慈善公益慷慨捐助多。如1931年1月23日红军路过连州时协助救火,第二天火灭,连州商人抬来十多头烧猪;还有大米、生猪、布匹、药材等物资劳军,并捐赠四万光洋为红军作路费等。三少是:①大商户少,②为富不仁少,③违法乱纪、唯利是图少。他们在经营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连县人民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及县委的部署和做法

(1)赎买政策是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而定的。

赎买政策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恩格斯说：“马克思不只一次地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1921年，列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又重申了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出：“如果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屈服，是在赎买政策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完全容许的。”（《列宁全集》第32卷329页）毛主席也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毛选第五卷98页）。

新中国的诞生，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中华民族包括工商业者在内，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的进步人士与我党合作、共事，并肩战斗，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倒了三大敌人，他们又拥护我党的声明和主张，愿意接受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把企业交给国家，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连县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时，捐款7亿多元。购买公债四亿多元。

（2）贯彻执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从初级到高级，从点到面，逐步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我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两个步骤实现的。

第一步，把民族资本主义转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我县与全国一样，从1950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对现有私人工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购，统购统销，如县火柴厂在合营前，由县百货公司委托加工、订货、包销。对埠康米机，则由县粮食局加工等。对商业委托经销、代销，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外部的联合，而由社会主义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其好处有四点：

①使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制止无政府状态。②通过国家政策，给他们有利可得。③发挥工人对企业生产经营监督作用。④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前途。其次，在初级阶段，限制他们所得的利润，只分得利润的四分之一，叫做“四马分肥”。即是①所得税占34.5%，②福利费（工人的福利基金）占15%，③公积金（为企业扩大生产设备，④资方利润占20.5%。（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

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即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这是根本的变化。如个别厂（店），或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年连县火柴厂、埠康米机、县印刷厂、县汽车运输社等转为公私合营，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但对资本家要执行赎买政策，做到“五不变”：①七年定息不变（后增加3年共10年），②职务不变（原来是厂长或经理的合营后照安排），③高薪不变（如原火柴厂的资本家劳泳球厂长工资是75元、会计吴观炳（资本家）63元、工人平均30元，合营后不减照发），④生活待遇不变，一视同仁，⑤对企业 and 人的改造不变，而人逐步改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五点不变，是公私合营企业的特征，资本家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县委对公私合营工作很重视，部署做法较稳妥，指示县委统战部、工业部，组织工作组，先搞火柴厂和埠康米机，作为试点，并完善印刷厂、汽车运输社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向全县工商业者推广，迎接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因此，县委工业部戴馨部长抽调黄水勤同志和王传明（拟当厂公方代表）党员干部和我三人组成工作组，学习政策文件一天，就在1955年8月中旬（13、14日）到县火柴厂搞试点工作。

记得入厂时我们的做法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宣传政策，打消顾虑，摸情况，申请合营，成立合营筹委会（由公私方代表及工人党团员代表参加），时间8天；第二步是清产核资、定股、定息、时间10天；第三步是调整机构，安排人员，成立董事会，订章程订制度，正式合营，时间8天。总共26天，便结束了火柴厂公私合营的工作。由于我们工作队，一入厂就依靠了该厂的党团员，该厂有工人60人，其中党员褶树养一人，团员有莫有兴、罗玉如、胡金、陈二喜、吴丽专等五人，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他们的工作、生产，均起带头作用。特别是对资本家和企业的情况，向工作队提供可靠材料，使合营工作顺利开展。如资本家吴观炳、黄诗业、劳泳球、劳肇韬等人对合营工作顾虑很大，他们一怕厂的财产被没收，二怕减少工资，三怕不能当厂长和会计，四怕合营后生活困难。我们掌握这些情况后，当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包括资本家在内），进行宣传公私合营的政策、意义、做法、以及赎买政策、“五不变”政策：①定息七年期限不变；（后来又延长定息三年共十年）②职务不变；（原来厂长或会计等合营后照当付厂长和会计）③高薪不变；（如厂长劳泳芳75元，会计63元，采购员60元，合营后如数照领，一分不减）④生活待遇不变；⑤对企业 and 人的改造不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经过宣传和解释之后，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劳泳球、吴观炳都说：“听到动员报告之后，如释重担，党的赎买政策对我们这样的关怀，政策这么好，没有什么意见了。”党员褶树养、团员莫有兴说：“合营后我们有了公方代表领导，我们工人生产工作更积极了。”经过8天的讨论，人人提高认识，打消顾虑，进而申请合营，成立火柴厂公私合营筹委会。王传明是公方代表，任主任，劳泳球

(资方)为副主任,吴观炳(资方会计)、褶树养(党员、工人)、莫有兴(团员、工人)等为成员。在筹委会领导下,进行第二、三步的工作。即清产、核定股息定息、发股票、调和整机构,安排人事、成立董事会,订章程、制度,总结合营工作并向党政部门报喜。

从火柴厂公私合营试点来看,县委的部署和做法是成功的。县委要我总结其经验并介绍、推广到工商界去。县委认为资方代表劳泳球副厂长表现积极,能把厂交给国家,率先配合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应给以重任。经批准,劳泳球为连县工商联主委、兼连县商业局副局长,后又安排为县人民代表,选为县政府委员。这个消息,传到县工商联,广大工商业者认为,这是莫大的鼓舞,是工商业者的福音。他们听到劳泳球副厂长在县工商联介绍火柴厂搞合营的经过,及县委对他委以重任时激动的讲话:“我厂只有公私合营才有前途和幸福,党的赎买政策和“五不变”政策是党对工商业者极大的关怀”。各个工商业者在工商联学习时,皆为之动容,要求合营,这样一来,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1955年9月10日结束了火柴厂合营工作,于9月中旬,县委工业部戴部长又调来成隆固同志(中共党员,拟到埠康米机当公方代表)和我与黄水勤同志三人到埠康米机搞合营工作。但该厂过去的老板是工商业兼地主,土地改革时,退租退押退给西岸奎池乡农会,他们派罗云惠农民,住厂为代理人,因广西省贺县一资本家在该厂有二股,托工人周耀棠为代理人。故埠康米机无资本家,全厂全靠一台木炭发动机,养活20多工人,县粮食局由该厂加工,因机器残旧,无老板投资,机器时开时停,工人工资基本发不出。我们到厂后,讲明来意,宣传政策,进行公私合营。农民代理也好,

工人也好，都十分欢迎，而大解“梁均，二解梁玉章，邓志三个师傅，连夜修理机器，迎接合营的到来。机器修好后，生产又火红起来了，昔日象死水一潭的埠康米机，终于起死回生，活跃起来。因厂内没有资方人员开会协商就相应地减少些工作，时间20天左右便完成了合营工作，其做法基本上与火柴厂相同。在1955年10月5日庆祝合营，在公方代表成隆固同志领导之下工厂的干部群众扭成一股绳，使该厂正常生产，居民农民机关干部都能吃到白米。我们又接着，在1955年10月10日到连县印刷厂和县汽车运输社检查，那里完全是公私合营单位。因为印刷厂、汽车运输社均在1950年当官僚资产给国家没收了，但有部分私人工商业者，仍有股份，故此，在1955年对印刷厂私方人员梁镜波作为私方代表，批准他为副厂长。对汽车运输社则批准关怀为私方代表，并定股定息，发给股票。从此，生产业务工作起了很大的变化。如县印刷厂1953年有24个工人，工业产值7.09万元，1954年12万元，1955年6月批准梁镜波为该厂副厂长后，产值达17.59万元，比未合营前增加工业产值46%。总而言之，连县在1955年时搞公私合营的企业共四个，不论在生产上、贯彻赎买政策上都做得较好，给连县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公私合营带了好头。特别是县火柴厂合营经验较全面。有资本家在厂三人，工人有57人，（其中中共党员1人，团员5人）在公方代表领导下，依靠党团员，成立该厂生产管理委员会，从而调动了全厂人员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私方人员劳肇韬也到广西推销火柴，打开了销路，使工厂从亏损扭转为盈余，工业产值，从1954年合营前的8,080元，到1955年9月合营后仅三个多月，增到8,650元，增产8%，并补发了拖欠数月的工人工资。到1956年底，上缴利润4,798元。由于

贯彻了党中央的赎买政策，使资本家从“五怕”到“六喜”。六喜是：一喜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二喜定股定息，发给股票，三喜有职有权。四喜与公方代表、工人三方扭成一股绳，生产上升。五喜生活有保障，六喜县委政府对私方人员的安排。这个试点的经验，在连县工商界中广为传播。

（3）“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县委掀起合营高潮的第二个部署

1955年冬，连县大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前浪推后浪，震撼了全县各乡镇。因此，连县众多工商业者，在上述四个合营工厂的经验影响下，也不示弱，纷纷要求参加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当时县委见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便加快了对“私改”的步伐，做出如下部署。

1. 在1955年12月底成立“对资改造领导小组”，由张秀锋同志负责，并成立“资改办公室”，由黎明同志负责有关对资改造的具体业务指导工作。

2. 在1955年12月28—30日抽调一批政策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组成工作组，准备派到各行业去搞公私合营工作，当公方代表。那时有叶宏享、成崇俊、蔡义君、黄毓秀、余敏、黄传由、李荐等10多个同志被分到百货、果杂、牛奶场、五金、陶瓷、药品、饮服等10多个行业做宣传发动工作。经过二天学习之后，提高了认识，明确政策做法，在1956年元月初，奔赴各行业，开展合营宣传摸底工作（第一步）。

3. 县委在1956年元月上旬召开了全县工商业者代表人物座谈会。当时我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记录，现在回忆

起来有如下情况：

①时间地点：在1956年元月3月在县委会楼上（即现纪检会楼上）

②内容：把党的赎买政策、做法向工商界代表进行宣传，和他们协商，打消他们“五怕”顾虑，鼓励工商业者参与公私合营工作，为人民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

③会议主持人：是中共连县县委书记王文秀和副书记兼县长张秀锋。

④工商界代表人物有大中小资本家和小业主。其中有大户利盛祥号老板易子常、宝同兴号李志钊、火柴厂副厂长劳泳球（工商联主委）、印刷厂副厂长梁镜波、百货业胡仲文、西药业常建文、纺织业雷二娇（女）以及黄根、王秀衡、欧维新、吴邦乃、马广衡、麦景兰（女）、练福麟等10多人参加。

会上，王文秀书记强调指出：“党中央在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又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入了高级阶段，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各工商业者投入社会主义改造行列中，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王书记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接着县工商联主委、火柴厂副厂长劳泳球说：“王书记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工商业者，日夜盼望合营的机会盼到了，这是我们工商业者唯一的出路。如我厂合营前生产搞不上去，工资发不出，合营后，现在生产起了极大变化，把火柴远销到广西、湖南等地去。经营正是方兴未艾”。大商家易子常是工商联常委，他说：“不管定不定息，这条道路一定要走的，为了国家的兴旺，为了民族的利益，我愿将企业交

给国家来办，相信政府不会亏我们。”（他为人大方慷慨，对钱财视如粪土，抗美援朝捐献认购国家公债他是很积极的。）大家接着热烈发言，要求早日派工作队来。会议从晚上7时开到10时，在结束前张秀锋县长作了总结，并要求到会工商业者回去广泛宣传党的五不变政策，及与工作组一起共同商量，把企业公私合营工作搞好，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由于县委重视，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在1956年2月5日，全县就结束了公私合营工作。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我们的公方代表都能贯彻党的赎买政策。如棉布业刘平商号，他所增资的黄金四两八钱和光洋双毫220元，后来都按政策折价币648元退还给他本人。所以，工商界人士感到满意。在2月初，县工商业者们兴高彩烈，舞狮子、穿新装、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成功，并向县党委和县政府报告、报喜。据统计，当时（1956年2月底止）全县私营工业有10户（从业人员有154人，资金9.44万元），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私营商业有133户，已实行公私合营的有131户（从业人员377人，资金20.46万元）占总户数98.3%；小商贩原有1569户，组织起来与吸收入国营的有1293户，占小商贩总户数82.5%。全县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贯彻执行党的赎买政策、和“五不变”政策，是公私合营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对原有274个私方从业人员，都给安排在企业里继续工作，其中有23人安排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副经理或副厂长，有80人当上了门市部的主任，让他们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其专长作用。由于职务不变，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对原工资较高的，

合营后我们也不减他们的工资，并发给股票（共领十年利息到1966年才停止）。因此，他们在公方代表领导下，合作共事，把企业经营、生产推向新的阶段，从而改善了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如连县棉布业汤生为公方代表，说：“在1955年7月的营业额是11,380元，到1956年7月营业额达28,830元，增加一倍有多”。又如连州百货业合营前只有300多种商品，合营后3个月增加到800多种，4个月后增加到1,300种。连州镇合作百货商店，1955年全行业营业额59,076元，到1956年合营后营业额有14.92万元，增加了90,138元。公私合营后，上半年工商业者有31人被评为县先进工作（生产）者，38人被评为优良工作者，有32人被评为积极分子。（据县工商联1956年工作总结）

（4）地委、县委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

1956年2月份，工商业者已把企业交给国家，所有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后的问题是对人的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对企业实行改造较易，一个月即合营过来。但要改造人的思想，使私营工商业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并不容易。韶关地委开办了社会主义学院，要求各县工商业的骨干人员都要去学习，每次4个月。我县有关人员从1956年起分期分批参加学习，到1959年，基本上轮训完。但后来要取消定息，如何开展这个关键工作，中共连县县委统战部拟出在1960年至1965，对资改造的计划，摘要如下：

一、政治比例是：①左派，达到18—20%，②中间派达到30—32%，③中右派，达到10—14%。即是要求在取消定息时，必须对他们加一把力，把他们改造成为符合六项政治标准的人。

二、采取多种多样方式进行改造。

①轮流下放（短期）。计划在1960年去10%，1961年去第二批占30%，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主义义务劳动。如站柜台，下车间，支援农村中心工作，或参加生产，送货下乡，收购农副产品的实践工作。

②学习“毛著”，改变世界观。要求参加学习，并发给书本自学，由工商联组织。

③送往韶关地委开办的马列主义学院进行学习。

④参加企业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三）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工商政策

1982年县委批准成立县工商小组，由原工商联副主委、县政协常委胡仲文为组长，许操典、梁镜波、马广衡、黄根等五人为成员，其任务是协助落实党的工商政策和筹备恢复工商联活动。几年来，他们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

①区别“三小”有209人。

②补发“文革”时停发利息166人，合计人民币441144元。

③协助政法部门撤销原判劳教、管制共8人。

④收回“文革”时遣送农村插队落户11人。

⑤收回动员退职作自动离职的有13人。

⑥补发“文革”期间停发工资的有12人，共31,052元。

⑦纠正“私改”房屋中错改了的生活用房有11户，共1000多平方米。

⑧退还“文革”时查抄的私人光洋（折价2,700元）。

⑨退还工商界生活互助金4,600元。

⑩恢复干部身份、政治待遇、和合营时的副经理副厂长职务的共23人。

⑪落实工商联常委政策，从集体所有制工厂调回国营企业，并办理退休1人。

通过落实党的工商政策，他们的上层人物反映良好。如工商联副主委胡仲文说：“共产党领导好。我过去开永兴号资金2,695.29元，卖百货请工人有2人，但东奔西跑去进货，又怕土匪抢劫，真是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公私合营后，又有十年定息，全家子女都参加企业工作，我又当了国家干部，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梁镜波（原印刷厂副厂长）说：

“我体会到公私合营是给私方人员带来幸福，多数人成为国家干部或工人。我还被评为先进工作积极分子，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仍受到群众和单位领导的关怀，有时回到厂里，他们还征求我的意见，目前我的儿子起了新屋，生活大大改善了，这是党领导下而得来的。”

（上接第66页）

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基层干部缺乏管理经验，又急于办大社，全面开花，当时就有20%左右的社员对转为高级社是不够自愿的；年终结算，有19个社减产，全县有15%的社员减少了收入。据县委当时的测算，全县321个社中，巩固的196个，基本巩固的86个，有39个社问题较多，不够巩固。

（本文作者是新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接管旧税务，开办新税务

何 湘

韶关解放初期，由于政权更易，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其中接管旧税务开办新税务就是一项重要的城市接管工作。我们地方部队配合解放大军进城后，曲江县（包括韶关市）实行军管。我奉命以军管工作人员身份负责接管国民党的税务机关，同时尽快开展征税工作。我先后担任曲江县、韶关市（从县分开设置的市）税务局局长和专区税务局副局长之职，由于刚从部队转业，对新工作不熟悉，情况又生疏，深感责重难负，但考虑到这项工作事关政权的巩固与祖国的建设问题，搞好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又是紧急的支前任务（当时我省内还有大片地区尚待解放），因而愉快地到职工作。当时，唯有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把工作搞好。现值韶关解放四十二周年之际，把我当时接管税务工作的情况简单回忆如下：

一、关于税法税规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尚未完全解放，还没有全国性和全省性的税务法规可依。老的解放地区是怎样征税的？我们也不知道，而税务是细致复杂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工作，要收税总要先有个法规做依据（那怕不够完善的也可）以往国民党政府倒是有若干税务法规的，怎样对待它？现在还有无可取之处呢？如果不要它，那好办，一个命令宣布废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开展工作，要稳步前进，

要防止出现“真空”，还要防乱防滥，否则，将有损人民政府威信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因此，在新的税务法规还没有颁布前，我们要有一个过渡的办法，这就是暂时仍按照国民党的税种税率和征收程序等参照办理。当时我们接管的税种有所得税、过份利润税、工商营业税、货物税、屠宰税、印花税、遗产税、筵席税、车船牌照税等，我们考虑到这些税种主要是从商品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计征的，如所得税，过份利润税是从利润与资本的比例中征收其利润部分的，如利润与资本的比例越大，征收的比例则越大（累进税）；工商营业税是按商品销售营业额收取一定的百分比税款的（比例税），显然，这些从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环节中计征税款的办法是“经济范畴上的现象，应与国民党税收性质的反动性有区别，因为这些经济上的现象，不论那种社会形态的税收都是有的，问题是怎样去利用。至于其他税种，如屠宰是按宰杀猪、牛每头重量多少计征的，这种计征方法是属于简浅的算术计算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民党由于它的反动性质所决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仅税收性质反动，不合理，甚至极端荒谬，如烟捐，赌捐，花捐之类（有的已在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停征），现在我们也必须理所当然的继续予以禁征。当然，我们参照旧税法征税，出现某些畸轻畸重的不合理现象，一时尚难于避免，但也要正确认识，所谓公平合理问题是不能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去考虑而只能逐步加以解决的，特别是税务工作已由人民政府办理，税款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国民党为了维护反动统治所进行的盘敲勒征、贪污肥私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当时纳税人对人民政府税收是拥护的。同时，为了尽量做到税负公平合理，我们还实行“民主评议”办法，由各行各业组成评议小

组（有工人参加），对应纳税款进行评议，再由税务机关核定。实践证明，这种“群众路线”办税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群众反映也是良好的。

二、税务工作人员问题。由于初开办时，新的税务人员很少，而且又不熟业务，开展工作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正确对待国民党政府遗下来的旧职人员，按照1949年4月25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精神，对他们没有采取一脚踢开的做法，我们对这些人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如确能服从人民政府命令，不搞破坏，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凡有一技之长的都分别量才录用。我们公开办理旧职人员登记，对他们讲明，要认清形势，勿听信谣言，要消除顾虑等，希望他们从过去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力转到今后为人民服务来。还要他们交出和保护好各种资财，图表，帐册，档案等，以便听候接管和处理。同时，对他们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总之，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不但对广大旧职人员不加歧视，而且满腔热忱地给予帮助，为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愉快的为人民服务。果然，不少旧职人员陆续回来供职并有不少人成为新的称职的税务人员。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又大力举办各种学习班，加强培训新参加工作的税务人员，税收队伍逐步补充人员，以解决接管初时人员缺少的问题。

三、税务人员思想工作作风问题。这个问题是工作能否搞好的关键问题，人民的税务工作人员，必须要有新的思想作风，新的精神。我们从德才上全面考虑，概括的说，一要廉、二要能，三要勤。“廉”即是不但政治思想要好，还要廉洁奉公，对这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例如在执行工作时抽了纳税人一支香烟，也要受到批评，更不要说以权谋私贪污

舞弊了。“能”，即是要求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熟悉各种业务。为此，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各种法规、征收方法和程序等，有时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探讨，如税收性质、作用、税收分类、税负转嫁等。“勤”，即是勤勤恳恳，反对工作疲沓拖拉和纪律松弛等。为要达到以上要求，十分强调搞好学习和改造，此外还强调要搞好收税人与纳税人（征税关系）的教育，以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收税人与纳税人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官民对立状态。同时，还加强宣传工作，对纳税表现好的，我们给予适当表扬或奖励，对偷漏税款的则给予适当处罚。如当时火柴工业资本家关崇振先生，他热爱新社会，带头维护国家税收。他在一次工商业户纳税会议上说：“我们真心真意遵章纳税，也希望税局同志不要总把我们（资本家）都看作是偷税漏税的”，我们认为他说出了真心话，是说到做到，是爱国和支援解放事业的实际行动，于是，当即予以表扬。（关崇振先生曾任韶关市副市长，但当时尚未任此职）；反之，对有些有偷漏税款行为的人，如纸张行业资本家何××我们除依法追缴税款和给予适当处罚外，并要他公开登报检讨。由于抓好以上各方面工作，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威望逐步提高，一个与旧政府迥然不同的新的办税机构也逐步形成，人民的税务人员正以崭新的面貌和精神从事新中国的税务工作，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韶关市、县城镇储蓄发展纪略

(1950年至1987年)

徐伟坚

城镇储蓄，是城镇居民、职工把待用货币积蓄在银行里的存款。

储蓄存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资金来源之一，也是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底，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89170.3万元，占各专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的37.56%；占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余额32.23%。各专业银行的城镇储蓄存款余额所占比重是：工商银行占80.94%；农业银行占17.16%；中国银行占0.94%；韶关建设银行占0.5%；人民银行占0.46%。按种类分：定期存款62465.6万元，定活两便储蓄1883万元，活期储蓄存款24821.7万元。

至1987年底，城镇储蓄存款余额分布情况：韶关市区34253.6万元，乳源县2448万元，仁化县4580.6万元，南雄县5359.8万元，始兴县3300.2万元，乐昌县10901.1万元，连县5361.2万元，连南县1864.6万元，连山县1436.3万元，阳山县2885.5万元，英德县8071万元，翁源县3331.8万元，曲江县5376.6万元。

韶关市的城镇储蓄事业，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萌芽、发展、挫折、再发展和飞跃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

1949年10月6日，韶关市解放。尔后，人民解放军派军代表接收国民政府银行。1950年6月底前，韶关地区已设银行机构有中国人民银行曲江办事处，南雄、乐昌、连县、清远、新丰、乳源、翁源、始兴等县支行。仁化、连山、阳山、佛岗和从化等县支行也于7月至12月相继成立。

这一时期，城镇储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是处于萌芽阶段。

（一）打击金融投机，稳定金融市场，为开展人民储蓄打好基础。

解放初，韶关地区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统治影响，遗留下民生凋敝、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人民群众哪有余钱储蓄。当时，广大城乡流通着美钞、港币、银圆和双毫，有的地方进行物物交换，金融投机盛行，高利贷猖獗，私商囤积套购，物价混乱，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生活，对开展储蓄很不利。韶关人民银行针对这种情况，首要的任务是肃清金银、外币的流通，并打击金融投机和高利贷盘剥，让人民币占领市场，以稳定物价，支持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国家规定合理的牌价以收购金银、外币，使人民币很快成为市场上唯一行使、计价、流通的货币。在稳定人民币的基础上，城镇储蓄业务也就日臻完善而活跃起来。

（二）从折实存款、双保储蓄发展为货币储蓄。

1950年3月，社会物价尚未稳定，广东省人民银行选择

八个支行开展“折实储蓄”，曲江支行为其中之一。4月底，北江地区16个县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122元（已折成新人民币，以下均为新币）。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人们对原先开办的折实存款的兴趣不大了，但仍有部分群众对货币储蓄尚有顾虑。为适应这一新情况，5月中旬，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和“定活两便储蓄”，并停办折实储蓄。10月，执行总行9月全国储蓄会议制定的储蓄章程，储蓄业务统一为五类九种：（1）活期储蓄存款，分为存折户和支票户储蓄；（2）定期储蓄存款，分为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3）定额储蓄存款；（4）有奖定期储蓄存款；（5）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年末，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45300元。

1951年，国家经济情况继续好转，11月，双保定额改为货币定额（编者注：双保定额即保本保值以实物为定额），人民储蓄开始纳入以货币为单位的正常轨道。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为111万元，储户有203070户。

1952年6月底，停办保本保值储蓄，7月，完全的货币储蓄全面推开。年末，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160万元。以非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储蓄额仅为6元9角6分。这是储蓄的萌芽阶段。

二、国家进入计划经济，储蓄处于发展时期（1953—1957年）。

1953年，国民经济已经恢复，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期，党中央公布了总路线、总任务，为储蓄事业的发展 and 完

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期储蓄业务有如下特点：

（一）清偿解放前银钱业存（汇）款

抗日战争时期，韶关市是广东省会，因此，从1938年至1944年间，国外汇入的侨汇以及中、交、农、中央信托局、中央储蓄会、广东省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曲江邮局等金融机构的存、汇款，均集中在韶关市人民银行进行登记偿付。清偿办法分三个时期进行计算：（1）1937年12月31日以前为第一阶段；（2）1938年1月1日至1948年8月18日止为第二阶段；（3）1948年8月19日至解放之时为第三阶段。

根据清偿办法规定：定期存款、侨汇按各级偿还金额偿付；活期存款、国内汇款，按各级偿还金额八折偿付。韶关市从1953年3月开始登记工作，期限一年。后为照顾国外华侨远在国外，交通不便，人民银行总行于1956年9月30日通告：将华侨存款登记期限适当延长至1957年10月31日止。1958年12月底，韶关市人民银行清偿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广州中央储蓄会、曲江邮局的汇款及储蓄存款共348户，折合人民币21664.78元。

（二）配合农村粮食统购，举办售粮优待储蓄。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为了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活动，人民政府在农村中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人民银行总行为配合这一政策的贯彻，于1953年11月21日发出《关于在农村积极开展售粮储蓄的指示》。各县支行、营业所在当地党政部门统一领导下，组织了一批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推销售粮储蓄工作。一般采取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宣传售粮与宣传储蓄相结合；登记售粮与登记储蓄相结合；入仓付款与办理储蓄相结合。由于事前做好宣传、服务，吸储工作

取得一定成绩。据统计，韶关地区在粮食统购期间，优待农民售粮储蓄吸储额为313万元。1955年9月停办了此种储蓄。

（三）贯彻储蓄方针，加强网点建设。

1954年10月4日至9日，中国人民银行粤北办事处第一次召开地区城市储蓄工作会议，传达了省行八月城市储蓄会议精神，同时贯彻了总行召开各区行和重点省、市分行第一次城市储蓄工作会议制定的工作方针：“在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广泛宣传，开展以职工为主兼顾其他阶层的储蓄工作，并扩充小型机构，贯彻自愿原则，以培养人民节约储蓄美德，为国家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

1955年，人民银行粤北办事处，认真地贯彻广东省分行“必须普设小型机构，加强服务，便利群众存取款”的指示后，全市储蓄网点有所发展。1956年，积极贯彻储蓄机构大发展的方针，是年新建储蓄所28个，代办所51个，分理处14个，加上各支行和营业所专、兼办储蓄业务柜组共有204个。当年全市非农业人口为38万人，平均1862人便有一个储蓄机构或兼办网点。1957年，储蓄网点又增加到243个，平均1570个非农业人口有一个储蓄网点，全地区年末城镇储蓄余额达658.7万元，完成省行分配年度任务103%；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有18个县的支行（含清远、佛岗、从化、新丰），翁源县支行超额完成任务，名列前茅。

三、“二五”时期（1958—196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较好

的形势，农村生产合作社获得丰收，城市工业开始振兴，市场繁荣，全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之际，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工作进行中，指导方针有过严重的失误，因此，韶关市的城镇储蓄事业在发展之中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经历了一定的干扰和挫折。这一时期的工作特点如下：

（一）掀起死宝变活财运动，储蓄多样化。

1958年9月，人民银行韶关中心支行在韶关市支行召开储蓄工作现场会议，会议决定储蓄工作也要大搞群众运动。是年冬，韶关市支行在市长的支持下，掀起了“死宝变活财”的群众献储运动。韶关市区仅苦战了七昼夜，就发动群众献售黄金320两，光洋2899个，双毫20660个，另外还有许多外钞和珠宝，如市区水上居民袁世姑，将珍存六十多年的一对金手镯、市民李雪英将十多年前的嫁妆品（金元宝）献售后转储银行。曲江县支行仅在十天内就发动群众献售黄金96两，银圆2871个，双毫52342个，共吸储61万元。在一个月內，韶关地区群众献售黄金901两（每两黄金折合人民币为90元），白银24322两。通过“死宝变活财”的群众运动，开拓了新的储源。储蓄种类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多样化，如“活期有奖储蓄、定额有奖储蓄、零存整取有奖储蓄、钢铁储蓄、结婚储蓄、迎春储蓄、长寿储蓄等等”。总之，各行都可以给储蓄命名，但是，会计科目还是按上级行统一规定名称。

（二）“大跃进”时期刮“浮夸风”，殃及储蓄。

“大跃进”始于1958年，“浮夸风”之弊也启于此。这一年储蓄任务出现了高指标，韶关地区年初下达年度任务是450万元，尔后是744万元，到年底又要求完成2千万元。有

不少地方的银行为了完成任务，搞公款储蓄，单位发工资全额转储蓄存款，有的月末转入，下月初转出。由于任务与实际储源脱节，弄虚作假也无际于事，结果全地区年底城镇储蓄存款余额只达1328.9万元，仅完成任务66.44%。此年储蓄任务的浮夸数目，至1959年9月落实为477.7万元，占当年储蓄余额的35.94%。

（三）经济困难时期，储蓄走下坡路。

大跃进后的1959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至1962年末，全市城镇储蓄余额下降为760.4万元。按韶关实际情况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企业大量精减职工，相对减少工资投放，储源自然萎缩；二是商品供不应求，群众重物轻钱。

1961年，韶关专区精减城镇人口要求达到121684人。据1961年8月15日统计，已压缩的人口86438人，其余35246人至1962年6月底压缩完毕。由于大量精减压缩企业职工，工资投放相应减少。据1962年韶关专区统计，1至7月份工资投放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447.5万元。被精减压缩的职工，不但没参加储蓄，而且还要提取原有储蓄存款回农村去。

1959年至1962年，物资短缺，粮食紧张，供不应求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当时，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支配着不少人，因此，不少群众不愿参加储蓄，而且还提取原有存款购买食品和其他商品。此时期城镇储蓄平均递增速度仅为8.1%，是解放以来速度最低的一个时期，也是解放后储蓄事业在历史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

韶关市各级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了储蓄网点，充实了储蓄干部，清理帐务，健全制度，开辟储源，使储蓄事业又向前迈进。其工作特点如下：

（一）整顿机构，充实人员，健全制度。

在贯彻银行工作“六条”的基础上，韶关地区银行对原有70多个代办所进行清理整顿，凡不符合设点条件的储蓄网点实行撤并；属于有发展前途而因业务不熟悉者，银行派员加强辅导。全区在三年调整期中，适当增设了储蓄机构，充实了储蓄专业干部。1965年末统计：全市储蓄机构增至21个，专业干部121人，比1962年增设储蓄所8个，增员69人。

对“大跃进”年代浮夸的储蓄余额，各支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报地区银行，经核实调整，1965年底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1426.6万元。此时期的平均递增速度为23.3%。

各储蓄所、站和专柜，对“大跃进”时期因推行“拆柜台、一手清、一本帐”而遗留的错乱帐目，组织专人进行清理。经过清理整顿，储蓄业务制度得以恢复和健全执行。

（二）在特定时机抓好吸储工作。

1964年4月15日，各级银行执行国务院关于“兑换三种人民币”（苏联代印版：叁元、伍元和拾元券）的指示。在兑换期间，储蓄宣传工作紧密配合，吸储效果甚好。据统计，全市从4月15日起，至当月30日止，共收兑“三种人民币”814万元，其中转为储蓄存款有187万元，占兑换总额的22.97%。韶关市区两个储蓄所自4月15日至月底，新增储户1734户。

（三）打击高利贷活动，提倡组织储金会。

1964年至196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地区中心支

行，针对重新抬头的高利贷活动进行了重点调查研究。首先组织工作组到清远、英德作调查试点，后将试点经验布置各县支行开展重点调查。据当时调查统计，发现高利贷374宗，高利贷者141人，放高利贷19929元；最低利率3%，最高利率100%。揭发有息标会346宗，参加者4134人；最低利率2%，最高利率80%。高利贷形式有两种，一是借钱还钱，二是借物还现钱。鉴于上述情况，银行主动向党委汇报，对高利贷者分别批评教育，个别严重者进行严厉打击。在开展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宣传组织居民互助储金会。从而推动了全市城镇储蓄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大革命”与储蓄挫折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也是储蓄事业遭受第二次挫折时期。这一时期，城镇储蓄平均递增速度仅10.7%；略高于“二五”时期。

“文革”初期，林彪反党集团利用红卫兵运动，在社会上刮起所谓“破四旧”歪风，制造谬论：“银行是资本主义产物，要加以彻底砸烂。”就在“四人帮”的怂恿下，不少地方的红卫兵大搞“乱揪、乱斗、乱抄家”，强行查抄了不少群众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严重地破坏了国家银行和储户的关系，干扰和损害了人民群众参加储蓄的积极性。

1968年2月18日，林彪反党集团借口割断反革命活动经费，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发《二、一八紧急通知》，勒令银行冻结十种人的存款（即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资本家、知识分子这十种人）。据全省统计，从1966

年至1970年，被查抄、冻结的储蓄存款在一千万元以上。韶关地区也在十万元之上。

“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散布谬论：“利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是剥削行为。”由此之故，有的红卫兵组织，强令银行停止支付储蓄存款利息。有的银行被迫举办无息存款。

1966年9月，周总理指示：“不要搞无息存款，以免给群众施加政治压力。”1972年，人民银行总行修订储蓄章程，明确地把存款有息作为一项原则列入新的储蓄章程。可是，1975年“四人帮”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机会，制造谎言：“储蓄利息是剥削”，“存款没有继承权”等等。因其故，不少群众产生顾虑，怕戴资产阶级帽子，怕被别人说成是食利者，于是，不少储户改名换姓，把存款化整为零，或提前支款，争购物品，或者干脆把钱放在家里。有的储户在一个时期里不敢领取银行付给的储蓄利息，如市区大宝山矿工会的一位干部，他支取一笔定期存款，沙溪银行营业所付给他应得利息，他不敢收领，后经银行同志再三解释，那位储户才勉强收领了。诸如此种情况，花坪煤矿的储户亦有类似现象出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储蓄机构减少，干部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群众积极性受到打击，因此，城镇储蓄余额增长缓慢，个别县支行还出现存款余额下降现象。1966年至1975年，全市城镇储蓄存款才增加2526万元，其平均递增速度比“一五”时期下降15.5%；比“调整时期”下降12.6%。

六、“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后，城镇储蓄进入再发展和飞跃阶段

1976年10月6日，横行十年的“四人帮”集团终于被人民彻底粉碎，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党中央关怀下和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下，韶关市城镇储蓄事业又走向再发展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各专业银行共同努力、各单位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下，城镇储蓄事业，得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加强宣传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储蓄战线迅速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储蓄事业方面所散布的流毒，打破他们所制造的精神枷锁，从而使广大储蓄工作者提高认识，划清路线是非，进一步认识储蓄的性质、意义和作用，恢复和发扬参加爱国储蓄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宣传储蓄四原则；宣传国家保护和鼓励人民参加储蓄的政策；宣传储蓄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和对个人计划开支的好处；宣传储蓄利息是体现国家对存款人给予的物质鼓励；宣传储蓄对支持生产、引导消费、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的意义；宣传储蓄对移风易俗，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在开展宣传政策的同时，迅速清理和解冻被红卫兵查抄和冻结的储蓄存款，因此，群众对党落实各项政策精神有了新的体会，调动了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广大群众参加爱国储蓄的热情。

（二）银行体制改革，网点人员增加，储蓄种类增加。

中国工商银行韶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分行、中国银行韶关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韶关分行，先后设立了储蓄科、部机构，人民银行于1986年开展邮政代办储蓄业务。随着银行体制改革，实行业务交叉，全市五家银行不断充实储蓄专业人员和增设储蓄服务网点。

据全市1987年底统计，各专业银行有储蓄专业干部、职工1309人，其中储蓄所占735人，另有单一代办点1757人，协储员2143人，共有储蓄工作人员5209人。各专业银行设立的储蓄所有130个，其中：中国工商银行70个，中国农业银行56个，中国银行3个、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个；专、兼办柜组215个，其中：工商银行33个，农业银行147个，中国银行4个，建设银行16个，邮电局代理人民银行储蓄专柜15个；代办和联办所44个；单一代办点1755个。全市共有储蓄网点2144个，比1978年增加网点1883个。

韶关市区内储蓄网点设置情况：1987年末共有储蓄网点60个，其中工商银行储蓄所24个，农业银行储蓄所5个，中国银行储蓄所3个，建设银行储蓄网点5个，邮政代办专柜3个，北江区、武江区城市信用社和郊区信用社经营城市储蓄业务网点共20个。年末储蓄余额为37068.5万元。1982年6月，韶关环市信用社是第一个进入市区设立储蓄所机构的（即西河储蓄所）。1985年农业银行也在市区开办储蓄业务。尔后，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1981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支行，举办第一期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吸储金额380万元。1985年5月，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分行首次举办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吸储金额847.9万元。1986年4月21日，农业银行韶关分行又举办定期

定额有奖有息储蓄。1986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韶关分行又举办第二期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吸储金额1691.5万元。定活两便储蓄，自1985年开办至1986年底，其存款余额达1257.4万元。中国银行韶关分行，于1980年开办人民币储蓄业务，同时开办外币储蓄业务。

在开展储蓄业务工作中，韶关工商银行和韶关农业银行重视发展居民、团体储金会组织，1987年底，全市有储金会5234个，储蓄余额487.4万元。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韶关市城镇储蓄事业出现了崭新局面，其特点有如下6个方面：

1. “快”，指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快。1987年底，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89170.3万元，比“五五”时期末（1980年）增加79829.4万元，平均递增速度37.4%，而“五五”时期平均递增速度18.76%。“四五”、“三五”、“二五”、“一五”时期的平均速度分别为11.95%，9.5%，8.1%，26.2%。

2. “广”，指城镇居民、职工参加储蓄的面扩大了。据统计，1987年底，全市城镇储蓄存款户数1448662户（定额有奖余额1368.3万元的户数不在内），相当于全市非农业总户数的5.58倍，比1980年增长1.56倍（1980年的非农业总户数149005户，储蓄存款的户数是599415户）。

3. “稳定”，指定期储蓄存款余额比重高，而且逐年上升。1987年底，全市定期储蓄存款余额62465.4万元，占储蓄总余额的70.05%，比1980年增长44.02%（1980年的定期储蓄存款余额2431.8万元）。

4. “额大”，指存款户人平存款金额大。据调查统计：1986年韶关工商银行新华储蓄所，其定期储蓄存款余

额为1113.7万元，其中一千元以上的储户占39.26%。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以非农业人口人均计算：1987年人均额为854.61元；1980年人均额为119.29元（1987年、1980年全市非农业人口分别为783036人，1043397人）。

5. “吸储率高”，指城镇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城镇职工工资及对个人其他现金支出总额比例不断提高。1980年的吸储率为6.52%。1984至1987年的吸储率分别为12.36，14.14，19.04，20.64。

6. “服务点增多”。1978年，全市仅设有17个储蓄所，兼专办柜组201个，服务所5个，共有储蓄网点261个。当时的城镇储蓄只限于人民银行独家经营。1980年中国银行开始在城市设储蓄所，随后农业银行也在市区设立储蓄所。1985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原人民银行储蓄业务划归工商银行经营。1987年建设银行也开办城镇储蓄业务。5家银行为扩充信贷资金来源，城镇储蓄竞争阵势初具规模，至1987年底，全市5家银行设有储蓄所130个，其他网点2019个。

注：作者工作单位：韶关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作者本人曾参加撰写《韶关金融志》稿。

我市人民购买公债和国库券概况

(1950年至1987年)

徐伟坚

我国公债和国库券，都是人民政府举借债务时出具的凭证。它是政府以信用方式筹集资金的一种手段。解放以来，我市推销国家发行的债券有三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国库券”。

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情况

1950年1月30日，北江区（即原韶关地区）成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会主任何俊才，副主任莫雄和戴作民。委员：袁鉴文、饶纪锦、吕琳、叶克、李学琳、金阳、苏秉鉴、周凯。委员会下设秘书、宣传、劝销三个部。同年2月初，北江区所辖16个县、市都成立了公债推销委员会。

公债的主要推销对象是工商业者，因为农民正在纳粮支援前线。其认购者，任由自愿。广东省人民政府分配北江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是40万分，而北江区公债委员会分配各县、市的任务为43.5万分。具体任务如下：

韶关市105,000分，仁化县4,000分，乐昌县45,000分，阳山县6,000分，从化县10,000分，新丰县5,000分，曲江县

11,000分，南雄县65,000分，连县45,000分，英德县25,000分，清远县85,000分，乳源县2,000分，始兴县10,000分，连山县2,000分，翁源县10,000分，佛岗县5,000分。

任务分配原则：要求公平合理，一般以工轻于商，分别大小，根据营业情况的好坏，资金多寡为标准，采取自报公议，反对平均主义和强迫推销现象。

随着市和各县公债推销机构的成立以及任务确定之后，各地基层工会、妇联、工商业联合会，分别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伍，与学校师生互相配合对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形成有声有势的宣传运动。我市4所中学和各小学师生，于1950年3月27日至31日的5天中，在市政府一部分工作同志的带领下，分成8个小组在市区开展宣传活动。宣传方式有大会动员，小会讨论，大字报、黑板报、小演唱和标语等。

宣传发动的效果是良好的，我市经宣传发动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105,000分公债任务。3月31日那天，群众在银行门口排队购买公债，下午下班后银行还继续办理发行公债业务。曲江市政府的全体同志，于1950年3月14日就完成了11,000分公债任务。全地区均按省的要求超额完成任务。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实物标准为：大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公债面额分为壹分、拾分、壹百分、伍百分4种。期限为5年偿还本息。年息为伍分。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牌价（以每分为单位），按《北江日报》公布分值额计算。1950年3月至5月公布每分金额（解放初发行的人民币）如下：

1950年3月中旬，每分31,310元。

1950年3月下旬，每分29,682元。

1950年4月上旬 每分29,682元,另加息124元。

1950年4月28日公布,本月牌价29,682元。

1950年5月6日公布,本月牌价29,682元。

注:未列出的日期按上期牌价计算。

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54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前的1953年10月,粤北区成立了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15人。1954年3月开展宣传后认购公债。广大干部、职工、农民及各界人民均踊跃认购,群众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情绪十分高涨。粤北区党委和行署直属机关超额完成公债认购任务达204.92%。乐昌县城职工超额完成任务258%。韶关民生烟厂的工人购买公债热情很高,工人刘统福同志,将存放8年的一两黄金用于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韶关市杂货业合安号林雪英女士,将多年积存的270多个银圆用于购买公债。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在韶关能顺利发行,一是由于党政部门重视和支持,二是人民群众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因此,韶关地区年底公债入库金额达403.7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以下均折计新币),占省政府分配任务的124.98%。各阶层购买公债的比例:干部职工占35.79%;农民占32.8%;工商界占30.4%;市民占0.81%;其他占0.2%。

1954年至1958年,韶关地区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入库金额为1727.5万元,其中:韶关市267.1万元(包括乳源、仁化两县),清远县264.6万元,连县、连山、连南、阳山4县共195.5万元,英德县168.4万元,南雄、始兴两县共

162.1万元，龙川县137.4万元，河源县128.4万元，乐昌县113.9万元，连平县108.1万元，翁源县105.4万元，曲江县76.6万元（1958年数字缺）。按阶层统计购买公债金额：干部职工为846.4万元，农民509.7万元，工商界317.2万元，其他阶层54.2万元。

三、发行国库券

1981年至1987年，全市发行国库券16992.79万元。

国家发行国库券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适当集中各方面的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国库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其面额分为壹圆、贰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伍佰圆、壹仟圆、壹万圆、拾万圆、百万圆等11种。

1981年国库券，一月发行，七月起计息；年息4厘，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息；自第六年起，一次抽签，分五年五次偿还本息。此年国库券发行的主要对象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单位。

1982年至1984年的国库券，一月发行，七月份起计息；单位购买的，年息百分之四，个人购买的，年息百分之八；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息。自第六年起，个人购买的，一次抽签，分五年五次偿还本金及利息；单位购买的，不举行抽签，按单位购买总额平均分五年五次偿还。

1985年的国库券，一月发行，七月起计息；单位购买的，年息百分之五；个人购买的，年息百分之九；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息。自1990年起，开始抽签还本付

息，1994年还清。个人购买的国库券，一千元以上者（包括一千元），银行发给国库券收据，收据可以记名，可以挂失。

1986年国库券，广东省人民政府分配韶关市发行任务2217万元，完成2525.6万元。

1987年国库券，省人民政府下达发行任务2218.3万元，完成2520万元，其中单位购买821万元，个人购买1699万元。

1986年至1987年国库券，均从当年1月1日开始发行。交款期限：单位交款6月30日结束，个人交款9月30日结束。利率：单位购买的，年息百分之六；个人购买的，年息百分之十。计息：一律从七月一日算起，提前交款的不贴息，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面额分为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四种。单位和个人购买的，在一千元以上的，发给国库券收据，可以记名，可以挂失。个人购买在一千元以下的，发给国库券。本金偿还定五年，在发行的第六年，一次偿还本息。国库券条例规定，可以在银行作抵押贷款，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可以在银行贴现。

（上接第106页）

鉴于我市企业债券的发行，在时间上仅仅3年，但受益企业已有30余家，尤其是在银行贷款指标短缺的情况下，集社会资金之余，补企业资金之缺，供生产流通之需，确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途径。

1981年至1987年全市发行国库券统计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县、市全称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总 计
合 计	2759.15	2775.18	1617.61	2409.76	2385.3	2525.61	2520.18	16992.79
韶关市区	1819.97	1565.19	488.9	1256.78	821.72	872.94	878.5	7704.00
英德县	170.45	201.98	246.11	275.97	339.26	347.76	346.61	1928.14
乐昌县	109.81	243.77	203.78	217.02	234.86	257.65	270.02	1536.91
曲江县	47.4	100.81	96.98	114.85	172.08	182.17	194.23	908.52
南雄县	119.22	98.66	105.41	82.18	144.4	147.59	151.52	848.98
连 县	71.64	113.63	98.11	88.82	138.76	154.12	155.94	821.02
仁化县	155.57	119.39	37.17	109.52	125.79	138.04	72.7	758.18

翁源县	42.76	115.31	124.54	68.01	106.82	108.82	123.62	689.88
始兴县	72.85	72.99	61.36	58.25	87.46	85.06	92.73	530.7
阳山县	57.5	53.63	56.21	50.29	86.43	98.62	98.49	501.17
乳源县	24.97	26.93	41.54	32.01	50.11	54.63	53.94	284.13
连南县	35.56	33.32	33.64	34.1	44.7	45.53	47.73	274.58
连山县	31.45	29.86	23.86	21.96	32.91	32.68	34.15	206.58

我市发行企业债券情况综述

(1985年至1987年)

徐伟坚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发行债券已开始成为一些企业的一种筹资手段。企业债券，是企业向社会发行的一种债权凭证。按企业性质而论，其债券分为两种：一是专业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二是工商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韶关市发行企业债券始于1985年至1987年底，发行总额为3292.84万元。

一、金融债券

金融债券是专业银行通过银行信用向社会发行的一种债券。它是为开办特种贷款而发行的。具体而论，金融债券的发行，在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城市（镇）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急需的资金，支持一些产品为社会所急需、经济效益好的建设项目迅速竣工投产，并引导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资金。发行金融债券，是根据本地区实际的、合理的需要，按量出而入的原则编制发行额度的计划，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审核同意后，专业银行分行和人民银行分行联合上报人民银行总行和专业银行总行核批发行额度。

金融债券一般期限为一年，年息9%，到期还本付息，

逾期不另计息，不提前兑现，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不记名，不办理挂失。贷出利率最低年息为12%，最高为14%，在此幅度内，根据不同地区情况，用款期限长短，划分不同档次，实行不同利率。

金融债券印制，由各专业银行总行决定统一样版。其面额有拾圆、伍拾圆和一百圆。

中国工商银行韶关分行发行金融债券情况：1985年发行300万元；1986年发行400万元；1987年发行600万元，其中有300万元为“贴水债券”，即购买一百元债券，购券人只须交付75元，债券自购买之日起算三年又三个月到期，俟到期之日，持券人可到原发行银行领取一百元现款。

中国银行韶关分行，于1987年开始发行第一期金融债券，发行金额470万元。

上述专业银行共发行债券1770万元。

二、工商企业发行债券

1985年5月24日至1987年底，全市有31家企业（厂矿）经人民银行批准发行债券，其金额为1522.84万元，其中：1985年发行额为821.74万元；1986年发行额为423.3万元；1987年发行额为277.8万元。按企业性质划分：工业17户，金额349.3万元；商业6户，金额559.5万元；运输业4户，金额327.5万元；建筑业3户，金额266.54万元；其他1户，金额20万元。债券利率：最低年利率为4.8%，最高年利率为23.76%。企业对内部职工发行债券的金额为722.84万元，占总额的47.46%，向外部发行的金额为800万元，占总额的52.54%。（下转第102页）

简述粤北棉纺工业的发展情况

冯东廷

我先后参与了乐昌棉纺厂、韶关一、二棉厂的组建和厂志编写工作，并先后参加了韶关一、二棉纺厂的党、政领导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我认为，粤北地区棉纺工业的发展是多快好省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几个阶段。1968年前，粤北的棉纺工业还是一项空白。在国家纺织工业部和省、地、市的关怀下，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二十来年的积极努力，从1967年7月开始先后新建了韶关棉纺厂、乐昌棉纺厂，扩建了韶关第二棉纺厂。它们开始的设计规模都是三万锭单纺小厂，投产后，在生产、生活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都先后扩建成能生产五万锭以上的中型棉纺厂，还建成了帘子布、捻线、织布、成衣、针织、毛纺等车间，这不仅提高了产品应变能力和综合利用的能力，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完成了专业人员、生产设备、生活福利、文体设施、绿化环境五配套的计划。现有生产规模棉纺环锭18.6784万锭（包括印染厂1.5万锭在内），气流纺4台800头，捻线机98台，织布机388台，缝纫机268台，针织机20台，毛纺4800锭（现正在准备安装）。现有职工9265人，可年产棉纱3,389万吨，股线7205吨，棉布513.59万米，针织坯布395万米，服装12万件，产值17566.69万元，实现税利2066.84万元，直接创汇1858万美元，同时还带动了织布、针织、毛巾、制线、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发展，成

为韶关市轻工业系统中有较大影响的行业。

韶关第一棉纺厂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防空备战，节省土建投资，由中纺部设计院设计的轻钢密闭结构无窗厂房，规模为3.0192万吨，总投资700万元。经省联系，于1968年，先后从郑州纺织系统商调来各工种技术人员二百多人，1967年7月动工，1969年10月1日一次性试机生产成功，1970年7月1日正式投产。在基建和生产过程中，全厂上下顶着“文革”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克服了设备、配件、材料短缺和运输紧张等重重困难，如：职工宿舍不足，便发动群众打泥砖盖“干打垒”；纺专配件短缺，就派人到纺机厂参加他们的车间劳动，由于感动了他们的干部职工，他们就主动给予无偿或廉价提供；没有槽筒座车、滚齿机、龙门刨等设备、组织力量自行制造，车床床身不够长，工人技术员将其改装加长；锅炉小了、空调不符合要求，自行改造……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使生产逐步走向正常。后来，据了解，发现广州各橡胶厂缺乏造轮胎的材料“帘子布”，后经中央轻化工业部批准，决定在韶关棉纺厂建一个年产1000吨帘子布车间。为了节省国家投资，我们采取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安装的做法。在组建过程中，劳动力不足，就发动全厂职工，三班合并“两班倒”工作，从而抽出一个轮班三百多人，进行详细分工，各负其责。其中一部分进行“三通一平”挖车间的基础，一部分装运河沙，一部分搬运石、砖、瓦，如此日夜苦战了四个月，终于建成了有一千多平方米带高低两跨的厂房。与此同时先后派出保全、挡车工前往

泌罗、青岛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用60多天时间把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全过程是从1971年4月20日动工开始，至同年11月28日建成投产，历时五个月就拿出了符合质量标准的帘子布，这不仅填补了全省的空白，而且为国家节省投资一百多万元。投产后一年获利90万元。由于贯彻了“时间短、投资少、见效快”的建设方针，因而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称赞。

为了提高纺专设备管理水平，中纺部1975年5月在安陆五七厂举办第二期学习班，按照有关通知精神，厂部抽组保全维修工31人，由我和省轻工厅纺织局谢城菘同志领队前往参加学习。为了与在学的全国各厂竞赛，以优异成绩，争夺“38”（千锭时产量38公斤）、“50”（千锭时细纱断头50根以下），在学习前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奋战了两个多月，在生产质量上终于超过了部颁标准一挡水平。在学习将要结束时，同志们通宵达旦写汇报材料，下定决心，表示态度。提出有力措施，受到在学的全国各厂的好评。回来后召开职工动员大会，贯彻“高（高标准）、严（严要求）、精（精益求精）、细（细致工作）、好（好质量）”五字要求，提出“学大庆”、“赶五七”、誓夺“38”、“50”高地，为革命多作贡献”的战斗口号，还组织样板，观摩机台，照样板逐台整机。仅半年功夫，全厂平均攻下“38”、“50”，其中某些指标还超过一挡水平。1976年5月28日中纺部在我厂召开了有全国一百多个棉纺厂领导参加的现场会，我厂在会上介绍了经验，还让他们到车间进行了参观，受到了与会同志一致的赞扬。会后我厂又研制了巩固提高的措施；由于当时实行“优质、高产、低消耗”，我厂当年获得经济效益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四；锻炼和培养了技术力

量，提高了领导的业务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为韶关棉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76年，经市经委批准一边生产一边挖潜，扩建1.5万锭，将筒摇车间调整为细纱车间，将仓库与马路连接起来改造为筒摇车间，经市建委批准，另行征用西侧宝盖山边5.17万平方米山地建原料仓库。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搬迁、安装，于1987年1月全部交付生产。又于1982年10月扩建织布车间，1984年7月投产；1985年2月引进年产10万套西装时装生产线，同年10月进行小批量生产；1986年6月扩建气流纺，当年年底投入生产；1989年1月又引进棉纺一万锭，1990年12月投入生产。现在该厂总规模为棉纺环锭5.5万锭，气流纺4台800头，捻线机27台，布机184台，缝纫机268台，现有职工3025人，可年产棉纱9979吨、股线1513吨，棉布413.59万米，服装12万件（套），产值6025.49万元，实现税利596万元。

乐昌棉纺厂

为了备战需要和加强三线建设，1968年3月根据中纺部和省革委会决定，将广州三棉迁至乐昌兴建；而实际只把投资750万元资金转移过来，至于设计资料、设备、材料、技术人员等都未移交。同年5月，我到开封、南昌、韶关棉纺厂筹建处等地商调专业技术人员11名，组成了设计组，采取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安装的做法建厂。当扩初设计经省会批准后，由筹建单位和施工部门联合组成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在施工和安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及时修改和处理，因此实现了“三个当年”，即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计划。于1969年

1月22日动工，同年10月安装，12月22日一条龙试机生产，当时，似这样的高速度在国内都是罕见的。1970年3月14日中纺部在“乐棉”召开了棉纺基建现场会议，总结了经验，并登上了《人民日报》，肯定了成绩。后来在1977年8月扩建2万锭工程，1979年5月投产。1979年3月扩建的3万锭工程，1982年5月投产。1983年因改变了棉纱统购统销政策，“乐棉”由生产型改变为生产经营型，棉纱积压严重。为了使纺织配套，厂里合理调整了生产布局，经省、市、县研究，同意调迁3万锭给三水，以及设备资金和空出的配套布机500台。后于1986年8月26日全面完成调迁工作。1981年11月扩建制线车间，1983年3月正式投产。1985年1月筹建织布车间，同年12月底试机生产。经调整后的规模为棉纺6.2万锭，捻线机51台，织布机164台，有职工3886人，可年产棉纱1,124.9万吨，股线4314吨，棉布100万米，产值6000万元，实现税利1000万元。

韶关第二棉纺厂

经省计委1979年10月24日批准，在韶关棉纺厂4.5万锭工程的基础上扩建3万锭。由于受地形限制和将来的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到少占农田、征地便宜、水电交通协作条件等因素而另行多处选址进行比较，最后才确定在距韶关棉纺厂两公里多的西河上窑处新建厂房，后经省人民政府1980年9月1日批准，于同年10月15日动工，1982年5月1日第一期1.5万锭工程竣工并投入生产，同年7月5日，边生产边安装第二期1.5万锭工程，同年12月全部具备生产能力。因距离原棉纺厂较远，管理不便，经韶关市编制委员会批准，于1981年

11月1日与韶关棉纺厂分开，单独成立韶关第二棉纺厂。后接省计委通知，于1983年6月1日交付国家正式投入生产。该厂在基建过程中，干部职工艰苦奋斗，日以继夜地工作，和精打细算节约办事，从而克服了四大材料（钢材、木材、水泥、玻璃）短缺，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为了节省投资，厂领导发动全厂职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组织科室干部和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工作，如开箱擦锈等，包括主机、附件、电器、锅炉、冷冻空调，以及机车间的通用设备全部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连厂外两公里的路灯也是动员电工自己竖杆架设的。按当时价格计算节约设计和安装费共达35万元；还利用开箱板制作更衣柜、工具箱、门窗等，节约木材200多立方米，价值20多万元。由于设备、材料不断提价，经多次审核追加预算，最后在市领导召开现场联合办公会议上确定总投资为1830万元。利用在试产期间的税利120万元才结束了9栋职工宿舍以及仓库、机车间、幼儿园、医务所、冲凉房等收尾工程。投产后4年多还清了贷款和利息。在生产、生活基本配套的基础上，1988年又按发展规划先后引进西德的生产2.4万锭设备，扩建了三联大厦、针织、毛纺车间，现有生产规模为棉纺5.4784万锭，捻线机20台，针织机20台，毛纺4.8万锭；有职工2354人（配齐定员则有3980人）；可年产棉纱9940吨，股线1378吨，针织坯布395万米。后因原料紧张，生产不饱满，产值只有4735万元，实现税利470.53万元（由于市场疲软），毛纺投产后产值可增加3600万元，税利可增加1338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韶关市的棉纺工业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中把经济搞

活的方针，在企业新建、扩建、改建过程中，重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在管理生产过程中，建立以经济责任制为主的各项规章制度，在用人方面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把德才兼备的同志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发挥各自所能和特长；在干部方面发扬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以产生有令则行、有禁必止的效果；对职工则采取“思想教育、民主管理和物质鼓励”三结合的方法，使广大职工奋发图强，增强主人翁责任感；这样一来，我们的企业不仅生产出优质、高产、低消耗的产品，还逐步扩大了再生产，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了两百多名活跃在各个领导岗位上的人才。韶关市这三家棉纺企业经企业整顿后都合格，并分别被评为省的一类企业，或先进企业，并在多项评比中获得了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注：棉纱产量是按生产能力计算的，其余产量、产值、利税等都是按实际计算的。

（本文作者是韶关第二棉纺厂原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韶关三个棉纺厂选址的前前后后

冯 东 廷

1965年初，我由军队转业到韶关专署工业局负责轻工业工作，当时制糖、造纸、烟酒、纺织、肥皂、火柴等日用品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对三个棉纺厂的厂址选择，有的是间接参与的（韶关第一棉纺织厂），有的是直接参加的（乐昌棉纺厂、韶关第二棉纺厂）。近来我查阅了二十多本笔记和有关资料，对这几个棉纺厂选址情况回忆如下：

韶关第一棉纺织厂（即韶关棉纺厂前身）选址概况

1966年5月16日，广东省轻工业厅粤轻计财字第194号文件上报：“在韶关兴建五万锭棉纺厂设计任务书”，经中央纺织工业部同意暂建三万锭，以后再酌情扩大；国家计委（66）经计字第607号文件批准其生产规模为三万锭，投资700万元。据此精神，厂址面积按五万锭选择，厂房按三万锭建设，留二万锭空地待后扩建。

接此通知后，韶关市委工交政治部便委托市轻纺工业公司组织韶关棉纺厂筹建机构。该公司抽调副经理刘丕成负责组织筹建机构和办理一些具体事宜，同年8月市委组织部先后抽调曾权、信安民、黄佑庆、陈洪文、黄美月、黄秉

文、刘庆、陈锦波、陈有、何远电、钟兴元等同志参加棉纺厂筹建工作，任命信安民同志为筹建处办公室主任（负责设备订货），刘庆同志代理支部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黄秉文（抓基建施工）、陈锦波（管职工培训）二同志代理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8月15日韶关棉纺厂筹建处正式挂牌成立。

筹建处成立后，便会同省轻工业厅、韶关专署工业局、市计委等有关同志一起选择厂址，按照省建委指示：为了贯彻“分散、隐蔽、靠山”的六字方针，以适应备战要求，建议在翁源、乳源、龙归等地考虑。参加选址的同志本着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又要考虑到水、电、交通、协作条件等，决定在韶关市郊选择。经过实地调查，一共选了五个点进行比较，其中比较好的两个点，是在龙归和西郊二公里（原华南电缆厂址）。在进行讨论对比时，大家一致认为西郊二公里处更适宜建厂，因为此地北靠宝盖山，适应备战需要，南有韶乳公路，距火车站只有四公里，交通方便，东有西河变电站及武江，供电较近，水源充足，不占用农田，节省征地费用，也容易安排职工生活。1966年10月4日由韶关市计委和轻纺工业公司把选址情况联合上报省计委、省轻工业厅，以及韶关专署计委和工业局。省轻工业厅于11月10日以（66）粤轻基字第200号文件转报省建委，省建委当时对此有些异议，经省轻工厅纺织局多次派人上门与之商谈，于11月16日省建委才印发（66）粤基周字267号文件，批准了选址报告。

1967年初，省某些有关部门从备战形势紧张情况出发，责令筹建处放弃原址，重新选择一个不近市区的地点作为厂址，尽管某些人认识不一致，筹建处还是邀请了省轻工厅、

韶关专署工业局、韶关市计委、建委、轻纺工业公司负责同志联合进行重选工作，于是又选了一个牛坪塘（现沙湖公园处）。当时该处水、电、交通、协作条件等都很差，土方量大、投资要多，不宜建棉纺厂，筹建处只好又派人向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征求意见。在省轻工厅纺织局副局长周敏玲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使省建委再次同意该厂在原址兴建。现在市第一棉纺织厂的占地面积共达148668平方米（包括逐年扩建）。

我是1970年2月从乐昌棉纺厂调到韶关棉纺厂的。韶关棉纺厂的筹建工作正好是在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展时逐步铺开的，当时厂部负责人是支左解放军秦天胜同志。在该厂筹建期间社会形势动荡，不论是选址、设计、施工、运输设备材料、培训职工、安装设备等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工作队曾八进八出，领导班子调换了13人之多。结果，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多时间才于1970年7月1日正式投产。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厂的各项工工作才逐步走向正规。

乐昌棉纺厂选址前后

1968年5月21日，接广东省轻工厅转中央纺织工业部（68）纺计字第3232号文件的批复：同意广东省“关于变更广州第三棉纺厂厂址”的报告，同时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广州三棉迁至乐昌兴建”。据此精神，韶关专署副专员郑长勤和工业工作站革委会主任李子先指派我和技术员林德宏去乐昌搞筹建，从此，我也就在棉纺专业系统里工作了。到了乐昌后，在县革委会的重视下，在马戴副主任的支

持下，先后调来张福嘉、胡立肖、梁荣滔等同志，经省轻工厅纺织局同意，由韶关棉纺厂筹建处从郑州调来的专业人员中分给5人，其中清花技术员杨荣新、并粗技术员王玄华、细纱技术员黄海鹏、电器技术员谢国芬、供销员傅北海；接着，省又分配来3人，其中有工艺员郑忠胜、机要员2人。由我和张福嘉具体负责，经与当地联系，同意在文化街34号租了一间约70平方米的破庙、加以维修、用木板隔起来，两边住人、前面办公，后边作厨房，聘请了一个炊事员煮饭，于1968年8月1日在门口挂牌，正式成立了“广东省乐昌棉纺厂筹建处”。

筹建处成立后，立即到原推荐的晒岭头厂址进行勘测，经核对各有关数据，存在不少问题，厂房布局受限，占用农田过多，工程投资较大，因此只好另行选址；在乐昌县革委会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先后到乐昌县城附近的出水岩、老虎头、枇杷岭、一八九医院、榴村、牛岗坪、乐昌中学等七个点，大部分因水源较远，占用农田多，土方量较大等原因而被淘汰，筛出榴村和乐昌中学两地作为候选，虽然榴村的地形、水源、交通、厂房布局等条件均为适宜，但占用菜地、鱼塘过多而相持不下，选址人员经过调查和反复讨论、比较，认为乐昌中学可作厂址，这是由于该校当时受“文革”的影响，教学不正常，校方正为师生缺乏学工学农基地而苦恼，有迁移校址的愿望，并且该校有一个足球场，面积78000平方米，地形平整，可建主厂房；全校范围120000平方米，南面靠山，北临武江，水、陆（铁路）运输方便，靠近县城，协作条件较好，标高96.4米，不致水淹，另有教室宿舍等7000平方米，可作为干部职工办公设计和生活福利设施之用，建棉纺厂最为适宜，加速工程进度，节省投资，为今

后发展等都提供了有利条件。（1968年10月20日上报韶关专署和省有关部门，经省轻工厅、设计院派员实地勘察，便同意乐昌棉纺厂筹建处的选址报告。同年11月广东省革委会（68）粤基字第47号文件批准，正式确定乐昌棉纺厂厂址设在乐昌中学校址。

经与乐昌中学、乐昌县教育局协商达成协议，由乐昌棉纺厂筹建处以27万元买下乐昌中学包括校舍课堂足球场生活设施以及树木果园在内的全部所属范围，共12万平方米，经乐昌县革委会批准，于1968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从此乐昌中学便迁至城南四公里的梅花头进行重建；1969年1月1日乐昌棉纺厂筹建处也就由文化街的破庙搬到乐昌中学校址办公。后来，包括逐年扩建，占地面积共达39万平方米。

当时由于广州市纺织工业局除将三棉的投资750万元拨转至乐昌外，其余技术、专业干部、设计资料，设备、材料计划等均未移交，因此在厂址确定之后，经省委组织部同意，立即到开封、南昌纺织工业局求援。开封调来工艺技术员翁锡尧，空调技术员黄观钦，电器工程师李锡宝；南昌调来梳棉技术员叶开琛，同韶关棉纺厂筹建处调来的技术骨干组成一个设计组，于1968年10月到中纺部设计院索取资料，编写《扩初设计任务书》。同年11月，经省轻工厅纺织局召集广州一、二棉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部门进行会审会议，到会同志大部分从实际出发同意并支持了筹建处的扩初方案，还争取到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安装；在会审的同时开始了“三通”（通水、通电、通道路）、一平（平整施工场地）工作，创造了边设计、边施工的条件，从而加快了工程进度。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克服了吊装、运输等重重困难，完成了13000平方米的主厂房建筑工程。接着，

通过日以继夜的设备安装，于1969年12月23日20时进行一条龙试产，结果一次成功，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试机投产的计划，这在全国棉纺行业中是非常少见的。

韶关第二棉纺厂选址经过

根据1979年10月24日广东省计划委员会批准韶关棉纺厂扩建三万锭设计任务书，从科室和车间内抽出徐振雄、陈雄标、张善夫、吕义群、李为德、严华明、沈辉平、陈志德、黄光友、黄亚文、袁晓明等同志，组成扩建班子，由我兼管领导工作。同年11月初，开始选址工作。当时，由于市的个别领导和筹建处的一些同志意见不一致，拖长了选址时间。有的认为：“扩建厂房嘛！就要靠近老厂、不另设机构，便于管理”，有的认为：“老厂地形受限，没有发展前途”，也有的认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可”？还有的说：“另起炉灶与扩建精神不符”等等，争论不休。后来采取了多选几个点，绘成图纸，注明各种数据，上报审批，上级批准在那里、就在那里扩建的做法。曾先后选择了位于韶关棉纺厂东北面的宝盖山，西侧空地（包括未征鱼塘）、市二建办公楼南侧、机床厂周围、南郊四公里、西河上窑、黄田坝等七个点，分别绘制7个方案。上报后，经现场勘测，反复比较，认为，有的地方土方工程太大，搬迁农户较多；有的地方高压线不易迁移，有的地方占用农田菜地过多，投资太大，没有发展前景等等，而被上级有关领导逐一淘汰。最后，认为西河上窑比较好，一、靠近武江河边，建水泵房方便而费用便宜；二、大部分都是山坡地、占用农田菜地很少，节省征地费用；三、地形广阔，便于扩大再生产；四、距火车站仅三公里

多、另有山樵公路，设备、原材料、燃料、成品运输方便，五、架设高压线较近电源，可减少供电设施投资。1980年6月13日经韶关市政府审定同意扩建厂址设在西河上窑。同年9月1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征用韶关市环市公社朝阳大队土地153亩1分2厘，作为韶关棉纺厂扩建三万锭厂址之用。接着，韶关市果菜食品公司将他们在此地所建的12000M²鸡场亦作价转让出来作为扩建之用。

在1980年6月厂址确定之后，租用附近市福利院十间平房作为现场办公设计之用；从老厂调拨一台2.5吨的汽车接送人员上下班、买菜和运输物资。1981年10月初，主厂房和办公室竣工，筹建处由福利院迁至新办公室办公。在主厂房完工前，先后开始了机动车间、冷冻站、锅炉房、饭堂、水泵房、冲凉房、车库以及仓库（3栋）、家属宿舍（9栋5层楼）等30多个项目的基建工程。至1982年1月5日，安装工程陆续完工，并把无线电三厂和五厂的1千平方米旧房按面积建回到无线电三厂院内，从而换回五栋平房（占地范围10845M²），作为新工集体宿舍和开办职工子弟小学之用。在新厂投产前后从老厂调到新厂的干部职工500多人（包括培训的新工400人在内）陆续搬进了新居。1981年10月7日，韶关市编制委员会（81）第4号文件通知，为了便于管理，韶关棉纺厂扩建三万锭厂房单独成立韶关第二棉纺厂，同时市委组织部发出韶市组干（1981）第179号文件，把我调到二棉工作，从此，二棉和韶关棉纺厂脱钩了。紧接着，厂部成立厂办、生产计划、设备、技术、供销、财务、劳资、基建、行政等9个科室，以及前纺、细纱、筒摇、机动等4个车间。1981年11月16日经韶关市委组织部批复设立厂党委，由我兼任领导，下设党委办、组织、宣教、武保、团委、工会等6

个科室，7个党支部，15个团支部。开始了安装、原材料供应、生产组织等各项准备工作。1982年5月1日，终于一条龙试产成功。同年10月13日，主机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后接广东省一轻厅通知，于1983年6月1日正式交付国家投入生产。现在该厂占地面积包括逐年扩建共达165420 M²。

由于二棉是扩建的，它的领导班子和技术业务管理干部以及各工种骨干全套都是棉纺厂分来的。因此，在企业管理，专业技术方面都有基础，对于工艺、冷冻、空调、锅炉、电器、供排水等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安装的。当时除因设备、材料、运输等费用涨价、三次追加计划610万元外，资金特别困难，1982年8月11日，市委书记李海涛、市长袁炳焕等市领导人到厂召开现场联合办公会议，市委副书记孟庆云、副市长林松、以及市计委、经委、财局、财办、人民银行、建行等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经我分门别类汇报后，追加到总投资1830万元，才基本解决困难，后又用试产期间的盈余，填补了收尾工程的不足部分。厂部不论在设计、施工、安装、生产组织、生活设施以及制订工作标准、管理标准和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少走了很多弯路，因此在投产后，经济效益逐步上升，仅4年多的时间，便还清了贷款本息2430多万元。

上述三个棉纺厂的厂址选择，是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下，筹建人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任务的。同志们不怕苦不怕累，克服了重重困难，反复地进行勘测比较，日以继夜地计算面积、方位、标高、地形、征地费用等各项数据，同时还考虑到水源、电力、交通、发展前景和协作条件等。通过十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三个厂址的（下转第127页）

粤北区直属机关肃反运动概述

田和平

从1955年7月至次年7月，粤北区党委、行署直属机关进行长达一年的内部肃反运动。这是粤北区四期肃反运动中的第一期，是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下而展开的。肃反的对象是混入党政机关内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

7月24日，区党委在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后，制定了全区第一批肃反的计划，确定区党委及行署直属机关、驻韶铁路党委及韶关市党政机关为第一批肃反单位，包括党群战线、政法战线、工业战线、宣教战线、农村战线、财经战线、党校系统、铁路系统及韶关市。第一批肃反运动计划分三个阶段完成，即学习和准备阶段、坦白和检举阶段、处理复查和建设阶段。第一批机关肃反的计划象一部宣言书，敲响了粤北区肃反运动的开场锣。

为了加强对肃反运动的领导，区党委成立了5人肃反领导小组，由张根生任组长，汤光礼、李海涛，李余善、李祥麟任领导小组成员。同时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秘书科、专案科，审干科。在各战线也设置领导肃反的核心小组，在各部、局、处单位设立战斗小组。后由于运动的实际需要，将各战线核心小组改为领导分组，部、局、处单位设核心小组，再下设战斗小组共四级组织，韶关市则仍旧保留

领导小组、核心小组、战斗小组三级。

8月5日，区党委开始进行有关肃反的部署动员工作。9日，区党委书记张根生同志在机关全体干部会上作了《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从此，粤北区内机关肃反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进入肃反第一阶段，一开始就学习有关文件和准备有关材料。

在第一阶段，区直属机关及韶关市共153个单位的全部干部参加了学习，人数达6881人。在学习过程中，区党委委员分头负责，依照省委的报告提纲作了多次报告，并组织学习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人民日报》社论《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肃反的展开作好思想准备。通过学习，使干部提高了认识和警惕性，并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在学习过程中，暴露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重大嫌疑分子有24名和集团性质的事件4起。组织上还对350名骨干分子进行了培训，为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打下了基础。

9月2日，由学习文件转向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揭露。联系实际检查揭露就是使所有参加学习的人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已发生的反革命破坏实例，充分揭发一切散布反动的谣言，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盗窃机密、小集团活动等行为，以暴露和发现敌人，以及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参加检查揭发的单位有147个，共5889人。在此期间，发现重点对象111人，小集团3个，原有的重点分子也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

在第一阶段，部分单位展开了斗争。通过搜集材料进行分析，根据主次轻重对有关人员进行排队，有计划地、分批地交给战斗小组。各领导分组根据划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和

界限，审查确定了第一批斗争对象99人。同时，进行了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清查出叛徒自首分子名单1482名、谍报员354名、情报员341名。在斗争中查出现行特务间谍案1件。此外，为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各单位对重点对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行动）并加岗放哨的制度。

区党委肃反领导小组原计划第一阶段于8月底结束，后因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发出“把运动搞深搞透，把反革命搞光”、“在此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内部完全肃清所有的一切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完成任务不收兵”的指示，区党委在8月31日根据指示精神重新调整计划，直到9月18日才正式结束第一阶段的工作。

第二阶段为坦白检举阶段，主要是对斗争对象进行小组斗争和专案调查。小组斗争是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对肃反对象进行检举揭发，而斗争对象在经历小组斗争后还不能将问题弄清，就由战斗小组转交专案小组继续追查。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了小组斗争和专案斗争外，还对证据确凿仍拒不交代者和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召开斗争大会，予以镇压，打击、分化敌人。

进入坦白检举阶段以后，新交代问题的有300人，其中叛徒3人、特务6人，伪军政官吏33人，阶级异己分子3人、反动会道门17人、反动党团分子30人及隐瞒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等共29人。至9月28日，有63个单位展开了斗争，基本斗垮的（斗争对象全部承认别人检举揭发的材料）20名，其中有派进我内部进行情报活动的特务、有受过专门训练，曾逮捕我8个同志的原国民党军统行动组长；有曾捕杀我几十名革命者的国民党中校军官；在斗争中承认了部分问题的人有27名。最后，经研究并批准所报来的67个作为第二批重点

斗争的对象。

自运动开展以来，全区共发现重点对象539名，为了及时审批斗争对象和准确地打击敌人，区党委肃反领导小组将斗争对象的审批权下放到各战线领导分组。

根据原订计划，坦白检举阶段的斗争在11月15日左右结束。但由于第一阶段延迟及在斗争中出现“顶牛”现象，使得第二阶段的斗争延迟到次年1月下旬才告结束。

“顶牛”是指斗争对象在斗争过程中采用不说话、装病等方式来拒绝回答提问，或用“记不清”等来搪塞，避免回答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在第二阶段初期，由于战斗小组成员政策水平不高，缺乏经验，方法不当，又急于求成，因而，击不中对象的要害。如大部分单位采用大会小会“轰”、“压”、“诉”的办法将掌握的材料全部摆出来问“是不是”，使对象探清了虚实，从而想出对策企图蒙混过关。另外有的单位在斗争中出现“左”倾行为，如罚站、推拉等，使对象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出现“顶牛”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肃反领导小组组织战斗小组成员学习了石家庄地区关于克服“顶牛”现象的经验。分析造成“顶牛”的原因，制定出“大胆发动群众，灵活运用斗争方式，研究对象特点寻找突破点”等克服办法，使运动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到10月17日，开展斗争的单位有125个，上报后批准斗争的对象达224名，已展开斗争的有197名，到22日共斗垮对象94名。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中“左”的倾向也更明显起来，计有58个战斗小组进行了刑讯，逼供、诱供、指名问讯和车轮战等非法斗争，斗争对象中被打的30人，罚跪的29人，挨车轮战批斗的22人，共计81人。为了制止运动中采取非法

斗争方式，区党委肃反领导小组于10月30日召开了战斗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的指示，要求保证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和不冤枉一个好人，并用三天时间批评检查了前段运动中“左”的思想和行为。通过传达学习中央的指示，纠正了斗争的“左”的错误做法，使后来的斗争按正常的方式进行着。

自10月25日起，部分对象进入“专案斗争”阶段。“专案斗争”主要是对全部材料进行审阅，系统整理及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外调，函调与审讯。到12月1日，按当时的正式手续先后转为专案斗争的对象有228人，组织专案小组134个，专案干部433人。

12月13日，区党委领导小组向各领导分组正、副组长以上干部传达了省委有关“专案排队工作”的指示，布置了具体的排队工作。到27日，原有的539名斗争对象，经过排队，实有对象389人，结束小组斗争者376名，正式转入专案斗争的335名。到1956年1月8日，小组斗争正式结束，领导与群众的精力完全转入斗争方面来。到同年1月26日，专案斗争也正式结束。至此，共有349名对象经过了专案斗争阶段。

从1956年2月份至7月份是运动的第三阶段，即甄别、定案、复查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阶段。经过细致的甄别定案工作及反复的核查，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有120名，其中反革命分子102名，其它坏分子18名。具体有特务22名，反动党团骨干22名，恶霸7名、土匪4名，汉奸3名，蒋匪军政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22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9名，现行反革命分子12名，叛变分子7名，

流氓、坏分子12名。在2月至3月期间，在做好甄别定案和复查工作的同时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建设，提拔了297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到各级机关中去，其中提为副科长以上的就有79名，从而大大充实了骨干队伍，加强了领导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一期机关肃反运动历时近一年，肃清了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但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使一些同志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或牵连，给机关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在1956年7月，第一期肃反运动在直属机关内正式结束。

（按：胡风事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宗错案，党中央在1980年已作了平反处理。但当时由此而引发的肃反运动却肃清了暗藏在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本文作者是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紧接第121页）

选择都比较合理，在当时既适应备战需要，又少占用农田菜地，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而且减少了企业的后顾之忧，体现了多快好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从现在的生产规模来看，它们都已发展成为配套比较齐全的五万锭以上的中型棉纺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作出应有的贡献。

轰动全粤的“大暴动”

——乐昌平定土匪暴动经过

高鸿丹 整理

解放初期，在广东省境内曾发生这样一宗大事，土匪在乐昌县全县范围内发动全面的反革命暴动，在短短的4天内，土匪对乐昌县城和各区、乡人民政府进行了疯狂的袭击，一时间狼烟四起，后来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和追剿下，土匪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取得了反击土匪进攻，平定土匪暴动的胜利，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①

一、乐昌土匪全面暴动的历史背景

解放前，乐昌县是国民党的模范县，是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和国民党北江专员公署专员龚楚的家乡，国民党的社会基础雄厚，军政势力强大，乐昌县伪县长薛纯武是薛岳的亲弟弟，仅他家乡九峰乡就有国民党军校毕业生60多人，其中黄埔军校毕业生就有5人^②（另一说：九峰乡有校级军官100人以上^③），因此，解放前我党在乐昌展开武装斗争上有一定的困难，那时只有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洪）。这个地下党支部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通过统战关系，了解敌情；二是建立一个交通站，负

贡联络、接待从香港、广州来的，经乐昌转送去 始兴县、南雄县帽子峰等地前去粤赣湘边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些同志。乐昌解放时，国民党匪特残余势力虽然在乐昌的马屁股岭和大肚岭等地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和扫荡，但仍未完全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乐昌县解放半个月左右，龚楚、薛纯武在陷于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到中共乐昌县委派人送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亲笔信，信内指出其弃暗投明才是正确的出路。于是，龚楚、薛纯武带领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从乐昌的瑶山下山投降，当时为有利于争取其他残匪下山投降，组织上把龚楚、薛纯武作为投诚人员对待。但是，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下山后，利用其取得的合法身份，暗中发展土匪武装，不到一、二个月，乐昌县各区、乡普遍有了秘密的反动土匪武装组织，各地隐藏的土匪纷纷出笼，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和留下来的土匪特务不断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破坏和捣乱活动。各股匪凭借乐昌县群山绵亘、沟壑纵横、洞穴繁多、迂回面广，转辗方便的地理环境，巢集乐昌。如湖南省汝城县的伪县长何康民和仁化县的伪县长林显等窜来乐昌，收买散兵游勇、恶霸地主、封建会道门人员、惯匪、流氓地痞等，趁乐昌县、区、乡人民政权刚建立还来不及肃清这些残渣余孽时，妄想复辟，疯狂叫嚣反攻倒算，进行反共宣传，企图间离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并拉拢、胁迫各区、乡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土匪组织，煽动说：“凡参加者，每月发薪水光洋20元，不参加者便会遭共产党谋杀”。由于群众受国民党统治较久，思想上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又不了解，解放初我党还来不及对人们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因此，群众受蒙骗者较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轻信谣言，参加了土匪组织，而有的人

是经不住物质的引诱而参加土匪组织。1950年3月初，何康民、林显把在乐昌成立的“粤湘边民众反共自救委员会”改为“反共救国军第四军”，林显为军长，何康民为副军长，董超云为参谋长。在乐昌成立的匪组织有：第二师，师长黎元勋；第十师，师长何康民（兼）；第十一师，师长董超云（兼，即董来宗，被捕后由朱炳寰接任）；独立团，团长康作云；独立一团，团长黎洪；二十八团，团长张文照；三十一团，团长薛秀基；三十二团，团长谭钧亮（被捕后由白铎其接任）；三十三团，团长朱炳寰；以及自卫团、西乡保卫团（团长张养）、突击暗杀营等，这些反动武装共1000多人（其中被诱参加者有半数以上，被恐吓威胁参加的有30%）。这些土匪到处骚扰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至使各区、乡连续发生了抢劫车辆、船只、商旅；暗杀各区、乡政府干部、农会骨干、工作队员，策反我方人员携抢叛变投匪等事件，土匪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局势越来越紧张。在土匪攻打乐昌之前一个月，土匪就大肆造谣说：“世界大战已经发生，美国已经占领了东北，国民党军占领了上海，现派兵攻打广州。”“3月21日，国民党举行总反攻”并说这是从蒋介石飞机所散布的传单中写着一个“满”字得知的^④。3月15日，“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司令何康民在乐昌县五山乡招集民众演讲时说：“3月21日总反攻，现乐昌有9个团的兵力，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粤北……^⑤”，扬言要准备策应“国际志愿兵”反攻华南。土匪紧锣密鼓的猖狂活动，闹得人心惶惶，乐昌县城有20余户居民搬家^⑥，一些支前征粮队员在土匪将要暴动前不辞而别，至使第二区（长来区）、第四区（北乡区）的征粮工作完全停止^⑦，一时间，社会治安陷于混乱。

二、土匪发动全面的武装暴动

我们从各种蛛丝马迹中觉察到土匪在蠢蠢欲动，要举行武装暴动，但还不知确切的时间。当时局势很严峻，而我驻乐昌部队13师20团的两个连，根据部队当时：“工作队、宣传队、生产队”的指示，被调去九峰山砍木伐竹，搞生产自救去了。我们根据目前乐昌县匪情日益严重，匪患将起的情况，要求各区、乡提高警惕，加强民兵、农会、区中队的组织力量。为有利于安全和防范，各区政府往铁路边靠拢。这是因为当地民兵和农会组织刚成立不久，没有参加过战斗，县城只有大军（即我人民解放军）团部的后勤人员和伤病员，没有战斗连队（去九峰山搞生产自救），而铁路每隔一段就有大军一个排在护路，万一土匪袭来，也能共同对敌。同时要求各区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枪支子弹的保管，并对如何组织防范等事项作了具体的布置。

土匪探知乐昌县无主力部队驻防，只有乐昌县公安局和县大队、区大队这些地方政府武装（土匪称之为：“土八路”）时，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甚嚣尘上，匪首林显、何康民、黎洪等集结了3000多名反动土匪武装和被诱迫受骗的农民，于3月22日至25日，在全县范围内（全县共5个区）发动了一场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反革命暴动。一时间狼烟四起，但除了第五区的黄圃乡被土匪攻破，造成损失外，县城及附城区（一区）、长来区（二区）、廊田区（三区）、北乡区（四区）都能坚守阵地，英勇反击，集中力量击退土匪的猖狂进攻，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土匪的武装暴动首先在廊田区（三区）发起的。1950年3月22日，“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何康民，勾结乐昌县廊田区反动头子谢仲山，纠集国民党残渣余孽、土匪、地富分子共300人枪^⑦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共1000多人，于拂晓时分偷袭廊田区人民政府和区中队，妄图捕获区政府全部工作人员。

3月23日，乐昌县城多处发现匪特张贴的反动标语，声称3月24日将大举进攻乐昌县城，至使县城内居民骚动不安^⑧，县长陈培兴马上召开县政府干部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这几天土匪要暴动的风声很紧，万一土匪来袭击，我们应如何组织防守、反击，并对县政府大门和围墙加固等细节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布置，不但给每个干部发了枪，配足了子弹，还向位于县政府对面河的乐趣中学也发了一些枪支弹药，并布置了万一土匪袭击县城的具体作战方案。同时，陈培兴县长打电话给韶关市，向北江军分区副政委袁鉴文汇报了乐昌的紧急匪情，要求派兵增援，袁副政委说：韶关市也只有两个连的兵力驻守，派不出兵，你们只有坚守。于是陈培兴县长按照独立自卫的要求作了应战的一切准备。

果然在当晚（3月23日）零点左右，土匪就开始行动了。县长陈培兴接到报告后，远远望见大瑶山从山顶到山脚，有一长串手电光缓缓地由山而下，陈培兴县长断定这就是前来攻打乐昌县城的土匪。因为在解放初期，薛纯武等见我政策宽大，为寻“金蝉脱壳”之计，携带了一些残破枪支和老弱残兵自瑶山下来作假投降，而留下黎洪、何康民等主要武装力量在瑶山隐蔽。平常黎洪、何康民就常带几百人下山抢劫骚扰，这一次是半夜大规模的下山，手电光像流

星似的持续了几个小时，必定是前来偷袭县城的。陈培兴县长打电话到韶关请求支援，但由于土匪准备攻县城时破坏了通讯线路，造成电话不通，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只好派一个通讯员骑马去36公里外的九峰山，通知主力部队回城。当通讯员走到一半路程，到风门坳时，不幸被土匪打死。所以，当我们在县城与土匪激战时，在九峰山的两个连的主力部队还不知道。

3月24日凌晨，打着番号为“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的军长林显、副军长何康民，和伪乐昌县县长薛纯武（刚解放时与龚楚曾一度投诚，后与龚楚一起经清准前往海南岛劝说薛岳起义，但他们一去不复返，逃往香港^⑨）拿出黄金100两支持暴动^⑩，由匪独立一团团长黎洪、特务团团长童得胜为主力，集结三个团约1500多个土匪，疯狂地攻打乐昌县城。其中匪自卫团占据县城北郊，主攻乐昌县政府和附城区（第一区）区政府，匪特务团占据河南水，主攻我驻军后勤部卫生队^⑪；匪独立一团占据城南大肚岭山头，主攻乐昌县公安局。战斗尤以县公安局最为激烈。匪指挥部设在河南中华火柴厂，屋顶插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

就在土匪攻打乐昌县城的同一天同一时间，以匪三十二团团长谭钧亮率领的土匪500余人和以匪大队长李盛财、副大队长邓大环为首纠集的300多人合为一个大队，两股匪共计800余名，分成两路，一路参加攻打县城，一路攻打北乡（第四区）区政府。区长杨文光打电话给乐昌县告急，才知土匪早已把电话线剪断了。

同在3月24日拂晓，以匪西乡保卫团团团长张养等匪首，纠集地痞惯匪罗矮子，强迫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共700多人，攻打长来区（第二区）区政府。

在这场土匪暴动中，我方损失较严重的要数坪石区（第五区）的黄圃乡政府。3月2日晚，第五区区长何详从乐昌开完会，走路走回坪石区政府时已是傍晚，于是何详区长在区公所打电话给黄圃乡，告诉乡长李远岳的工作队长李英杰：“目前乐昌县匪情相当严重，土匪已攻打了县城和其他四个区的区政府，现只剩我们这个区未受袭。你们黄圃乡较偏僻，要注意提高警惕。由于天色已晚，我今晚在区政府驻防，明天去你们黄圃乡。”（从坪石到黄圃约30里）不料，这一情况被当时在石溪邮所做话务员的张德荣（国民党留用技术人员）窃听了，他马上通知土匪，就在当天晚上，土匪开始行动，第二天（3月25日）拂晓时，土匪300多人包围了黄圃乡政府，造成了最大的损失。

三、集中力量，英勇反击，给土匪以毁灭性打击

面对穷凶极恶、张牙舞爪的土匪，乐昌县党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陈培兴县长、杨贵生副团长（驻乐昌四二八团部队）等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领导干部的指挥下，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在匪情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以我之长，克敌之短，运用以逸待劳，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拳头，击其要害等战术，与土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土匪的猖狂进攻，以少胜多地打击了土匪，挫败了土匪的阴谋，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土匪的武装暴动最先在廊田区（第三区）发起。

廊田区：3月22日拂晓，天色朦胧，区政府炊事员黄国

雄起床做早饭，他刚走进厨房，就听见外面有窸窣窸窣的异常声音，他朝窗外一望，只见7、8个手里拿着枪的人在区政府周围探头探脑，他马上意识到这伙人是土匪，便不动声色地从厨房回到自己的房内，拿起一支步枪朝天“砰”的放了一枪。黄国雄鸣枪使土匪偷袭的阴谋败露后，以“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军长何康民、廊田区反动头子谢仲山为首的土匪1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向区政府和区中队包围过来。这帮乌合之众亦贪生怕死，认为枪声响后，区委干部和区中队一定有了准备，于是谁也不敢贸然前进。当时区政府里只有9个人，在区长林立的指挥下，区干部临危不惧，奋起反击，从不同角度用步枪、机枪、手榴弹、火箭筒向土匪射击，区长林立和区干部毛必分别持机枪和冲锋枪，在不同的位置轮番扫射，使土匪无法弄清我方的火力情况，于是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而在区政府不远处的区中队也遭到土匪的围攻，队员们在中队长邓国雄的率领下，用手榴弹炸得暴徒们鬼哭狼嚎，趁暴徒们乱作一团之际，邓国雄带领队员们向外突围，粉碎了土匪妄图消灭区中队的阴谋，并率队员们增援区政府。这时，区政府下乡工作的李仕兰等7人，听到来自区政府方向的枪声后，也赶回区政府增援，同时，乐昌县委书记兼县长陈培兴接到区长林立的告急电话后，即派出县大队一个排，乘三辆汽车前来增援，我们几股力量与区政府里应外合，越战越勇，战斗了一天，暴徒们见无法攻下区政府，刚好天又下雨，只好鸣锣收兵。

第二天（3月23日），反动头子谢仲山不甘罢休，派人破坏通讯设施（剪电话线），准备了十几桶火水油（煤油）、几大捆棉花和几支喷筒，妄图把点燃浇有火水油的棉花团，用喷筒喷射到区政府去，火烧区政府。但在我强大的

火力反击下，敌人不敢近前，而用喷射筒喷射棉花火球。又因距离太远，射程有限，未到达区政府门前便坠落了，暴徒们火烧区政府的计划始终没有得逞。

第三天（3月24日），当林显、何康民、黎洪等匪首在乐昌县城和附城区（第一区）、长来区（第二区）、北乡区（第四区）发动全面的暴动时，谢仲山这条泄了气的癞皮狗又神气起来了。他集中土匪兵力以机枪、土炮为掩护向我猛攻，我方则掷出一颗颗手榴弹把冲到近前的暴匪炸得魂飞胆丧。这时，我驻军四二九团一部得到消息，马上赶来增援，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内外夹击，打得土匪抱头鼠窜，争相逃命。至此，平定了为时三天二晚围攻廊田区政府的土匪武装暴动。

县城（县委、县政府和附城区；驻军后勤部；县公安局）：3月24日凌晨6点，土匪攻城主力黎洪（龚楚的卫士长）在匪指挥部打电话到县政府，以威胁的口气打电话给县长陈培兴：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交出县长大印。陈培兴县长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你们被我们反包围了，你们赶快向人民政府投降吧。双方在电话里争持不下，黎洪见陈培兴县长没有投降的表示，即向我们发起进攻，暴匪们从四面八方方向县政府、县公安局、驻军后勤部进行猛烈的攻击。靠近县政府这边的土匪主要从石角庙、西门口、老虎头、鲤鱼岭等地，向我攻击。由于事前已有充分的准备，陈培兴县长胸有成竹地指挥着县大队武装和县政府工作人员，靠在大门边和伏在围墙四周进行有目标的还击；乐昌县委副书记陈奋在县委（与县政府隔条街）组织县委秘书曾向群等1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抵抗，同时，对面河的乐昌中学也组织起来打击土匪。离县委、县政府200米外的是驻乐昌一四三师四二九团的团部后勤卫生队，也遭到匪特务团团团长童得胜、营长曹炳

荣率领的土匪200人枪的包围^②，那是拂晓时分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不久，团部通讯员向杨贵生副团长报告：“团部已被包围了”！杨副团长命令：“坚决顶住”！这时，通讯员用机枪向院子外面的匪敌一阵猛射，将土匪打退了。杨副团长跑上团部对面的一座饭店大楼上，（这楼是全县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观察匪情，只见土匪几个指挥部都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铁路沿线都被土匪占领了，约有1000多名暴匪正在攻打县公安局、县政府。杨副团长见匪情紧急，而团部主力两个连又去了九峰山执行生产任务，不在县城。在这紧急关头，杨副团长把在团部后勤部卫生队的70多名伤病员、5名司号员、7名通讯员和警卫员组织起来，编成两个排，并在后勤仓库里拉出两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安排5名司号员各带2名战士分别在5处隐蔽起来，并命令重机枪一打响，就吹冲锋号。杨副团长布置完毕，即带两个排抢占驻地后面的山头，将重机枪和迫击炮分开，并指着匪指挥部的青天白日旗对炮手说：“给我打”！不料，头两发炮弹没有命中，杨副团长急得大叫：“你怎么打的”？炮手赶紧调整炮架角度，又再发炮，只见“轰！轰！” ，炮弹象长眼睛似的命中匪指挥部。接着各种武器向土匪一齐发射，隐蔽在5处的军号手“嘟嘟嘟……”砍起了冲锋号，杨副团长把手一扬，对同志们大喊一声：“冲啊”！霎时，两个排的伤病员个个尤如猛虎下山，向匪群冲去，那勇猛顽强的士气，丝毫看不出他们是伤病员。土匪见自己的指挥部被打毁了，而我方声势浩大，以为是大部队回来了，于是望风而逃。我军乘胜追击，其中有一股土匪约80人，顺着武江河往下跑，发现有两艘船，连忙登船逃命，杨副团长率战士紧追不放，边追边用机枪扫射，后来将这两艘船上未被打死的土匪全部抓

获。当杨副团长审问率暴匪攻打我驻军后勤部的匪营长曹炳柴时，他说：“前几天我们派了好几个人来侦察，都说乐昌县城没有部队，没想到你们主力部队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是他们把我军后勤部伤病员当成主力部队了呢。

这时，乐昌县公安局枪声还很紧，杨副团长决定派出部分武装力量前去支援。

座落在乐昌县城南的县公安局，是全县的制高点。土匪攻打乐昌县城时，把主要力量放在攻打县公安局上。因为公安局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专政机关，同时公安局内关押着一批国民党的政治要犯，土匪头子、骨干和反革命分子。所以土匪把攻打县公安局作为攻打乐昌县城的重点和关键，以此达到控制全县的目的。土匪的阴谋，早已在县公安局的意料之中。在土匪暴动之前，公安局局长冯成烈掌握了一些匪情，并根据土匪活动的各种迹象，召开了县公安局党支部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安局公安队队长李球、排长郑伟、蔡详等8名党员，会议具体研究了土匪如果来攻城的应变措施，并对8名党员作了具体的分工，同时决定将外面的活动哨撤回，以加强对公安局的守卫，严密监视关押在公安局内的政治要犯、匪首、骨干和反革命分子。另外，将个别不可靠的旧职人员的枪支暂时收缴起来，并加强警戒。

土匪将要暴动的情况，县公安局的党员们也不便对其他人员说，因为那时干警中成份很复杂，一些是刚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官兵和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3月23日晚上县公安局干部们都不睡觉，枕戈待旦，公安队排长蔡详、郑伟各自抱着一挺捷克轻机枪，严阵以待，分别守卫着县公安局的前、后大门，直到墙上的钟响了6下（已是3月24日的早晨），大伙才松了一口气，当大伙正想脱衣上床睡觉，就听到枪响

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大叫：“土匪打来了！土匪打来了！”原来是公安队的一个小战士清晨天蒙蒙亮时到外面上厕所，发现土匪不断向公安局蠕动，就朝天放了一枪，边跑边叫地赶了回来。县公安局长冯成烈、公安队长李球马上指挥三、四十名干警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匪独立一团团长黎洪（龚楚的卫士长）带领土匪主力500多人（攻打公安局总共1000多人），其中有两个连约200多人他们的前身是国民党交警部队（即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的特种部队），战斗力较强，其势汹汹地包围了公安局后山头的大肚岭（今新村街一带）、今建为人民公园的那座山头 and 对面法院那个山头，对我县公安局进行所谓的重点进攻。暴匪们分两路进攻公安局：一路从正面主攻；另一路从大肚岭侧攻。公安局局长冯成烈、公安中队长李球、公安中队一排长郑伟、二排长蔡祥等都是身经百战的领导干部，在这紧要关头，身先士卒。郑伟带领一个班的公安战士，同时用一挺重机枪守住县公安局的后大门，蔡祥带一个班的公安战士，同时用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守住公安局的前大门。公安干警们充分利用县公安局大门右边的围墙和左边的烂墙角为掩体，欲擒故纵，不急于还击，等土匪从低坡处爬近公安局这个制高点时，即用机枪进行猛烈的扫射，打得爬过来的土匪纷纷滚下山坡。土匪又组织起以轻、重机枪为掩护的数次冲锋，但均被我狠狠地击退了。土匪见正面主攻不下，就加强了在大肚岭方面的侧攻。土匪以轻重机枪为掩护，几度冲锋爬上公安局的后门，都被我以同样猛烈的火力所击退。当手榴弹用完时，蔡祥就用砖头掷下去，土匪在坡下面竟然惊呼起来：“手榴弹！手榴弹！”。

暴匪们攻打县公安局的战斗开始后，关押在县公安局牢

房的政治犯、匪首、匪骨干和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趁机起哄闹事，有囚犯喊：“时机到了，想办法冲出去呀！……”蔡祥趁土匪败退滚下山坡之时，端着机枪走到牢房前，警告在押犯人说：“谁要闹事，我就用机枪扫过去！”这样，他们才老实一些。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大约在9点多钟，我方的子弹将要用完之时，幸得驻军四二九团杨贵生副团长派后勤部一个班来增援县公安局。我们公安局全体干警的士气更加高涨，经过激烈的战斗，至10点半左右，解放军有一个排的兵力介入战斗，原来他们是战斗英雄模范，坐火车到广州开会，到达乐昌时遇上暴匪们破坏铁路，要袭击抢劫火车，这六、七十名英雄模范给土匪打了个反击，还冲入乐昌城。约11点以后，我们开始反攻，县政府那边的县大队和四二九团后勤部也开始反攻了，杨副团长命令炮手向大肚岭方向开了几炮，土匪惊慌失措，我们反击成功占领了今建了法院的那个山头，在进攻公园方面的那个山头时，牺牲了三名解放军战士。

我方从战斗中得知，土匪的总指挥部和主要武装力量集结在河南，于是用迫击炮向匪巢轰去，并由大军一位连级干部（据说是英雄模范）带一小组，端着冲锋枪，冒着生命危险，在下浮桥泗水渡河，连长刚游上岸，就被隐藏在大树后的土匪击倒，紧接着战士们端起冲锋枪向土匪扫去，控制了彼岸，跟着大批部队从浮桥冲了过去。土匪见指挥部被我军炮火轰垮，且见我大军已过浮桥，便望风而逃，待我军到达河南中华火柴厂匪总临时指挥部时，土匪已逃跑了。在城北的西门口、鲤鱼岭、大肚岭一带残余的土匪，见河南的临时总指挥部已完蛋了，于是也抱头鼠窜，四散而逃。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西乡塔脚下才返回来，战斗结束了，这时已

是下午3点钟了。这次战斗，我们公安局没有伤亡，但解放军却牺牲了4人，负伤5人。

这次土匪袭击县城，我方以不足百名武装队伍击溃了上千之众的土匪，说明我指挥员顽强机智，土匪确实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有相当部分是拿着扁担，想来县城抢东西发横财的，所以真正一打起来，他们就不敢向前，甚至偷偷跑了，他们只有两个连的战斗力较强。暴匪们拥有一门六〇炮（但未打响），还有水龙重机枪1挺，轻机枪19挺，其余大部分是卡宾枪。我们公安局的武装也不太好，只有轻重机枪各1挺，其余大部分是驳壳、步枪。公安局长冯成烈、公安队长李球都是使用驳壳枪。

平定了县城土匪的暴动后，陈培兴县长在县邮电所调查，为何土匪攻打前电话打不出去，而土匪头黎洪的电话却打得进来？结果查出邮电所所长黄胜（国民党旧职留用人员）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他那里还搜到精巧的美式小手枪。他通过电话刺探我方军情，这次土匪攻城就是他通风报信。此外，他为了配合土匪的进攻，竟在总机中散播公安局已投降缴枪了的谣言，企图阻挠我军增援。

北乡区：在3月24日那天拂晓时分，与县城同时受到袭击。匪三十二团团长谭钧亮、匪大队长李盛财和副大队长邓大环等共率土匪400多人，攻打北乡区政府。区长杨文光打电话向县里告急，才知电线已被剪断。这时土匪的子弹纷纷从离区政府不远的邓大环的楼上，居高临下地向我们射击，在区长杨文光和区中队长张树枝的指挥下，区干部约20人充分利用区政府四周互不连接的建筑物（象个炮楼）的有利地形条件，向四面包围而来的土匪射击，并由张树枝掌握的唯一一挺机枪，轮换着从区政府四周各个枪眼，向外面的土

匪射击。暴匪们十分怕死，躲在邓大环的楼上和房后各个角落盲目射击，连头也不敢往外探；包围区政府的土匪也是些胆小鬼，他们不敢靠近区政府，而远距离射程又达不到，所以象小孩玩玩具枪似的在那里哔哩啪啦乱放枪。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战斗，匪首邓大环见毫无进展，便呼喊暂时停火，派人送来了一张条子：“杨区长，你们现已被我全部包围，插翼也难飞，缴枪投降，还会有条生路，务请即复”。杨区长看完条子后，告诉大家：我们绝不投降，土匪是无法攻进来的，只要坚持住，等待县里派兵来解围。接着土匪又向我们喊话，我们以机枪作回答。土匪不敢趋前进攻，这样，对我方只能是围困，却无法攻破。

经过一天的战斗，到晚上时土匪的枪声稀落了，但黑色的夜幕带来的是更加紧张的气氛。因为我们只得忍着饥饿和疲劳，密切监视土匪的一举一动，以防土匪利用夜幕作掩护，前来火攻或施展其他方式的进攻。何况区政府楼下存放了不少收、缴来的民枪和支前粮食，这些正是土匪想要得到的。夜深了，土匪除了偶而放一、两枪以示他们并没有完全睡觉外，双方没有发生大的交火。好不容易盼来了黎明（3月25日），我们断定土匪已无计可施了，就安排大家轮流休息，以便打持久战。战至10点钟左右，土匪远远望见一大批武装队伍沿公路前来，吓得他们魂飞胆丧，望风而逃。我们和这队人马相见之后，才知这个连是从九峰山完成任务后回县城来的，而他们也才知道我们被围困了一天一夜。在这次反击战中，我方无一伤亡。

长来区：这个向来被称为匪窝的地区，不但是国民党专员龚楚的家乡，而且是黎洪、罗矮子、烂庙古、张穿耳等惯匪的“根据地”。我区委书记林振废在土匪将要搞暴动之前

不但加强对区中队、农会、民兵的军事知识训练，而且向守桥护路的铁路部队求援。经护路部队王明师长的同意，从湖南衡阳调来7个班的战士到乐昌长来区，援助区政府。在3月23日夜11点，除了大军唯一的重机枪班和20多名区干部留守区政府外，其余的6个班各带二门掷弹筒、一挺轻机枪，加上由区长刘汉斌、区中队长饶济生带领区中队、民兵共50余人，夜行二、三十里，主动出击土匪经常出没的大岭脚和西乡的几个村。3月24日拂晓时刚开始搜索，就听见乐昌县城的枪声，继而长来区的枪声又闻于耳，土匪已抢先一步，向我区政府进攻。留守在区政府的大军重机枪班有战斗经验，凭枪声判断土匪的方位及装备情况，见那里有枪响，机枪就往那里扫射。土匪见有机枪把守，不敢靠近区政府。匪首张养、罗矮子气急败坏地大叫：“你们快起来，去发洋财呀！”正当土匪想包围区政府时，大军6个班和区武装50人赶了回来，用机枪向土匪包抄，还打了几发炮弹，至中午12点时将土匪击溃。然后，派出30多名大军，带上一门炮，去支援乐昌县城，并向位于县城河南的匪阵地放了两炮，直到乐昌县城枪声停了，才返回区政府。

坪石区黄圃乡：3月21日晚，国民党黄圃乡长白炳焕勾结“反共救国军第四军”三十三团指挥员李勋高、参谋陈泰禧，率三十三团一部，共300多人，连夜行动，于3月25日包围了我黄圃乡政府。因叛徒出卖，致使乡长李远岳、工作队队长李英杰等乡干部和工作队员共18人惨遭杀害。损失冲锋枪1支，步枪113支（大部分是乡政府收缴来的民枪），手枪3支，弹药一批。造成这次土匪暴动以来最严重的损失。

土匪在全县范围内掀起的总暴动，终于被我们粉碎了。我们坚决地反击了土匪的猖狂进攻，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器

张气焰，从而取得了保卫新生政权的伟大胜利。

四、乘胜追击，肃清土匪

平息了土匪的暴动后，我军调整了部署，把一四三师原负责北江地区16个县的防务缩小为只负责6个县。于是乐昌县调来了较多部队，他们发扬“追穷寇”的精神，马不停蹄地开展较大规模的剿匪运动，把“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作为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乐昌县委、县政府密切配合剿匪部队，不断收集匪情，协助部队主动出击。在我剿匪部队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除有少数匪首逃亡香港（如“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军长林显、匪首谢仲山）外，其余匪首或骨干分子逐个落网，如：“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军长何康民、第十一师师长董超云^⑧、朱炳寰^⑨、师部秘书丘策中，三十一团团长薛秀基、副团长张志坚以及反动会道门“一贯道”道首曾崇贤、何志清；还击毙了匪团长白铎其（薛岳的管家）、匪大队长陈能文、匪连长黎××^⑩。匪徒们失其控制，内部动摇分化，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分化瓦解土匪的工作，对土匪展开政策攻心战术，重申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指出土匪只有放下武器，投降自新才是唯一的出路；反之，顽固不化，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只有死路一条。同时在匪属中开展“索夫唤子”运动，在我党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匪属们也积极协助我们劝降其丈夫、儿子、兄弟，使匪众纷纷下山投案自首，也有一些土匪的中、小头目，在我攻心政策的威力下，放弃反动

立场，带领部属下山自首，争取将功折罪。如跟随匪独立一团团长黎洪多年的，曾参加并指挥暴动的两名匪干，因见黎洪不肯自首，就把他打死，然后拿了他的枪前来投案自首。匪副团长骆麻子也因拒绝投降，下属打死了他，然后携枪向我自首。至1950年6月止，计有自新匪首105人，其中连级72人，营级28人，团级4人，师级1人^①。以最先受到土匪袭击的廊田区（三区）为例，就有800多名土匪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和我军猛烈攻势的威慑下，放下武器，走自新之路。为了教育他们重新做人，县委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学校举办了自新人员训练学习班，使他们懂得了党的政策，认清了形势，决心痛改前非，改恶从善。

经过发动群众和全体军民的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对匪展开猛烈的军事进剿和强大的政治攻势，解放初期在乐昌县境内消灭的股匪有：“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第二师、第十师、第十一师共三个师以及三十一团、独立团、特务团等8个团^②，共毙伤和俘虏土匪3600多人，缴获枪支2800多支，子弹近5万发，以及军用物资等一大批，从而肃清了匪害，剿灭和瓦解了残匪，强化了曾经一度陷于混乱的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附注：

①本文根据陈培兴、杨贵生、林立、蔡祥、杨文光、林振庚等回忆资料以及有关档案材料整理而成。

②韶关市公安局档案1950年第一卷《对乐昌县公安局工作检查》

③乐昌县档案馆一卷《办理旧军政人员登记总结》

④、⑤乐昌县档案馆1950年3月21日乐昌县公安局长冯成烈的《匪情报告》

⑥乐昌县档案《战争详报》

⑦、⑩、⑫韶关市公安局档案第15卷《乐昌县公安局“三·二四”战斗总结》

⑧、⑨乐昌县公安局档案大事记

⑪韶关市公安局档案第15卷《冯成烈就“三·二四”事件向李北淮汇报》

⑬韶关市公安局大事记

⑭、⑮、⑯乐昌县公安局档案1950年第四卷《通报》

记解放乐昌时的几件事

张 艺

1949年10月6日，北江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北二支队”）主力团配合南下大军深夜开进韶关（当时叫曲江），韶关宣布解放。一周后的一天，韶关军管会、韶关警备司令部的袁鉴文（军管会副主任兼警司政委）、吴伯仲（警备司令员）等领导同志，要我从北二支队主力团中带一个连（连长张发桥）的武装，护送一批县、区干部去乐昌建立新政权，继之，护送四位军事代表去接收南岭煤矿。

（一）解放乐昌城

当时乐昌的情况怎么样？大家不了解，总认为韶关已解放好几天了，在乐昌的国民党军队不逃跑也溃散了，我的任务是护送，没有考虑要打仗，况且领导也只叫我仅带一个连去。

10月15日晚，早夜已过，天色朗朗，秋意宜人。我们部队和县、区干部及军事代表分乘四辆烧木炭的无篷汽车和一辆客车从韶关出发北上。

我们“北二支”一个连，南下大军一个加强排（配有一门“六〇炮”），大军一位蔡副营长当我助手。同去乐昌接收的县、区干部有：县长兼书记陈培兴、副书记陈奋，组

织部长兼三区书记王西云，宣传部长兼一区书记郭敏，民运部长兼五区书记孙新华，四区书记王东山，五区长何祥，县秘书兼一区长曾向群，二区长林××，还有洪波、缪峰、张和、潘沛、梁英清、司徒卓等同志共三十多人。军事代表宋维静、唐真、萧方、老郭等四位同志。

那时的汽车是以木炭为燃料的（我们称它为“老爷车”）马力小，时速慢，稍陡的坡，便要派人下车助推。公路破烂不堪，汽车颠簸不停，许多同志弄得昏眩呕吐，叫人难受。汽车跑了40多公里，费时竟4个多钟头。拂晓时，终于到达长埭的南公路桥头。火车铁桥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溃退时炸塌了，公路木桥也被烧断了。我们只好在桥南停下来，找到一个糖寮（私人开的榨糖小厂）烧火做饭。

早饭后，我们分兵两路进军乐昌。一个排由张发桥连长带领沿铁路搜索前进；三个排护送县、区干部和军代表由公路北上。

在离县城二、三公里的一个山头上，沿铁路搜索前进的部队突然和国民党军队的排哨交火了。我和副营长即刻带着二个排跑步前进。国民党军队却放了几枪就拔腿逃离了哨位。

乐昌城南的马屁股岭和大肚岭（现“新村”和县公安局一带的山头），是控制县城的制高点，又是进城的门户，国民党在山上筑有土碉堡，有蜘蛛网似的交通壕，当时国民党有一个连在驻守。不拿下这个山头，我们很难进城，如果绕道进了去，县城也很难控制住，我和副营长马上研究了打法：先用“六〇炮”开路，然后以3个排的力量强攻。

顷刻间，“轰”的一声巨响，山顶上扬起了一团烟尘。这出其不意的一炮，虽对国民党军队没有造成多大的伤亡，

但却打破了敌人的胆。顿时，他们乱作了一团。我们3个排勇猛地向山头冲击。“冲呀”！、“缴枪不杀！”的呼喊声，以及密集的枪声，震撼了大肚岭。国民党驻军抵抗了一阵子便溃逃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有两位英勇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之后，蔡副营长带着加强排坚守马屁股岭和大肚岭，我带了3个排护送县、区干部进城开展工作。在城内，县、区干部在地下党朱小辉、杨文光和周平、张洪等同志协助下分别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召开工商界人士会议，宣传我党政策，要工业界保持正常生产；要商业界开门营业，公平买卖。二是召开国民党县政府及所属单位没有逃离的人员会议，宣读了韶关军管会的“约法三章”的布告，愿走者便发给路费，愿留者要负责保护文书档案和一切财产，等待接收。

我们进城后，地下党同志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北江专员龚楚，在韶关解放前夕，带了两个连的兵力潜回他的老家乐昌，国民党乐昌县长薛纯武，还掌握保安团5个中队的兵力。共有兵员六、七百人。龚、薛合谋准备组织“反共救国军”，带着人马上山“打游击”，企图“东山再起”。

我们开始进攻大肚岭时，龚、薛除留一些兵力占据铁路边的“老虎头”、“鲤鱼岭”一些山头外，将主要兵力撤到河南水一带山头和农村。为防止我们部队过河追击，他们拆除了横贯武江的两座浮桥，并在武江沿岸布兵防守。河南水宝塔（又称南塔）山上的国民党军队与我们大肚岭阵地仅一江之隔，他们不时向我阵地开枪打炮。国民党兵打过来一发“六〇”炮弹落在沙堤市，当场炸死一位姓郑的群众。面对此情景，部队战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以炮还炮。当时我

考虑到山上有宝塔，附近又有许多村庄，如果发炮稍有误差，就会伤害百姓。宝塔不能毁、百姓更不能伤害，故我没有同意还炮。

下午3、4点钟了，我请示陈培兴同志。最后决定：撤。因为，我们只有4个排的兵力，很难去消灭国民党7个连，时间长了，他们很可能反扑过来。要彻底消灭这股国民党军队，我们部队的力量一定要增加。而且暂时撤下来，对龚、薛也能起着麻痹作用。

为了作好撤的准备，我派文化教员华栋材同志带炊事员到青龙街三界庙去做饭。没多久，通讯员跑来向我报告，说华栋材同志到河边洗菜时，被对岸国民党军队开枪击中，负了重伤，抬到医院去了。在医院里，医生护士认真负责，忙个不停，我记得在抢救华栋材同志的现场中，医院除免收一切费用外，还送给我们好些药品。

当晚，我们雇了一只小艇，将华栋材同志送回韶关。曲江医院院长陈维廉非常热情，亲自收下了伤员。

夜已深。我们趁更深人静，沿公路步行南下，撤往桂头大坝（即现飞机场一带的农村）。部分县、区干部和家属撤回韶关。

在大坝，韶关军管会、警司又给我们增派了两个大军连（机炮连和机步枪连），还命令我们：坚决歼灭龚、薛部队，速即解放乐昌。

龚、薛主要兵力已撤到河南水。我们决定的打法是，以一个机步枪连，由连长张发桥带领沿公路北上直插乐昌城；以两个连，一个加强排沿武江西岸北进直扑河南水，来他个出其不意的“兜笃将军”（广州话，意即迂回包抄，插入敌后）。

10月18日，午夜刚过，部队分头出发了。我和蔡副营长率部队凭着夜的余光渡过武江，沿着西岸山脚小路北进……

途经“上西”、“下西”，快到河南水时，天边已露出鱼肚白，农家袅袅炊烟，隐隐可见。这时，只听见一声令下，顷刻间，密集的枪声、“冲呀”“冲呀”的呼喊声，顿时打破了拂晓的宁静。我们一个连出其不意地歼灭了驻在村内的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

我和副营长走到村子，看到晒场上蹲着好几十个身穿黑军装的俘虏，个个低头无语。我从一个腰间还系挂着手枪皮套的俘虏口中得知，龚楚和薛纯武带着几百人逃往黄坪，大、小洞一带的大瑶山上了。

19日，快到中午时分，我们部队鱼贯地进入县城。此时，县城的居民和城郊的农民，已挤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欢笑声此起彼伏，比过年还要热闹，还要高兴。乐昌解放了！长期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的乐昌人民，那有不欢欣鼓舞呢？

黄昏时分，北二支队新一团（饶纪绵起义部队新编团）在团长饶纪绵、政委谭颂华同志率领下进驻乐昌城。同来的还有解放军部队的一个团（团长杨贵生，后为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的任务是继续追剿龚、薛部队。

（二）进军水牛湾

20日上午，我率张发桥一个连，从乐昌城护送韶关军管会四位军代表乘火车（火车头拉一节无篷车卡）北上水牛湾。

当火车行进在岐门、大源一带的大山区路段时，两边山

上不停地有人向我们打冷枪。我当时断定是一些散兵游勇，没有理睬，通知司机加速前进。快到中午时分，当火车就要通过罗家渡车站直开水牛湾时，一位车站工人伸出红旗命令停车。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撤退时炸断了罗家渡的火车铁桥，钢梁已横卧在田头水的河中。无奈，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前进。

北粤的水牛湾，当时只是个三、两千居民的区区小镇。镇虽小，可是个粤湘交界的门户，又是军事要塞，是历代兵家拚争之地，相传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曾率军在此地的金鸡岭上坚持长期的战斗，清兵始终都无法攻破。因水牛湾地位的重要，所以国民党当局常驻着三、二百名的铁路交通警察。“交警”的前身是“宪兵”，全是美式装备，队员一般都享受排级待遇，平民百姓对他们避而远之。

那时，陈赓同志率军沿粤汉线驰骋南下，把两、三千“交警”压倒在地水牛湾和白石渡一带铁路线上。韶关解放了，从而又堵死了“交警”继续南逃之路；路东湘南各县相继解放，“交警”不敢东窜，只好往西方向的连县，临武一带逃窜。由于在前面遭到连江支队游击队的堵击，后面又有大军追歼，弄得“交警”蒙头转向，狼狈不堪。在湖南栗源堡一带地方，大军同“交警”打了几次恶仗，歼灭了大批“交警”，但我军伤亡也较大。

我们部队开进水牛湾时，宜章、乳北、坪石的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李子明同志出来迎接。当时，我们看到车站上摆着3台被“交警”破坏的火车头，许多群众在中共地下党同志指挥下打捞被“交警”丢到河里的设备和火车头部件。

（三）接管狗牙洞矿场

解放军的军代表宋维静同志，负责留守水牛湾南岭煤矿公司，并指派李子明同志为军事代表进驻狗牙洞矿。

20日下午，李子明同志请驻水牛湾大军团部增派一个加强排，同我们一起乘渡船到邻石坝，沿小路向八字岭、狗牙洞挺进。

粤北山区冬来早，寒意浓。快到八字岭时，天色已近黄昏。这时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我们是轻装而来，没有雨具，只好冒着大雨艰难的前进。雨浇寒袭，同志们无不冷到发抖。在夜间，我们好不容易走了二、三十公里，才到达了八字岭矿。八字岭矿已为我们事先准备了好几大桶鸡粥，这是我们几年来没有享受过的美味晚餐。

军代表李子明同志，考虑到我带的连队，几天来不停的行军作战，太疲劳了，便要我们夜宿八字岭。他带加强排当晚继续向狗牙洞进发。

第二天一早（21日），我按照李子明同志的意见，在八字岭矿留下一个排驻守。我带着两个排继续前往狗牙洞。

接管南岭煤矿公司和所属八字岭、狗牙洞的矿场后，200多名矿警自动放下武器（均是法国制造的步枪）。矿内生产正常进行，秩序井然，治安良好。

我当时在想，接管工作为什么这样顺利？有些同志告诉我说：南岭煤矿是“四大家族”宋子文办的。1949年4月南下大军渡江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曾下令南岭煤矿公司成立一个“应变会”，应付游击队进占，万一进占时，就破坏矿场设备，不得留下任何东西给共军。李子明同志通过与南岭煤

炭公司业务室主任李赋（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国民党军队上校军需）的同乡关系，到矿当“临工”（实际任统计），公司总经理田策云、公司业务室主任李赋、秘书焦纯平（李赋小舅）和矿长潭仁，在李子明等同志长期开导和影响下，靠拢我党，积极支持革命。在公司的水牛湾河边煤栈建立了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的交通联络站，这个站由李赋的弟弟共产党员李汕林同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1944年夏，连江支队司令员周明同志给公司写信，要职工坚守岗位，保护矿场设备，等待人民政府接收，不得破坏。由于形势的急促发展，为了保护好矿，公司田策云、李赋等负责人，按照我党意见，成立了“护矿委员会”。在狗牙洞矿上，田策云、李赋等主持召开了职工大会，号召广大职工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保护矿场设备，对破坏者要严处，对立功者要鼓励。据说，在我们接管前夕，曾有一股残敌密谋破坏狗牙洞矿场，但在广大职工严密保护下没能得逞。

由于我地下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党的真挚朋友通力合作，广大职工严密保护，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矿场设备的阴谋始终无法得逞，南岭煤矿遂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0年春，李子明同志调北江地委工作，由南下工作团的老郭同志接任驻矿的军事代表。接着，北江军分区调我去曲江、始兴剿匪，于是护矿工作就由周来营长接替。

事隔40多年了，有些事情今天回忆起来难免会有错漏之处，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谢谢。



上图为乐昌解放时庆捷表功场景，下图为欢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广州、乐昌解放大会游行队伍中的文艺队。（照景为现在的沿江路段的府前街文江桥段）

（本页照片由乐昌铁路中学彭绍琛提供）

全歼空降于粤北的蒋帮特务

张惠全

1949年，自国民党从大陆溃逃到台湾之后，天天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其特务机关为了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仗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投入大量钱财，也不惜丧送其特务人员的性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武装特务从沿海一带或从港澳等地潜入我内地，搞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据统计，我省就先后有9批共102名武装特务从海上爬上来，7次从飞机上空降下来。不过，他们尚未站稳脚跟，也都一一当了俘虏。蒋帮特务机关还大搞心战活动，不时用飞机或气球向我大陆空投空飘反动传单、日用品，甚至伪钞、假粮票，但均无法起到动摇我军心民心的作用。现将全歼台湾特务机关空投于粤北的两股特务的情况简述如下，以启迪人们提高警惕。

—

1952年3月，正在台湾国民党军内服役的原籍始兴县的华秉琦，受台湾特务机关——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头目接见，被告知：“美国正派兵进入南韩，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大陆同胞有志之士，已揭竿而起，组成反共救国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期待国军早日重返大陆，光复失地，统一中华，特别是广东粤北反共武装已达万余人，您的同宗华秉贻（注：

匪首，在剿匪中被我俘获）是粤北反共救国军首领，现急需军事指挥官和电台，加强领导力量和扩大队伍，上峰决定，急派一批英勇将士返回大陆游击基地……”当华秉琦还未彻底弄清这次接见的真正意图时，粤北反共救国军上校指挥官的委任状已展现在他的眼前，并向他下达了尽快空降粤北的命令。

4月13日晚，台北机场一架军用小型运输机停在机坪上，那个“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头目带领着少校军衔的谭天和两个电报员，把他们交给了华秉琦，并嘱咐他要完成党国重任，为发展敌后武装，为实现光复大陆，不成功则成仁……

接着，正副指挥官、电报员共4人背上降落伞，各带手枪、冲锋枪登上飞机，同机把电台、电讯器材、密电码、黄金、港币和军需物资系在另一个降落伞上。倏间，驾驶员驾机腾空而起，越过海峡，飞抵东海域，驾驶员扳动操纵杆，飞机急速降至几乎贴近海面，其目的是为了躲过我边防雷达的侦察，当飞机接近大陆时又腾空而起，朝着粤北方向急飞，到达粤北区域时，驾驶员下达了空降的指令，舱门开启，机上4人和一个带物的降落伞迅即离开飞机空降，飞机随即掉头返航。

跳伞一瞬间，华秉琦正做着美梦，他以为着陆后其同宗华祖貽定会率领部下迎接台湾派来的指挥官。那知，着陆点却是茫茫林海，不见一人……这是特务华秉琦被俘后的自述。

再说，14日凌晨，翁源县礼荷乡上空从连平县方向传来隆隆之声，由远而近，该乡乡长和土改队长于家泉，想起上级关于空情的通报，意识到可能是蒋帮飞机入侵窜扰，随即跑到户外，监视着天空，发现飞机正在盘旋着并在该乡黄坑

坳地方投下五个黑影，黑点由小变大，不久就消失在丛林中。他一方面发动干部群众监视，一方面即电告县公安局。崔玉璋局长接报后即向县委刘书记报告，并由县委领导，公安局长带了80多名干警乘坐两辆大卡车迅即赶到礼苟乡。当时北江公安处、军分区领导接报后也亲自赶来乡间，当地民兵、群众听说山上空降了特务，也纷纷手执大刀、长矛、鸟枪、火銃赶来，二千多军民，不顾个人安危，将空降地点——黄坑坳铁桶般的包围起来。面对茫茫林海荆棘丛生的环境，要抓空降特务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特别值得赞扬的是该乡土改后翻了身的农民，他们明知空降特务身带枪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与军队战士同心协力，逐山搜索。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处草丛中发现有东西蠕动，“缴枪不杀”之声随之四起，三名特务此时，浑身发抖，但仍不愿举手投降。结果，枪声响处，特务中副指挥官谭天，电报员龙德忠被当场击毙，指挥官华秉琦被生俘，另一特务何锡空降时降落伞系于杉树顶端缩成一团，被发现后，乖乖下来当了俘虏。至此，两千多军民的围歼战斗取得了辉煌战果；全歼了空降之特务（毙2俘2），缴获降落伞5把，美制电台两部，手枪冲锋枪各4支，子弹千余发，还有黄金、港币、衣物食品等一批，而我方却无一伤亡。

二

1956年冬，正值广东省党政机关干部开展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斗争运动，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广东的地方干部正被揪斗，一定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潜伏国内的

某些反革命分子趁机与台敌特机关挂钩搭线，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台湾蒋帮特务机关决定派遣特务空降韶关，为暗藏在韶关的反动分子输送电台，以利于获取大陆情报和勾联策反。

11月14日凌晨，韶关市人民还在酣睡之际，公安机关却忙个不停。他们在获得空情警报之后，立即安排公安部队严密监视着天空。果然，夜深人静之际，韶关上空传来隆隆机声，只见一架敌机来了几个盘旋之后，接连投下几个降落伞。在夜幕之中，我公安部队误为空降特务，朝着空中黑点接连射击，伞落之处，发现只是反动传单、布料、日用品，却不见人影。原来，这是台湾情报局的阴谋诡计，他们以此手法来麻痹我们。当飞机飞离市区后才在市郊古洋乡罗岗村上空将携带着电台、密电码电讯器材的特务徐继才空投下来。当徐着陆后，发现那是一片古坟废冢，正是藏身之地，心神稍定后，天已渐明，他收拾好收发报机、衣物等后钻进古冢内隐藏起来。三天过去了，徐观察洞外没有异常动静，即绘了地形图，做好标记，徒步来韶，爬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直抵广州。按蒋帮保密局指示，他应在某旅店与内地潜特联络，交接电台，旋即离穗赴港返台。可徐一连等了几天，都无人用暗号前来接头，直到17日徐企图从深圳出境时，因没有出境证（按：在解放初期，罗湖口岸未有封关，人们来去香港自由，是无需证件的）兼且行踪可疑而被抓获。经公安机关审讯，并向其阐明我党政策，徐于是才供认了空降经过和任务。后来在公安人员的押解下来到韶关市郊，他空降时的落地点，在地冢内缴出电台、电讯器材，经费、金戒指、港币等物证。终于，在1957年9月5日，徐犯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解放初我市宗教界的一些情况

田和平 刘国丽

(一)

解放初，韶关市区的佛教界活动主要在地藏阁和大鉴寺内。地藏阁有和尚两人，住持是释天然；大鉴寺内有和尚5人，住持是释天性。在大鉴寺内还建有一个手工业棉毛巾加工厂，有职工20余人，由天性任工厂经理。

1951年11月，韶关市佛教界成立市佛教会，会址设在市区漂布塘地藏阁内，主任委员是天然，副主任委员有天性、邓栅波、提辉、曾能有，委员有邹兆麟、陈少芳、罗宽瑛等3人，先后任书记员的有黄光通、丘燕南、邓志芳3人。登记入册的会员有137人，而妇女则有108人，在29名男士中，有17人是道士、庙祝。真正受过戒的和尚只有天然、天性、提辉等人，其它则大多是一般普通的居民，尤其是50岁以上的老太婆占多数。少数人是因信仰佛教而入会的，而大多数人则是因为迷信木偶神像，平常喜欢去寺庙烧香拜神而被邀入会的，这些人对佛教的教义是了解不多的。

市佛教会下分11个组，各组的负责人分别是：一组组长胡新彩、二组组长邓志芳、三组组长邓恒珠、四组组长魏印振、五组组长肖宽兰、六组组长彭祥、七组组长李瑞安、八组组长余仁寿、九组组长释明根、十组组长王有香、十一组

组长何慎勤。市佛教会成立时，位于曲江县境内的南华寺派来僧侣参加该会；仁化县丹霞山别传寺的释祥光等亦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

当时市佛教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会员捐献，规定会员每人每月捐献大米3斤，但照数捐献的人并不多，有的捐1斤，有的捐两斤，所以经费比较拮据。

1954年3月，粤北区开展佛教社团登记工作，韶关市佛教会经过登记、审查、整顿后，只有会员47人。

(二)

设在韶关市的天主教有较悠长的历史，早在130多年前，荷兰传教士利马窦就来韶传教。解放初期，韶关市有信天主教的家庭103户，教徒357人，成份大多是家庭妇女、农民、工人，其中有地主7人、富农10人，分布于机关、学校、街道和郊区农村。从职业上看，有在机关、学校工作人员55人、街道居民和工人135人、郊区农民107人。天主教在市区有房地产业多处，主要在民权路与闻韶北路，分别租给单位和个人使用，每月收租折合大米约750斤，另外在孝悌路还有天主堂一座，在河西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儿。

因河西育婴堂曾发生虐杀婴儿事件，1951年，韶关市召开群众控诉大会，揭露外国传教士的罪行，后经过政府调查，法庭审讯，将外国神职人员驱逐出境。这时，韶关市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只有中国籍的6人，包括两名神甫、两名修女、两民学员，由神甫夏学谦负责，住在市区闻韶路天主堂内，神职人员的生活费用靠房租收入维持。同年8月，韶关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参加的天主教徒计325人，主

任委员夏学谦、副主任委员杨汝营、常委黄开俊、邝耀东，委员有李自莲、胡美行等10人。

1951年2月，韶关市天主教建立“圣母军”支团，为首者是意大利传教士郭怡雅（同年被驱逐）任指导司铎，支团长是梁利文、副支团长是袁启力、张启滋、财务萧长芬、文书郭魁梧。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反动秘密组织，里面潜伏着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天津开展取缔天主教内“圣母军”的运动，于是韶关的圣母军分子亦非常不安，纷纷到政府进行登记，此后就很少活动。1953年11月，在全国取缔“圣母军”运动的推动下，韶关市也建立了取缔“圣母军”组织的工作委员会，并组成了由南华分局、粤北区党委，韶关市委派干部参加的工作队，开展了取缔“圣母军”的工作。

工作队首先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进行访问，对圣母军分子进行教育，宣传党的有关宗教政策，指出取缔“圣母军”并不是取缔天主教，并利用外地揭露出来的圣母军的反动罪行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圣母军”的反动性质，并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进行团结教育的工作，这样“取缔”工作得到了神职人员和大多数教徒的拥护和支持，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通过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工作队掌握了韶关市“圣母军”的基本情况，并于1954年1月正式展开了取缔天主教“圣母军”的工作。1月7日晚，工作队和公安干警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圣母军”支团文书、反革命分子郭魁梧，并加强了对该组织骨干分子的控制。1月8日，正式宣布取缔“圣母军”，并迅速展开登记退团工作。至9月，便彻底摧毁了在韶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圣母军”支团共18人（含骨干4人，一般团员14人），全部登记退团，另外还有

从外省外县来韶的“圣母军”成员4人，也进行了登记。

取缔“圣母军”后，为加强天主教的建设，决定成立韶关市天主教徒爱国会，并开展了筹备工作，于1954年11月2日晚召开全体天主教徒会议，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筹备会委员共13人，天主教神甫夏学谦当选为第二副主任委员。

(三)

韶关市的基督教有循道会、浸信会、信义会、安息会等4个教会组织，共有会员240余人，各教会有各自的组织和神职人员。

循道会在市区风度中路，有礼拜堂一座，负责人是蔡恩仲牧师，有教徒70人左右，除牧师外，还有一名传道员郑少珍。浸信会礼拜堂在风度中路，负责人有蔡日初牧师和潘启圣牧师，有教徒百余人。信义会礼拜堂设在薰风路，负责人是马达经牧师，教徒约有60余人。安息会礼拜堂在市区民生路，负责人是传道员郭宝光，有教徒10余人。

1951年8月，韶关市基督教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实行“自治、自传、自养”，断绝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拒绝外国教会的津贴，因韶关市基督教的产业较少，在实行“三自革新”后，教会经费均由会员捐助。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会址设在风度中路循道会礼拜堂内，4个教会的教徒都参加了该会，推举蔡恩仲为主任委员，马达经为副主任委员。

抗战时期粤北地区的统一战线

廖桂洲

我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党在粤北成功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一系列方针、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韶关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省省会，也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所在地，党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发生在韶关以及粤北地区。为此，本文就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做一简要概述。

一、积极发展进步力量

发展进步力量是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工作。党在粤北地区，首先是团结和组织了广大的青年学生。抗战期间，由于广州沦陷，有不少青年聚集粤北。这些青年多数是来自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青年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要求抗日或倾向进步，是我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中共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便使用“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成为“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①在发展和组织这些青年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时，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拼命拉拢这批青年，并撤销了原来采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这个组织，企图达到破坏我党抗日的目的。为了更好地掌握这批青年，我党又及时地更用“抗日青年同盟”的名义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使分散在清远、英德、翁源、曲江、南雄、连县、阳山等地的外地青年和当地的进步青年，团结在各地党组织的周围，建立了他们的组织。经过教育、考察和培养，使这批“抗日青年同盟”盟员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党和游击队。

其次，团结了国民党当中的爱国进步分子。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韶关领导广东省委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根据中央的指示，试图把广东建设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为此，张文彬正确地分析了国民党中央与余汉谋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团结国民党当中的爱国进步分子”^②的正确主张。抓住国民党第四战区余汉谋十二集团军需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机会，先后动员了800多名青年（内有中共党员120人）^③到该部政工队，还派出尚仲衣、叶兆南、石辟澜、黄新波、司马文森、郁风等一批党员骨干到余部上层机关工作，从中团结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后来发展为中共党员）^④、湛小岑、左恭、钟天心等进步分子，通过他们取得合法地位，以利我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南方局也十分重视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里，成立了先

后以左洪涛、刘田夫、孙慎为负责人的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⑤加强了党在敌人心脏中的领导工作，及时地了解 and 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为配合中共广东省委制定政策，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韶关，我党通过社会进步人士李章达出面，创办了《新华南》半月刊杂志，并以统战的面目出现，大量发表了关于团结抗战的文章，为促进团结抗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团结和帮助了爱国民主人士。抗战初期，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任医士训练班主任的陈汝棠先生，便是我党团结和帮助的统战人物之一。他原是孙中山大本营的少将军医。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主动向当时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尹林平提出，要求我党派人到医训班工作。于是，我党首先派李云去担任政治辅导员，随后还派去了宋绿伊、杨沙、大刘（花名）、李守纯、黄坚廉、等党员和一大批进步青年，随医训班分别到清远、连县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陈汝棠先生随广东省政府撤到韶关，此时撤销了医训班，成立了难民救济总队，陈汝棠改任总队长。陈在韶关任总队长期间，积极主动与我党联系，曾掩护过中共广东省委在他的住地黄望坝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⑥其后，国民党当局李汉魂对他产生怀疑，认为他是“亲共分子”，准备将他逮捕。北江特委接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他迅速撤离韶关，由黄焕秋负责撤退工作，把他转送到粤东五华县的安全地点，秘密保护起来，使国民党反动派无从下毒手。陈汝棠先生对此十分感动，到处宣传共产党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⑦

第四，团结和支持了当地的开明进步人士。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汕头市长、连县县长和清远县长的黄开山先生，是

清远、潯江、佛冈等地比较有影响的开明进步人士。他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新思潮，参与了反清的革命活动，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抗战期间，在政治上主张抗战，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党认真做他的工作，先后派徐青、王磊、谢永宽、陈枫等一批党员骨干到潯江地区，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工作，帮助和支持黄开山先生在潯江地区组织的“抗日自卫委员会”，^⑧后来又通过他的关系作掩护和利用他的名义，组织了潯江抗日自卫团队。在国民党掀起的两次反共高潮中，他支持我党粉碎了潯江地区的反共头子黄康平的破坏阴谋。1942年，当黄开山先生任清远县长时，我党又派黄化民、黎沃能、黄信明等到县政府各重要机关任职，从中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动态等许多重要情报，并得到大量预盖印章的空白信笺，使我党同志开展秘密活动时合法的证明作掩护。因而，我党的这些活动，都得到黄开山先生的默许和支持。潯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与黄开山先生和我党的真诚合作是分不开的。

二、努力争取中间力量

这里主要谈谈中共北江特委如何做好国民党第四战区（后改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⑨司令莫雄的统战工作。莫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接受过民主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是张发奎部的旅长，^⑩广州起义他守备观音山（即越秀山）时，有意让出退路给起义军撤离广州；十年内战时期，他在江西九江、德安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时，曾与我党有过联系，在蒋介石要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紧急关头时，他秘密地把围剿计划送

给共产党，^① 事后，他被蒋介石怀疑是通共分子而受到排斥，沦为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初期，他担任南雄县长、北江专员，同我党恢复联系，中共广东省委派古大存到莫的抗日统率委员会内当参谋长，^② 莫还主动找古大存说：“你们是需要情报的，现我组织谍报队，空了几个名额，请你们派人参加”。^③ 于是，地下党派了梁靖山、容兆麟等进去工作。后来又派了一批党员骨干打进去，建立起党组织，在里面起了核心作用。在此期间，通过党在里面的积极活动，争取了莫雄释放了一批关在南雄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40年1月，国民党第四战区在粤北设立了以莫雄为司令的挺进第二纵队（以下简称“挺二”）。中共北江特委分析了北江的形势和莫雄的历史状况，认为日寇必将再犯粤北，莫雄虽为国民党地方势力，他受命于国难之际，可又得不到重用，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派有不满情绪，他有爱国、抗日、进步的一面，是我党应该争取的中间力量。为此，北江特委派饶华到莫雄部任政训室主任，派邝达、巫大杰、林名勋、李学林、赖梅修等30多个党员进去，组织政治大队，并通过莫雄的关系，任命邝达为政治大队长。在莫部里，还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邝达、林名勋、招麦汉、李晓云等为领导成员。^④ 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先后更换何俊才、林名勋等为特支书记，派出黄漫江、肖松雪、杜国栋等60多名地下党员在里面工作，掌握和控制了各重要机关和部队。同时，还发展了朱小仲、王式培、张国青、黄桐华等为中共党员。

中共挺二特别支部建立后，北江特委对该支部提出了如下任务：一、做好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思想准备；二、做好北江各地抗日宣传工作，健全各种群众团体组织；三、做好上

层统战工作，尤其是对莫雄的工作，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四、团结改造莫雄的部队，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同时利用统战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

中共“挺二”特支根据中共北江特委布置的任务，主要围绕着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党的武装骨干，改造和掌握莫雄的队伍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做莫雄的统战工作中，我党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原则，既肯定和鼓励他和我党长期合作的大节的一面，又给他在关键时刻的动摇性指明方向，坚定他与我党合作的信心。通过工作，不断克服他的消极性，不断鼓励他的进步性。党在“挺二”的工作是绝对秘密的，先后派出邝达、朱小仲、林名勋等与他联系，送给他进步书刊和报纸，帮助他认清形势，坚定他和我党合作的信心，并从他处了解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与此同时，还争取了“挺二”副司令张伟周。张是英德泔洸的地方势力，我党利用工作关系，教育他的女儿张翠珍，通过她去做其父的工作。“挺二”大队长李韶光是莫的亲信，我党通过李学林与李的侄伯关系做他的工作，使张伟周和李韶光在政治上和莫雄在一起。这就有利于掩护设在泔洸的中共北江特委机关的工作，使特委机关从没发生过不良事件。我党还通过黄桐华副司令取得“挺二”谍报队的标志，发给英德、清远等地的党组织，为我党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许多方便，何俊才、涂锡鹏、谢永宽等就是以此作掩护来开展工作的。

在建党和改造“挺二”部队方面，中共“挺二”特支采取团结改造的步骤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建党方面除在基层发展党员外，还吸收了莫雄部的上层骨干、“挺二”副司令黄桐华入党。黄是政训室中校副主

任，思想进步，作风朴实，过去在十二集团军干训班任队长时接受过我党杨应彬的帮助，曾提出入党要求。黄在“挺二”工作期间，积极靠拢党组织，并坚决与政治上反动的政训室主任作斗争。特委通过一年多的认真考察，根据黄的政治表现和入党要求，经请示省委批准，吸收了他入党。黄入党后，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他的上层地位，对莫雄做了大量工作，黄又得到莫的充分信任，由政训室副主任逐步提升为副司令。“挺二”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和黄桐华在上层所起的作用，为推进北江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独立的武装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45年，日寇再度进犯粤北，大北江沿线各中小城市相继沦陷。国民党“挺二”也退入小北江的大湾圩驻扎。我党领导的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分别进驻黎洞、文洞、英东、翁源等地。这时，从整个形势看，北江特委认为组织武装直接与日寇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指示“挺二”特支把组织我党自己的武装作为中心任务。要求对莫雄这方面的统战关系，要十分讲究策略，要因时因地和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改造莫雄的第五中队时，特支抓住了莫要加强部队训练之机，派杜国栋、周辉、黄孟沾、叶圣焯进去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和正副指导员，通过整顿的办法，撤换和排除原来作风恶劣的干部，陆续派黄艺华、李佛安等党员骨干充实该中队的成分。有效地改造和控制了第五中队。在利用“挺二”第四大队、第九中队和特务第二中队的公开番号、组织由特委直接领导的武装时，事先未与莫雄打招呼，有意让它既成事实后，才告诉莫雄，使他默许。在清远沦陷后，第五中队与第九中队，配合西北支队在清远袭击日寇和伪大队长何秋这个问题上，事前估计莫不会同意，没有征求莫的意见，事后

才告诉他并把抓来的何秋送交给莫雄处理，造成事实，迫使莫不得不默认我党的行动是有利抗日救亡的。

在配备第四大队、第五、第九中队和特务第二中队的干部问题上，除了何俊才、陈仁畿、杜国栋、李学林是经过莫雄的同意外，其他干部均由特委配备，没有经过莫的同意，也不向“挺二”备案。还有，第五、第九中队公开党的领导关系和第四大队编入北江支队之事，事先都没有告诉莫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党在统战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斗争的策略性。

三、坚决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

抗战时期的粤北，各派政治力量高度集中，斗争环境比较复杂，必然会碰到顽固势力阻碍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开展，这就要求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击顽固派的破坏活动。

1939年秋，韶关基督教青年在进步人士李章达、张文彬的推动下，举办了一个时事讲座。这个讲座由张发奎的秘书左洪涛（共产党员）讲演，主要针对当时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秘密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文件而讲的。它阐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必要性、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抗战，违背孙总理遗训的种种劣迹，吁请各界爱国人士敦促国民党政府开放民主，实施宪政，保障民权，改善民生，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等方面的正确主张。但是，当时担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却暗中派《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混入

场内监听，随后就在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攻击左洪涛的讲话有危害“党国”之嫌，等等。为了打击丘誉等顽固派的阴谋破坏，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左洪涛，利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势力顽固派分子丘誉的矛盾，促使张发奎在其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上，训斥了丘的破坏行为，张说：“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横加诽谤，是何居心？”^⑩通过这一打击，使国民党顽固派威风扫地，逼使丘誉不得不离开第四战区政治部。

此外，驻龙颈的国民党清远县政府与国民党别动军暗中勾结，伙同清城的日伪军秘密联合，对我军抗日游击队大搞磨擦，对人民无恶不作，企图破坏和消灭我军的抗日游击队。针对这种情况，北江特委指示游击队给予坚决的打击，消灭了别动军一个中队和两个伪警中队。以上所列事例，是我党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也是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的一面。

注释：

- ①⑩左洪涛《张文彬同志四十周年祭》，见《羊城晚报》1984年8月27日。
- ②尹林平《纪念张文彬同志》，见《广东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 ③《张文彬同志传略》，见《广东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 ④潘允中《关于抗战时期〈北江日报〉出版情况》，见《韶

关文史资料》第四辑。

- ⑥《李云同志谈抗战时期的广东省委、北江特委情况》，见许来成访问记录1985年4月11日。
- ⑦⑨⑭⑮黄松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北江特委》，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
- ⑧梁尚任《抗战时期的黄开山先生》，见《韶关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7期。
- ⑩⑪⑫《古大存回忆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2辑。
- ⑬云广英、林名勋、莫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概况》，见《韶关市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3期。

对北江农军学校的姐妹校—— 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回忆

郑拔夫

（一） 引言

关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粤北农民运动的情况，我曾写过一篇《北江农军学校始末》的回忆录，发表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但因是事隔半个世纪的回忆了，虽还有好些资料的参阅和佐助，但难免仍存有不够准确和不全面的地方。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补充和订正。

下面，我再写一篇关于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回忆录。

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又称北江政治学校和马克思主义学校。她的创办，和北江农军学校的创办一样，对当年粤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扩大和深入，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她和北江农军学校堪称为一对姐妹校。

（二） 创办该校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从事的国民革命，原也是荆棘满途和坎坷曲折的。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具体帮助下，孙中山才又找到了新的出

路。1923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并于同年11月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李大钊等同志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接受了我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并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还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就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尤其有力地推动了我省的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25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之后，农会组织有如雨后春笋，遍布了全省的各县、区、乡。到1926年夏，全省90个县中，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共计有177个区农会、4216个乡农会，会员发展到62.4万多人，占当时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当时，各级农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及其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当时各地农会的自卫军和反动民团的冲突时有所闻。而反动地主民团收买流氓地痞，打入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去进行破坏活动的事例，也不断出现。因此，省农会为了加强对各地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整顿，即将全省划为7个区，除中路外，每区设一办事处，代表省农协指导该地区的农民运动。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就是当时的7处之一，设在韶关。所属曲江、乐昌、仁化、乳源、翁源、始兴、阳山、南雄、连县、连山、英德等共11个县。北江办事处主任由当时的省农协副主任委员长周其鉴同志兼任。当时，曲江、乐昌、南雄、仁化、英德等五县已建立了县农民协会。下共计

有10个区、211个乡的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也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每一村或乡均有一农军分队、小队或中队，每区则为一个大队，直接由县农协会的军事部指挥。农军还从各乡村的祠堂、庙宇的公款中提取部分经费，购置枪械弹药，还利用农闲之际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以加强战斗力。

1926年8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我省农民运动面临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有鉴于此，我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确定了要进一步整顿各级农会组织，提高会员的政治觉悟和加强团结，准备力量以对付反革命势力进攻的方针。并通过了整顿农民自卫军、整顿会务、举办农协农民特别训练班、加强团结和调查工作等11项决议案。大会还特别讨论了北江农民运动的情况，认为北江区的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全区11个县中只有曲江、乐昌、南雄、仁化、英德等5个县的农民和自卫军的组织比较健全，而其余的乳源、始兴、阳山、连县、翁源、连山6个县则由于缺乏骨干，尤其是军事干部的严重缺乏，情况很不理想，组织欠严密，战斗力不强。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周其鉴同志向大会提出了要在北江地区举办培养军事干部学校的建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周其鉴同志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许和支持。会后，周其鉴同志回到韶关，向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传达了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并在会上详细研究了创办定名为“北江农军学校”的具体事宜。同时决定了由朱云卿同志为该校主任（即校长）。其筹办过程和创办情况，因曾在回忆录《北江农军学校始末》一文提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当时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在一次专门会议上认为，北江农军学校由于受校址条件的限制，规模尚不够大，

培养的学员在数量上尚不能满足各地农会和自卫军对干部的实际需要。为了培养更多的农军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呈请中共广东区委和省农民协会的批准，在筹办北江农军学校的过程中，同时另行筹办一间“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又称为北江政治学校和马克思主义学校），作为当时北江农军学校的姐妹校。

（三） 办校的具体情况

在筹办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过程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陈嘉佑教导师正驻扎在韶关。该师的第三团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员掌握的，所以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筹办得到了他们大力的支持，从校址的选择到招生工作的进行都颇为妥当。于1926年11月中旬，继北江农军学校开学数日之后，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就正式宣告成立，首届招收了各县前来报考的工农学员124名，在韶关市北门原开明中学小学部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由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卓庆坚主持。会上介绍了讲习所主任林子光及聘请的教官李桃麟、甄博亚、郑大明（即郑拔夫）、侯凤池、朱云卿（以上均为北江特委委员）和教导师秘书刘小山（中共党员）。卓庆坚同志也兼任了讲习所的教官。在介绍时，台下学员热烈鼓掌，欢欣雀跃。参加开学典礼的还有韶关市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以及北江农军学校的全体教官（部分教官同时兼任讲习所教官）和学员代表。农军学校的学员代表还在会上致了贺词，共勉要努力刻苦学习成材，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奋斗终身。会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可谓热闹非凡。

该所培养学员的目标是：

- (一) 提高学员对农运重要性的认识；
- (二) 增强学员从事农运的决心和信心；
- (三) 能正确掌握开展农运的政策和方法；
- (四) 使之成为农民自卫军中熟悉军事知识的政治干事。

由此可见，讲习所的培养目标和当时北江农军学校的培养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农军学校侧重培养的是要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军事干部；而讲习所则侧重培养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政治干部。所以军校毕业后的学员，大多数派到各级农军去担任分队长或小队长，而农讲所毕业后的学员则大多数派到各级农军去担任分队或小队的政治指导员。

讲习所选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参照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方案来编定的。计有：《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工农联盟》、《农会须知》、《国民革命与农民组织法》以及军事课程《步兵操典摘要》和《野外勤务》等。时事课每周有一至二次，内容均是根据《响导》、《中国青年》、《犁头周报》和《人民周刊》等报刊和杂志来讲授的。在教学工作中，特别注重理论上与实践的联系。每天除政治课外，野外操练活动每周安排有4小时，而且经常组织学员和北江农校的学员一起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参加“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北伐胜利庆祝大会”、“工农联欢会”和“禁赌花会”游行等。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教官们还辅导学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用唱山歌和街头活报剧等文艺形式和散发传单等办法来

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组织起来建立农民自卫军的重要性，宣传进行“二五减息”是合理的等等。此外，还规定学员在节日和假日，必须到市郊农村或自己家乡去进行农村调查，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和组织农会等工作。当时近郊的黄岗、芙蓉山、莲花山、山子背一带的乡村所成立的农会（有的叫犁头会）和农民自卫军，均曾得力于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和北江农军学校学员的帮助。

记得1927年元旦，农军学校和讲习所的学员们组成了许多宣传队上街和到近郊各处去开展宣传活动，敲锣打鼓，唱春牛、跳纸马、化装讲演、散发革命传单，宣传革命道理。有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一张传单，上面这样写着：

亲爱的诸位叔伯兄弟姐妹同胞们：我们农军学校是为着我们耕田佬来谋幸福的先锋队，谋解除痛苦的大本营，砌磋琢磨有二月多了，现在趁此新年良机学校放假之际，我们同学特分头组织宣传队，来和诸位亲爱的同胞畅谈讨论，请诸位不要客气指教一下吧！因为我们统统都是穷人，到现在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来解除压迫呢？方能得到安安乐乐不致受人凌辱而过生活呢？现在诸位同胞来听我们讲演啦！快来吧！有好东西听！我们恭喜诸位同胞年禧！同时请诸位同胞听春梅报喜之音吧！！

北江农军学校宣传队

这张保存下来的传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军校姐妹校的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当年进行宣传活动的情况。这些活动的开展，在教育工农，团结劳动大众，鼓动革命热情，制造革命舆论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影响所及，岂只粤北地区耶！？

讲习所的学员和北江农军学校的学员一样，都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真可说得上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讲习所有严格的编制，设两个大队，7个中队，21个小队。日常实行“三操两讲制”，每周还安排一次党、团活动。讲习所还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学员必须严格执行。如请假和销假制度、查铺查哨制度、早晚点名制度、课堂纪律常规、外出纪律常规、群众纪律常规、礼饰常规、风纪要求等等。对这些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以小队为单位，每天向所属中队报告一次；以中队为单位每两天向所属大队报告一次；以大队为单位每三天向值日官或讲习所主任报告一次。学校则定期于每周进行一次总结，表扬好人好事，对不良现象则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进行个别的谈心、说理教育。

学员的生活费用，基本上由所在各乡的农会供给。学员入学后，由学校一律发给一套蓝色制服，还有衣帽、绑腿、草鞋、风纪皮带、学习用品和供给军事训练用的枪枝装备等（这些枪枝装备则基本上是从陈嘉佑教导师那里借助来的）。

当时讲习所还注意到在学员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那时学员中靠近党组织，要求参党的人为数不少。教官曾从优秀学员中物色培养对象，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参党，也是要履行严格的组织手续的；首先要由本人提出申请，让组织严格审查，并由两个党员（一般是教官）作介绍人，自己填表，党组织开会通过，报往中共北江特委审批后，才算有了正式的组织关系。之后，还得进行宣誓仪式。宣誓大会只有党员参加，一般是不邀请非党的学员参加的。以后便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也要交纳党费（自然是数目不拘，甚至交一个铜板就行了）。党组织活动的内容，大多是学习上

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研究讨论如何在学员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检讨学习、生活、思想上不足之处，互相帮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发展党员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第一期学员在校学习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但毕业时，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员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具体的数字已无法记忆和查考，估计为三、四十人左右）。这是一支很宝贵的革命力量。记得对第一期毕业生的分配，均由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统一安排，党员的学员大多分配到各县，区级的农会或农民自卫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员，其他非党学员则大多分配到各区、乡的农会或农民自卫军当政治指导员。他们在各级农会和自卫军中，运用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和革命道理，对各地农民自卫军进行整顿和训练，从而，加强了农民自卫军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战斗力，使各地的土豪劣绅均为之侧目，沉重地打击了他们欺压农民和对农会进行捣乱、破坏的嚣张气焰，大大地促进了粤北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如在1927年3月间，曲江龙归的地主民团反动武装袭击龙归农会，打死了农会会员23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龙归血案”，在中共北江特委和农协北江办事处的领导下，讲习所和军校第一期的曲江籍毕业生和第二期的全体学员，配合曲江县农民自卫军一举歼灭了龙归的地主反动武装，大长了革命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由于讲习所和农军学校的毕业生在现实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深得各级农会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所以在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后不久，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又紧接着举办了第二期。并要求尽量挖掘潜力，使招收的学员

人数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故第二期讲习所招收的学员人数和军校一样，均较第一期为多：军校招收160多人（第一期只有97人），讲习所招收了约200人（第一期为124人）。均在1927年3月中下旬间先后在各自的原校址开学。讲习所这期的编制是将全校学员分为3个大队，9个中队，27个小队（即三三制）。教学内容和各种规章制度与第一期大致相同，但这期学员在韶关只学习了一个多月，即因当时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校址便与农军学校一样迁至南雄。当时由于部分兼任教官的北江特委委员需留韶工作，不能分身随校工作，因而师资力量受到了限制。这一校一所便在朱云卿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合而为一，建制从此就不分彼此了。仍继续进行着以革命理论和加强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活动。

（四）北上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1927年春末夏始，国内的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取得了大资产阶级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一方面通过戴季陶、宋子文、吴稚晖等人的穿针引线，分别和日、英、法等帝国主义作了大量卑鄙、肮脏的政治交易，这些帝国主义便成为了蒋氏的靠山；另一方面，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这些交易所的老板和青红帮的头头又愿意为蒋氏出钱出力，于是，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地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继而广州的李济深又筹划了“四·一五”清党反共运动。使省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大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遭到了疯狂的搜捕和惨杀。革命的精英陈延年，肖楚女、罗亦

农、刘尔崧等就是在这期间先后被杀害的。

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猖獗，是如此之快地从上海蔓延到广州，又从广州迅速地蔓延到全省各地，粤北农民运动和全省各地的农运一样，顿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处于空前的严重危机之中。在这充满白色恐怖，反动派张牙舞爪的紧迫情势下，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其鉴同志风尘扑扑地赶到韶关，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要中共北江特委立即行动，集中北江所属各县的农军北上武汉，实行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北江特委一连三天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分析了自“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坚决拥护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详细讨论了北上的具体办法。会后，以省农协北江办事处的名义通知所属各县，迅速将农军集中韶关。当时，分布在北江各县的军校和讲习所第一期的毕业生接到命令后，积极地进行了各项集中的准备和组织工作。驻扎在南雄的第二期军校和讲习所的学员，在朱云卿和林子光同志的领导下，也在加紧准备，整装待发。

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的罪行，早已激起了北江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县群众纷纷要求惩办那些追随反动派的贪官污吏，尤以英德人民的要求最为强烈。为此，中共北江特委决定，在农军集中出师之前，给英德反动势力进行一次致命性的打击。4月下旬，以讲习所和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的各地农军，大量集结到英德附城，由刘裕光同志率领，在甄博亚同志带领下的粤汉铁路工人的全力配合之下，一举攻下了英德县府，解放了英德县城，成立了英德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全县工农群众大

会，枪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官僚黄流沅等多人。攻打英德这一仗，打得真是痛快淋漓，声威赫赫。这是“四·一五”事变后粤北地区用革命武装打击反革命武装的一曲凯歌，在广东早期的农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德战斗的胜利，打响了北上的第一枪。以北江农军学校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的北江各县农军先后云集于韶关。而且，清远方面的农民自卫军大队也开到韶关来了。4月底，1200多名农民自卫军在韶关市宝灵寺召开了北上誓师大会。会场上，刀枪闪闪，铁拳如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如雷滚。会上正式宣布广东北上农民自卫军北上总指挥部成立，由周其鉴任副总指挥，朱云卿任参谋长、王承烈、李贺等北江特委委员参加了参谋部的工作。共编成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侯凤池，指导员卓庆坚；第二大队队长叶文龙，指导员卢克文；第三大队队长甄博亚，指导员林子光（其中一个中队是由粤汉铁路工人组成，后林子光同志调回韶关工作）。每1大队下设3个中队，9个小队，共组成21个小队。农军学校和政治讲习所的学员大部分都担任了各中队、小队或政治指导员。有些还担任了大队部的副官。此外，北上农军总指挥部还设有医疗队、救护队和担架队等组织。医疗队长由郑大明负责，救护队长由廖文楷负责，担架队长由蔡召平负责。这样，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武装，便在那革命危机的紧急关头，光荣地诞生了。

当北江农军总指挥部成立时，二军陈嘉佑教导师根据谭延闿的命令已撤离韶关，经湖南前往武汉。考虑到农军北上的武器经费有一定的困难，有些同志曾提出要把韶关各商家

的枪枝弹药全部收缴，来充实农军的战斗实力。当时，中共北江特委曾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认为这样做势必会助长土匪实力，使当地农民的正常买卖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因而未予采纳这种做法。后来，由北上总指挥部出面，召集了曲江县、商会会长及有关人士开了一个协商会议，用又斗争又联合的方法，提出了农军的困难。结果，县府和商会交出了部分质量较好的枪枝、弹药和数千元经费，加上农协原有的物质准备，基本上解决了困难。1927年5月1日，广东北江农军斗志昂扬，举旗北上。徒步行军经乐昌九峰跨入湖南。于5月中旬抵达湖南的郴州，与由朱云卿同志率领的第二期农军学校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学员胜利会师，受到了湖南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继续北上，途中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农军先头部队在衡阳一带受到阻击，不能前进。当时农军群情激昂，磨拳擦掌，纷纷要求战斗。但中共北江特委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避免与反动派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作残酷的正面冲突。于是，指挥部便率领农军，包括讲习所和农军学校的全体学员撤回到靠近湘粤边境的永兴、资兴一带，进行休整、训练和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在永兴休整期间，又得悉了粤北仁化的反动官僚和土豪劣绅竟疯狂地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消息，农军战士个个怒火中烧，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严惩反动派。指挥部经过研究，同意了仁化、曲江、乐昌的部分农军（包括这些县的部分军校和讲习所的第一期毕业生和第二期的学员）回师北江。他们在永兴鲤鱼塘与地主武装进行了一次战斗之后，火速开往仁化，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攻下了仁化县城，活捉并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县长和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后来，这

部分农军胜利返回永兴时，主力部队已经出发北上了。他们便留在粤北坚持斗争。

北江农军的北上意志坚如钢铁，但北上途中又必然会遭遇到敌人一次次的截击而造成伤亡，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办呢？上级党组织十分关心这支农民武装的险恶处境，便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与武汉政府上层人士取得联系，同意北江农军以二军陈嘉佑教导师补充团的名义通过湖南，前往武汉。为此，党中央曾派出联络员来到永兴农军指挥部传达了这一指示。于是，指挥部便暂时收起了“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的大旗，于端午节后由永兴出发到株州乘火车经长沙到达武汉。在北上途中，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和北江农军学校二期学员的建制，在朱云卿同志的率领下，终未打乱，在北江农军中起了骨干和先锋的作用。

北江农军是在1927年6月15日抵达武昌的。在武昌期间，先后驻扎在武昌徐家棚和马场，受到了武汉工人和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各革命群众团体不断送来水果、饼干、纸扇等慰问品。何香凝先生也曾来营地慰问。

1927年6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公然发出反共训令。之后，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举行了分共会议，并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甚至公然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口号。很明显，此时的情势已从宁汉对立变成宁汉合作，从蒋汪分庭抗礼而变为蒋汪合流，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当时，陈嘉佑亦已卷入反动的逆流，并被擢升为第十三军军长了。他提出要将我全体农军正式收编为第十三军的一个团，妄图达到扩充其反动势力，破坏革命的目的。我农军在北江特委的领导下，

洞悉其阴谋，拒绝为之收编。此时，正好接到党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带来的指示：迅速脱离十三军，撤离武汉，开往南昌待命。于是，在中共北江特委和北江农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地与陈嘉佑的压迫利诱进行了坚决而机智的斗争。最后，成功地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7月底开赴九江，转乘火车到达了江西南昌。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北江农军在中共北江特委和总指挥部的具体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由贺龙、叶挺同志亲自下达的作战任务：担任新营房驻区的防御并配合二十四师教导团全歼了新营房的敌军。起义部队胜利占领南昌之后，由当时任中共前敌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整编。北江农军被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军长的二十军第三师六团。自此，以北江农军学校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学员为骨干的北江农民自卫军的编制才打散了。之后，参加了激烈的会昌战役，全歼了钱大钧的4个团。还参加了整个南征的战斗历程，由瑞金出发，绕道福建向广东潮汕进军。复再步行到揭阳、丰顺的汤坑，与薛岳部激战了3日3夜。流沙镇一战之后，北江农军的部分同志随同主力部队迂回北上，参加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成为了革命的铁拳头；另一部分同志则根据革命的需要，由党组织统一安排，回到自己的家乡，转入地下斗争，成为了革命的火种。

（五）结束语

笔者早年投身革命，早在1925年在广州医药专门学校就读期间，得柯辉萼（即柯麟）、蔡松如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年，经党组织的推荐，参加了广东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不久，经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到韶关中共北江特委会工作，并和卓庆坚、侯凤池、朱云卿、李桃麟等同志为中共北江特委委员。北江农军学校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创办之后，我同时兼任了这一校一所的教官工作。因之，有幸能和这些同志一起经历了一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接受了光荣的战斗洗礼。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虽然又经历了长长的一段坎坷曲折的人生旅途，但不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形式下，我一直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赖，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今天，我支撑着多病之躯，打起精神，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对我党所领导的早年粤北农民运动的歌颂，同时，也作为对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志的纪念。

原仲元中学蒙难记

邵明耀

在韶关沦陷前一天下午三时许，仲元中学校长梁镜尧来曲江学生救济会（附设于青年会内）找我，当时我是该会的执行干事。据他说仲元中学尚有百多名学生无法疏散，又无家可归，当时省府已疏散到东江而学校经费已断绝，难以维持，希望学生救济会能设法援助。经过研究，学救会即拨关金三千元（约数，确数已忘）给仲元中学作为撤退资金。当时关金币值尚高，比金元券银元券法币都高得多，梁校长非常高兴。临走时我对他说，仲元中学地近曲江桥，为北侵日寇必经之路。我建议他们迁往东河坝一间祠堂（即剧宣七队原址）暂避，如日军进犯，可和我们一起撤往枫湾（青年会原定撤退点），但梁校长认为形势并不太紧张，拟于第二天早上撤到东河坝。

当晚，为慎重起见，梁校长亲自率领他的儿子梁元博及个别学生持枪守夜，后据他妹妹梁秋荷老师告诉我说，当晚深夜有一队兵士经过仲元中学，黑暗中分不清是日军抑或是国民党军队，喝口令他们也不回答，梁校长怕误伤国民党军队，不敢开枪。不料，日军越过守卫点后返身攻击，一枪命中梁校长头部，梁校长即时牺牲，其子梁元博被刺刀刺中脊骨，下身瘫痪。日军随即包围学校将全校师生囚禁于一个课室内，并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为他们挑运弹药至曲江

桥头，拂晓时开始进攻韶关。仲元中学师生见四周没有日军防守，遂破窗逃出，抬了伤员经大塘到枫湾。当时我亦带领青年会个别留守人员、女青年会全体工作人员、培联中学10多个疏散来韶关避居青年会的学生，及教会部分教牧人员，在日军进犯前一小时得警察局通知亦于黑夜越过铁路向大塘及枫湾撤退，并在枫湾开设难民营及救济工作，时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汝庄亦率领师生避入枫湾，我们即邀请他们协助医疗工作，仲元中学受伤师生受到医疗、照顾及安顿。消息传到沦陷区，闻风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小镇被充塞得拥挤不堪，粮食亦供应不上，经当地人士建议及指点，开辟了一条难民疏散线由枫湾经小坑、华屋、隘子、坝子、陂头、连平以后又延伸至老隆及兴宁，一度还深入到乐昌，仁化，这条难民疏散线长达三四百里。仲元中学的师生亦经协助安全沿路撤往东江。

抗战胜利后，仲元中学迁往番禺市桥。梁秋荷老师后任广州市二中校长，梁元博同志下肢瘫痪，但身残志坚，自学了几国文字，钻研地质学，深入研究中国地质学专家李四光板块漂移学说，现在广州南海海洋研究所任研究员。解放后梁镜尧校长被追认为烈士。

我参与“枫连线”工作的片断

谢琼孙

“枫连线”是日寇沦陷韶关前夕，青年会在曲江枫湾至连平沿路设办的疏散救济线路的简称。当时此项工作办得很好，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道。美国史学教授赖雪丽女士至今对此仍感兴趣，拟所得资料写成专文，乃一再向原青年会干事进行了解。去年7月赖教授来华，找我谈了两个上午，今年7月再度来华，由邵明耀陪同，专程前往枫湾，寻访昔日枫湾救济点并摄影。她们由韶关返广州后，又再与我谈及昔日“枫连线”的事情。

1944年春，湖南衡阳失陷，韶关告急。当时岭南大学校长来到青年会，提出要找一個适宜地方，以备将来疏散。青年会董事潘允和医生是枫湾人，我和青年会的李应林、骆爱华、邓锦辉、杨逸梅等前往枫湾旅行、考察地方，结果发现枫湾地区有山、有水、有岩洞、有市场、乡村，往东江则有路可通，很具备设点条件，宜于开展疏散工作。8个月后，日寇果然犯韶，枫湾遂成为“枫连线”上开设疏散救济工作的第一站。

1945年1月，我在梅县筹设青年会，在举行成立大会之际，闻得日寇进犯韶关，于是我立即起程回韶。那时韶关市面紧张，人们纷纷准备疏散。1月16日，青年会王以敦等疏散至水村，我也打发家人执拾东西随王一同疏散。我安顿好

家人后，次晨再返韶关。此时韶关情况越来越紧，青年会亦忙于准备疏散。我回到家里，看到家杂七零八乱，不禁为之伤感，日寇带来灾难，使我第三次失掉了家。

1月18日下午，骆爱华匆匆告知我，有东西要即时运走，原来是疏散救济用的四箱钞票和四箱药物。骆叫我交给王以敦再作处理。我乃邀同司徒贤、卢良驹上路往东河坝的孤儿院取此八箱东西，我们立即雇请挑伕把东西运走。边走边留心，急步行至大塘时已是夜晚，我们来到一茶楼，把东西抬进去，品字形堆放，然后用茶楼的大园台面盖住，人则坐在园台面上，以减少人们的注意。吃饭后，我们嘱咐挑伕不要远离，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起程赶路。晚上9时左右，马坝方面火光冲天，炮声隆隆，韶关危在旦夕。我们受到战火威胁，不待天亮便深夜起程。这时天又黑，路又烂，几经艰辛才到达水村，其时天还未亮。我们拍开了王以敦的门，把东西原封交给他，说明内容。随即与王商量决定：由我带备款项前往枫湾，看看情况，可能时即进行救济工作。经此决定，我们先后救济了约4万人次，让他们疏散到东江去。

话说回来，当时我们一夜未睡，吃过饭后稍事休息就带备款、粮赶往枫湾。只见那里已人山人海。我们立即找着熟人，到祠堂借用大锅，进行施粥，从而打响了“枫连线”疏散救济工作的第一炮。人们感到意外，怎么青年会这么快就在这里施粥了？当晚，我们在乡公所开会，决定明日继续施粥；一面推举马敬全、陈瑞勃等物色场所，筹设难民营，并推举原香港文员何家骏协助账务工作。

次日，走难的人们越来越多。除一般居民外，还有不少是学生和机关人员。当晚开会，马敬全汇报，已找得6处地方可作难民营，能容几百人。乃立即决定，明日上午布置设

营，下午3时接收难民进营，具体事情仍由马等负责办理。营内设营管组、办理场所管理、难民进出、领取饭菜等；设膳食组，由陈广廉等办理采购、煮食、供应各项；还设有办事处，由青年会人员办理文告、登记、发证、统计及记帐等。

当晚深夜，青年会最后办理疏散的有几百人，是由邵明耀、邓锦辉率领跑来枫湾。他们除青年会人员外，还有会友、教友、学生，街坊及循道会人员，岭南医学院的员生等。到枫湾后，他们被安置到乡公所，上到楼上的，人是重重叠叠，在楼下的、无插足之地。进不了乡公所的，就在横街窄巷歇脚、卧地。其时我在楼上躺地，受到两层人的重压，其滋味从未尝试过。据邵等说，他们起程时，已微闻南边响起枪声。

1月20日，日寇窜入韶关，也是枫湾难民营最忙碌的一天。昨晚疏散来的人许多自动参加工作，他们忘掉自己也是在走难之中。下午，我们看到疏散而来的人井井有条地进入难民营，使我联想到抗战以来，人们逃难总是仓皇逼迫，紊乱到好象“倒泻一箩蟹”，而今次秩序井然，不禁感到安慰。

次日，韶关南郊的仲元中学在日军进城时有几个学生受了伤，抬来枫湾救治。是时枫湾营设有医疗组，由岭南医学院员生担任，为难民、村民赠医赠药。至此，枫湾营的组织大体完备，由我暂任主管。

那时，粤北大雪，群山皆白。我本人日夜穿着棉袄，用干粮袋装着银钞，藏在身里，晚间和衣而睡，躺在乡公所的楼板上，无被无席，用砖头作枕头。晨起，拨开水面冰块，才得湿润毛巾洗脸。如是这般过了一段时间。

枫湾营开办7天后，王以敦召集众人到水村开会，商议两事：一是成立委员会，推举潘允和、胡夫人、马汝庄、许彼得、赵韶光及王以敦、谢琼孙为委员，由潘任主席；二是把救济工作推进到连平。

过了10天，邓锦辉根据委员会的议定，组织了10多人，进行冒雪开站。同行的除枫湾营食宿两组的负责人外还有涂祖庆、卢世农、邹显基、梅刚毅等一班青年。由曲江小坑起，每隔几十华里设一站。他们一面向当地人借用地方设站，安排人员工作，一面继续前进，再设营站。如是者，一站又一站地直达连平县城。

全线营站分布如次：

- 一、曲江：大塘通讯站、枫湾难民营、水村家属住所、小坑难民站。
- 二、始兴：茶树山茶水站、华屋难民营、“枫连线”办事处、家属住所、团体住所、隘子茶水站、坝子难民站。
- 三、翁源：龙仙茶水站、陂头难民站。
- 四、连平：忠信茶水站、连平难民营。

以上难民营站皆有食有住，难民站是人们过往性质，难民营则可以停留。根据营站的设置，“枫连线”是以枫湾为起点，连平为终点，始兴华屋为中心区及设立办事处。

上面提到的，在邓锦辉等出发开站不久，邵明耀由水村迁至华屋，得当地华振中夫人协助，借得粮食房屋为华屋难民营扩充营地。不久，青年会人员逐渐集中华屋，其时我的家人也从水村迁来华屋，华屋人口骤然增加了，一时成为旺市。

邓完成了组织营站工作之后，回返枫湾组织疏散队，每队为50人，额满再组别队，每队设领队、副领队、服务员、卫生员各一人，这些人均在疏散的人中推举，或由办事处推举。行走时领队行前面，副领队行后面，服务员卫生员两头巡视，帮助有困难的和生病的。每队发给些零用钱，由领队保管，药物则发给卫生员管理。队伍组织好后，由营部把名单交到办事处，给每人办理和发给《枫湾营难民证》，以便到别站时有所接待。（光复后，广州市发放救济品时，还可凭证领取）各队事情办妥后，在出发前先开个会，向难民们讲清楚情况，劝勉他们在路上要谨守秩序、互相关照。如是的一队一队前往东江，先后办了20多队。难民中，不一定是从枫湾营始，在中途各营站上参加的大不乏人。

我在枫湾时，常返水村同王以敦洽谈会务，日行路程30多里，曾多次行至半途引发胸部作痛，很艰难地步行至水村。潘医生也曾为我治疗。事后我到了兴字，经邝磐石老医生为我检查，说是“肋间神经痛”。

在枫湾时，曾接到大塘站讯息，说有日兵来犯枫湾。我们迅即转告各营站难民及街上群众入山躲避。我身上所带的公款，也匆匆忙忙地分给一些熟人分别保管，以防万一。日兵退后，各人无恙，分散保管的钱也没有散失。

4个月后，我们几位主要干事王以敦、我、邵明耀、邓锦辉等，集中连平讨论工作。大家表示工作得很愉快，对难民“安顿得所、疏散有着”的工作目标能够达到而感到高兴；对沿途村民借出地方，特别是潘允和、华屋夫人、以及枫湾的梁乡长的大力赞助，对各难民营站参与义务工作的不下300人，他们忘却自己是在走难中而能热情支持服务，我们非常感激。在连平，我执笔写了工作报告，题头写着“青年

会枫连线疏散救济……”等字，初次提出“枫连线”三字，本是作内部工作的简称，但不胫而走地迅即传到各营站。以后，口头上、文字上人们都以“枫连线”来提及全线营站的疏散救济工作，“枫连线”名字远近传开了。奇怪的是，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拿“枫连线”来谈的也不少，不过，这是后话了。

1945年端午节前夕，日寇窜犯连平，我与邓锦辉走到兴宁。在那里，李应林校长曾托我们带款到华屋以接济滞留华屋的“岭大”员生。其时循道会亦由冯研惠来兴宁领款返华屋，于是大家会同前往。

7月，青年会全体人员集中到兴宁办事处工作，“枫连线”上的工作则由前干事李坚华主持。从韶关沦陷至日寇投降，“枫连线”办了7个多月，全线所用经费，除由骆放下的之外，邵明耀所经办的学生救济余款，亦为“枫连线”所用。尾期的用款，则做计划，向设在兴宁的“广东国际救济会”处请领。

青年会在抗战时所开办的这项救济事业，是在烽火年月中临时办起来的，从前未曾搞过，也没有计划过要开设“枫连线”；就于骆爱华放下钞票时，我和青年会的其他干事、人员也都不曾想到要搞这项工作。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它奇迹般地产生，又奇迹般地发展，我们为能在抗战中为民众作出奉献而感到高兴和荣幸。

韶关沦陷后的“枫连救济线”

邵明耀

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广东境内的难民救济工作规模最大的要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搞的枫连线。

“幸得枫连线，来把灾黎救，入得难民营，食住两无忧。”这是难民感谢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办的“枫连线”而赠的诗。所谓“枫连线”就是在韶关沦陷时广州基督教青年会，见到大批难民逃到附近枫湾，生活无着，就派谢琼孙携关金20万元前往枫湾办理救济工作。他一到枫湾就动员青年会友傅伟和一些学生，借用当地祠堂及大锅等炊具进行施粥救济。不久，刚从乐昌办理学生疏散救济回韶关的干事邵明耀（曲江学生救济委员会执行干事）亦带领青年会最后留守韶关的部分职工，同女青年会干职人员一起到达枫湾，并立即投入枫湾的救济活动。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他们一面扩大施粥范围，一面筹设难民营，3天之内就设立了6处难民宿舍，收容了五六百人。他们还在疏散的岭南医学院师生的协助下办起了医疗站，替被日军打伤、或生病的人治疗。例如位于韶关郊区的仲元中学的师生，因抗击日军，校长梁镜尧英勇牺牲，幼子梁元博脊柱被日军刺伤，学生也有数人受伤。当他们撤到枫湾时就得到医疗和安顿。消息传到沦陷区，闻风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小镇被充塞得拥挤不堪，最成问题的还是粮食供应不上。为了及时疏通，他们在水村召开了一个紧

急会议，由广州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青年会战时救济会及曲江学生救济会联合组织了一个领导救济工作委员会。青年会董事潘允和医生被推选为主席。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有总干事王以敦、副总干事兼枫湾总营主任谢琮孙及华屋总办事处主任邵明耀、总督导邓锦辉，督导张广焜，后期枫连线主任李圣华。委员除核心小组成员外还有岭南医院院长马汝庄，广州女青年会会长胡黄玉贞，青年会会友许彼德等。机构成立后，他们就开展枫连线疏散救济工作，将滞留在枫湾的大批难民疏送到安全地区，并解决他们的食宿及生活问题。后又开辟了一条由枫湾经小坑、华屋、隘子、坝子、陂头到连平的疏散线。这条疏散线长达300多华里，横跨曲江、始兴、翁源、连平四县（以后还伸延到老隆及兴宁，一度还深入到乐昌、仁化）。沿途定点设站，工作异常艰难。当时正遇上百年罕见的大雪，群山皆白，全线又没有大路，开山劈路历尽艰辛，但他们还是在半月以内就完成了沿途定点设茶水站、施粥站、难民营及医疗站的工作。6个月内共组织疏散队80多队计4000多人。各站收留的难民数累计达50000余人，还治愈了沿线患疟疾的村民约400至500人，群众对此十分感激。

当时战区司令余汉谋，不战而退弃城逃往江西省的寻邬。省府迁往东江平远，蕉岭一带，省银行则迁往兴宁梅县一带，置难民及他们的家属于不顾。当时没有一间难民救济收容所，而枫连线的难民营，广布于曲江、始兴、翁源、连平四县是当时唯一救济难民的服务机构，抗日胜利后得到省市的嘉奖，并委托全权办理广州紧急救济工作。

一个居台同胞在抗日前后的爱国事迹

谢琼孙

我在澳洲定居时，常到悉尼唐人街图书馆浏览、会客。有一天，我看到一本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内刊有《六指童军忆当年》一文，引起我的兴趣，便继续看下去。果然，文里所指，就是我的旧同事邓锦辉先生。

文章的开端，有一段很简单的报道，大概意思是：1953年9月间（注：这时间是大约之记），中华童军总会会长蒋介石召开颁奖大会，以最高荣誉奖章，颁给对童军教育事业有特殊贡献者。当时会长蒋介石未有出席，而由副会长何应钦主持大会。领奖的仅邓锦辉先生一人。仪式简单、隆重。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邓锦辉先生受记者采访，由记者笔录的。它只记录了邓锦辉的战地随军生活，而对他在抗日前后的爱国事迹，却没什么提及。我认为邓锦辉在抗日期间的爱国事迹，确有值得一记之处，因而引发我写出如下这篇史文。

世代华侨 热爱童军

邓锦辉先生，广东开平人，约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家世代华侨，久居海外。他的祖母是加拿大人，外祖母是菲律宾人。因血统关系，邓锦辉的相貌很像外国人。

邓锦辉八岁时，随父邓福回国。父在广州一德西路开设太昌行，出售天那水。邓本人，初在东山培正小学读书，看到同学穿起童军制服，觉得很威武，便要父亲也做一套给他。在学校里，当听到讲童军故事，他很是留意。其后，他加入了培正“少年童军”。

初中时期，邓锦辉转入青年会中学就读，做了童军班长。对于童军的“智、仁、勇”信条，逐步有所认识。广东童军总部设在青年会童子部会所，由广州英文时报主笔黄宪主持。总部常常召集分支团部，前来青年会大操场集训。“青中”与童子部毗连，课外活动在大操场进行。而童子部老城区的少年养成团，亦常在大操场活动。相互之下，邓锦辉耳闻目睹，接受教育的环境广阔，加上，青年会那“乃役于人”的社会事业活动，分散在会内各部进行，邓锦辉常有参加。再加上，他具有华侨家庭的好传统，胸襟开豁。故在上述种种原因之下，邓锦辉逐渐形成坚贞的爱国观念、服务观念，养成勇毅果敢的秉性。其所以能领受最高荣誉的奖赏，这并非偶然。

步行全国 艰苦磨炼

约在1929年间，邓锦辉邀同“青中”童军同学邓国鏞、林天佑，一共三人，以童军名义，打算作步行全国之举。行前不动声色，学校和家人皆不知其去向。一个多月后抵达福州，才写信回来，告知要步行全国。他们一行，沿着沿海地区进发。所到之处，便将所见所闻笔录下来，并请当地邮局盖戳，以资证明。他们在路上投宿时，住学校的宿舍、教堂或社团。间中或有饭食招待。他们拿着自己的证件，要求有

关部门予以接洽，很是顺利。报馆的记者还向他们采访并报道有关他们的消息。群众见他们来了，就高兴地欢迎。他们一站一站地步行，不怕疲劳，爬山涉水，每到一站稍事休息，然后，又以下一站为目的地，继续步行前进。

到了长江江岸逗留时间较多。他们先后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各处。在上海，得广东同乡会欢迎，给予响导及资助。到南京时拜谒了中山陵。渡江以后，沿津浦路北进。无论到什么地方，能步行则步行。抵达山东曲阜，瞻仰了中华文化圣贤孔子的孔氏宗庙。到北平（京），参观故宫文物，游览长城。他们沿途得到学校或文化团体的接待或开会欢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请他们在入东北时，顺道调查东北农村的情况。

他们到达北平之后，其他两个同学退伍了，独邓锦辉坚持到底，继续步行。进入东北，他走的路程，最为艰苦。天气冷，大山多，又独自一人。但邓锦辉并不气馁，继续朝着北方进发。在东北这段路上，他别有一番感受：“东北同胞对我既陌生、又亲热，而又惊诧地思索着，为何会有祖国南疆的少年从老远地方独自跑来？我的行动，感动了东北同胞，从而给我以温暖，使我既感受到愉快又增添了勇气”。邓锦辉当年的话，我还是记得的。就是这样，邓锦辉在严寒天气和温暖人情的不同际遇下，实现了步行全国，磨炼意志的愿望。

请缨从戎 参与抗俄

邓锦辉到达东北边境后，步行之举结束了。其时，正值俄国因中东铁路主权问题，在海参崴一带向我挑衅，我东北

军统帅张学良，派韩光弟、梁忠甲两旅抵御。邓锦辉激于义愤，请缨从戎，被编入梁忠甲旅，同冯庸大学的志愿军一道，参加战役。战事激烈，因敌众我寡，韩旅长壮烈牺牲，韩旅几乎全军覆没，而梁旅长和其部下，全旅被俘。冯庸学生及邓锦辉也被俘虏，囚于俄境。邓锦辉负了伤，被打断了四个手指。经过3个月，战事平息，释俘。邓锦辉留在东北治疗。他这爱国行动的消息，传到南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南旋回粤，《良友画报》记者抢先采访，在报上用大量篇幅刊载其步行全国及抗俄事迹，誉他为“少年英雄”。邓锦辉返回广州次日，即在青年会公开演讲，其讲词刊载于《广州青年》上。广雅、培正等校亦纷纷请其演讲。其后，邓锦辉在广雅任童军教员，“七·七”事变时仍任此职。

任青年会战时救护队长

“七·七”事变，广州受日机轰炸，青年会为受炸灾民服务，及时组办战时救护队。由干事刘君朴办理，请邓锦辉为队长，英华中学童军教员吴文伟为教练，曾恩涛医生讲课，李拯中为秘书，队员50人，皆在学的中学生，义务担任。所需药物、器械由广州扶轮社捐助。他们一面训练，一面进行救护。邓锦辉一闻轰炸，即从顺德广雅跑来。几日后，迁到青年会队部。队员亦相继赶到队部轮值。全体队员在邓锦辉热情、勇敢的带动下，只要一听到空袭之声，即奋不顾身地奔向灾区进行抢救工作。常常在敌机未遁，便飞到灾区，亦常常将伤者送到医院抢救，才看到别的救护队出来。市民都称青年会的救护队办得好。

任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团团长

“七·七”事变，青年会总干事李应林发起组办两个服务团队：在市区的为战时救护队，在战地的为随军服务团。第一届随军团由干事李赞华为团长，出发江苏东战场，随同邓龙光、香翰屏部队服务。抵江苏，恰遇日寇疯狂进犯，乃随同部队退至湘东。后改为该处的后方部队服务了3个月，乃南旋。是届团员12人，多是文化界人士。

次年，青年会干事部拟再组随军团，由干事谢琼孙征得李应林（其时李任“岭大”校长）同意后，专程赴港，同香港中华青年会协商合办事宜。很快就取得同意，并订出下列协议：1. 定名“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2. “粤会”负责办理会费；“港会”负责筹募会费。3. 成立委员会，由两会董事各选2、3人担任。会长为委员会主席。成立执行干事部，由两会干事各2、3人担任。委员名单已定，乃由两会同时在粤港两地发布新闻，宣布成立。人员推定如下：粤会委员为潘聚东、李应林，潘为主席。执行干事谢琼孙、刘君朴、张宗象。港会委员为林子丰、李承恩，林为主席，执行干事为赵甘霖、邓显毅。人员既定，粤会即征得邓锦辉同意，聘请他为团长。港会派赵荣光为副团长。邓锦辉接受任务，立即进行组织。团员50人，不待发通知便已满额。他们一面装备，一面训练，迅即组成。港方亦即展开筹募慰劳品、用品及经费。

全团组成后，在青年会礼堂举行感人的誓师出发大会。省、县各界向前方战士及本团人员赠送锦旗，共有140余面。挂满礼堂，异常夺目。大会由潘聚东主持，李应林讲述本团

组办的目的后，并由他代表委员会进行授旗，授章、盟誓。由邓团长率领全体团员肃立举手，庄严宣读誓词。继由各县代表致词。礼毕，鸣炮出发。由委员及各县代表领队，沿途高唱抗日歌曲，步伐整齐，群众围观如墙，沿长堤到达黄沙火车站。群众欢呼一片，极为热闹，慰劳品达半个火车卡。

是届，青年会称为第二届，出发南浔线随九战区薛岳所属李汉魂叶肇部队服务。安排在前线工作，电影队由谢子祺负责。在南昌，随商震部队工作，刚到前线，听到广州沦陷消息，团员们仍是安心工作着。邓锦辉在前线4个月，返港再组新团员。邓锦辉临行前，受新任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之托，持信给青年会，请其赴韶设会。邓锦辉一面赴韶关黄田坝设立团部，作为前后方联系及团员休整之所，一面把团员分配到南雄干训团、南雄后方医院及由吴菊芳主持之儿童教养院工作。

第三届，出发粤北，随余汉谋部队服务。青年会赴韶后，组织第四届团员，也分配在粤北。第五届仍在港组团，出发粤北。其次，一部分留在粤北，另一部分由邓锦辉率领到广西随张发奎部队服务。第六届由香港出发广东南路，随邓龙光部队服务。香港失陷，随军团失去港方接济，韶青年会派执行干事张宗象携款到肇庆，通知邓锦辉来韶集中。至此，随军团乃由李应林主持，后来随军团被移交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接收。随军团组办了6年，服务战区有江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5个省份及地区。参加团员先后共165人。抗战以来，由民众组办的战地服务团队，可称长久。邓锦辉在结束移交后，改在青年会干事部任职。

在青年会服务期间

邓锦辉任青年会干事，担任智育及社会服务工作，一样

表现积极。在青年会里无论是由他自己主办的，或是协助举办的事业，他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很好成绩。他所做的有下列诸端：

①李汉魂要求青年会在韶设会，历时6年，溯本追源，因得邓锦辉居中努力才得以实现。

②青年会在韶工作的6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原因是取得了大量军政人士的大力赞助。而军政人士中，多由邓锦辉随军几年所联系得来的。

③韶关黄田坝随军团、团部的大片土地，青年会得设“黄田坝工区”，在此建筑能容二百人住宿的归侨宿舍、露天游泳场、球场、空袭休息处、施粥处等，拓展了青年会在韶工作的场地。

④韶关青年会在韶成立，邓锦辉协同干事部，得伍千里、赵如琳等艺术界人士之助力，举办了很有规模的抗战画展，为初到韶的青年会鸣锣开道。当时参加美术作品展览的有桂林行辕郁风、梁永泰、黄苗子等，长官部伍千里、李少华、林慕汉等，艺术院赵如琳、吴婉等，其他方面刘仑、蔡迪支等。他们的画，琳琅满壁，被人们誉为战时文化活动的春花，抗日的武器。邓锦辉为协助筹备，由前线跑回，即同美术界联系。并与伍千里，陪同张发奎、蒋光鼎两位司令长官，来会参观。

⑤参与以胡翼云牧师为团长的粤港基督教慰劳团。慰劳四战区张发奎司令长官。邓锦辉协助组织、联系及参与慰劳。此活动在长官部举行，先由邓团长率领全体团员，向张将军起立致敬、致词、奉献慰劳金，继由团员卞磐石医生向张将军奉献圣经。张将军致答词，向团员们表示感谢。

⑥举办战利品展览。粤北大捷，收获甚多。随军团部分

团员伍子辉（伍旭）等，随着前沿部队工作着。邓锦辉乃征得前沿部队151师长林伟传、156师师长赵福如等同志，把缴获日寇的战利品载满了一汽车，由邓锦辉及部队人员押来，到达青年会，举行战利品公开展览。群众们看到屠杀我国同胞的凶器，看到迫害我们的枷锁，敌忾同仇，大大提高爱国觉悟。人们从远近而来，时时刻刻会场都是爆满的。

⑦疏散中几件事：1944年春，韶关疏散。青年会的李应林由仙人庙跑来韶关，提出要找一适宜地方，作暂时疏散的准备，于是由董事潘允和，带到他的家乡枫湾水村等地考察。同行的除潘之外，还有李应林、骆爱华、谢琼孙、邓锦辉及杨远拖等。看到枫湾条件具备，那里有山、有水、有溶洞、有圩镇、有村落多处，交通亦方便。邓本人，久历战地生活，并曾钻进溶洞看看，他认为有枫湾这样的条件很难得。结果，8个月后，著名的“枫连线”疏散救济工作，在枫湾办了起来。

在疏散中，邓锦辉与骆爱华合作，举行时事报告会凡三个月，除周末外，每晚举行。

在疏散期间，邓锦辉邀请青年美术界人士，由他供给材料，根据获知的最新的世界大战消息，绘制一幅幅的大地图，让群众知道大战情况，每每几日换一次。这样做，使得群众在疏散中仍频频跑来青年会。结果，青年会常常人头涌涌，在疏散的氛围中仿佛是个旺市。

⑧“枫连线”冒雪开站。十日后，王以敦在水村召开委员会会议，议决疏散线路伸展到东江。邓锦辉乃按照委员会的决定，组织了16人，沿曲江枫湾至小坑，时值隆冬季节，大家冒雪开站。边开站，边前进。经始兴，翁源直达连平。在枫湾至连平一线上，共建起了11处难民营站。故称之为“枫

连线”。青年会干事部对这项工作，全力以赴。邓锦辉的打前站任务完成之后，他便在全线巡察，着重是翁源、连平地区。“枫连线”上的救济工作办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共救济4万人次往东江而去。

⑩紧急救济整顿市容。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青年会首先由邓锦辉、谢琼孙及一些助理人员，兼程回穗，接收会所。前时，青年会会所已为日寇占作军用电讯器材工厂。产品及原料塞满会所，原来家私和用具不知去向了。邓锦辉、谢琼孙首先进去住了一晚，当晚睡在地上，找了一块木头作枕头，这已很不错了。至此，看来此会所无法接收了，其后，乃找到一德路466号大楼，作为青年会临时办事处。其时，新任市长陈策，依照原先的计划，把全市紧急救济工作委托青年会去办。邓锦辉任总视导，经常巡视急救会所属的20几个单位的急赈工作。其表现较突出的是，在紧急救济展开初期，邓锦辉组织人员，预备车辆、竹扫把、水桶等物，协同原来的掩埋队，沿太平南路（人民南路）、西堤、长堤、南堤一带，收拾饿殍，打扫肮脏地方，把先前沦陷的受灾区，清洗得干干净净，市容为之一新，经过两日的忙碌共收拾了饿殍40余具。

邓锦辉的另一项市容工作，是同邓明开办乞丐收容所，教养乞丐。凡流散市区的乞丐，皆收容入所，不准其到处隐藏。经过上述两项工作，市容得到了整顿。

市紧急救济工作结束之后，邓锦辉离开了工作10年的青年会，改任《大光报》记者了。

南岭煤矿的春秋

刘玉泉

南岭煤矿位于广东北部、湖南南部的南岭山脉之南，处于广东省的乐昌县、乳源县、湖南省的宜章县交界处。是江南地区开办较早的煤矿之一，也是广东省唯一的烟煤矿。

据《今世中国实业通志》和《宜章县志》记载，南岭煤田的发现，始于100多年以前。但据湖南省宜章县关溪乡狗牙洞一带，世居此地的老农相传，在清代光绪以前，就有商人或农民开土窿挖煤，用以炼铁和烧石灰等。乐昌县梅花镇及秀水乡的关春八字岭一带老农也认为，100多年前就有人在八字岭挖煤，关春一带则开发较晚，约始于50多年前。现有姓名可查的就有：1937年5月，商人林礼在关春张家山开办煤矿；1947年8月，袁某在关春丝茅窝开办振兴公司煤矿。但都是小型土法开采，产煤量很少，其开办时间也不长。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要算民国三年至十三年（1914—1924年），广东商人陈廉伯、简英甫在狗牙洞开办的地利公司。

陈廉伯、简英甫何籍人？未考。仅知其在梅县办有金属矿，陈廉伯在辛亥革命初期曾积极赞助革命，购买10万元公债，受到孙大总统的表彰。

地利公司开办时，投资银元100万元，有工人800多人，备有4台60匹马力的水泵和80匹马力绞车。打了3个探钻，

现煤3层，开凿了竖井1个，园径18英尺，深334英尺，开平洞两个，斜井1个。日产煤最高100多吨。所开采的煤，用人力挑到石灰冲载船运至韶关，再由火车运到广州推销。该公司还办了炼焦厂，有土法炼焦炉15座，每炉入煤28吨，出焦15吨。后来因运输困难，加之连遭抢劫，损失170多万银元，于1926年破产。

民国十七年（1928），有中国商务公司想在地利公司原开办处办煤矿，因局势动荡，生产、运输条件不利而告吹。

民国二十四（1935）年，广州开办钢铁厂，因广东省缺乏煤源，广东省政府建设厅派郭方瑞、邝嵩龄两人与湖南省建设厅磋商，并经实业部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核准，同意在狗牙洞、八字岭采掘，并获得了169公顷80亩的采矿地权。于是，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粤北公司，在狗牙洞和八字岭建起了矿厂，共有职员39人，工人121人。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省政府机关纷纷疏散，无暇顾此，耗资银元30多万元，基本上没有正式投产。

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944—1946年），广东省政府邀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股开办了粤北工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资委会代表翁文灏（前资委会委员），广东省代表宋子文（广东省省府主席）（注：在《乐昌文史》第4辑误写为谢文龙）。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长谢文龙（广东省建设厅厅长），董事孙越琦（后为资委会委员长）、侯成华、谢群冰、白深檀、李卓、吴兆洪、许本纯。监察邹琳、张峻（资方）、李树农、丘誉（广方）。总经理田策卫、协理谭仁、白深檀。

粤北工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为10亿元，广东省占40%，资委会占60%。到民国三十六年，资委会增拨158亿

元，广东增拨2亿元，恢复了狗牙洞平洞和竖井的生产，并在八字岭开凿一、二、三平洞，在坪石（现电厂背后河边）开办了铁工厂。

因为矿区煤田处于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为避免人们在地域上的误解，自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一日起，将粤北工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南岭煤矿有限公司。此时正值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故有人谓南岭煤矿有限公司是宋子文开办的，其实并非如此。南煤公司设在现坪石镇，开有狗牙洞煤矿厂、八字岭煤矿厂、白茅洲煤矿和铁工厂，共有职员、工人800多人。据当时资料统计煤量：1947年1769吨，1948年4270吨，1949年7402吨。开采方式有竖井和平洞。铁工厂主要任务搞矿山机电修配。

1948年，南岭公司修了狗牙洞至宜章县粟源堡包公庙公路10.05公里，修八字岭矿区至火烧坪公路5公里，还有狗牙洞曾家寮轻便铁路2.5公里，开始使用汽车运煤至坪石转火车运往广州。1948年11月，动工修建南岭支线铁路，从坪石经葫芦口至曾家寮，全长36.5公里，到1949年7月28日试行通车运煤。公司下的矿厂配有汽车、小火车、水泵、绞车等机械，1948年还配有美式电矿灯和矿帽。为方便指挥生产，公司在狗牙洞新建了办公楼。当时机构庞大，有一套组织系统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其组织机构见后（附表）。

其主要管理人员有：

田策卫，总经理，湖南平江人，晨光学院文学系毕业，
谭仁，矿长、协理兼总工程师，湖南长沙人，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毕业；

吴志羲，工程师兼副矿长，四川巴县人，国立西北工学

院毕业；

焦纯平，秘书，安徽和县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

施穆甫，总务室主任，安徽桐城人，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

李赋，业务主任，广东揭阳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

此外，还有郑锡九副经理、张伯颜协理、白深檀第二协理兼广州办事处主任。公司所设各室、课的负责人则有阮思聪会计室主任、杨铭恕工务室主任，曹肇球工务课长、舒隆生财务课长、陈绍平材料课长、解晓夫煤务课长、陈修立统计课长、彭世琼土木课长、郭应龙机电课长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公司有职工1061人，矿警156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有职工1546人，形成人数的最高峰，其中监工22人，测工16人，汽车司机、机匠、助手22人，公路土石工950人，矿厂木工127人，炼焦工23人，井下工350人。1949年末，有职工1214人。

南岭煤矿在解放前的历史上，其用工都是“把头包工制”。无论地利公司、粤北公司、粤北特种工矿股份有限公司到南岭煤矿有限公司都是如此。前三个公司的把头已不详，现所知的南岭煤矿有限公司狗牙洞矿就有把头6个：刘梅轩，带有46人，多是江北、河南、安徽等籍；孙大成，带有30人，均为外省籍；刘绍初，带有56人，多为湘南籍；尹爱仁，带有56人，多为湖南湘潭籍；吴少棠，带有32人，多是外地各省籍；张步文，带有43人，多为四川籍。把头每月领公司日资银元5角，还补助领班工2人，司账1人，勤杂工3人，共领6人薪饷，每日共银元2元7角；每月还按包工工程量收公司10%的管理费，收入是可观的。

工人则十分艰苦，住在由把头搭就的杉皮架棚内，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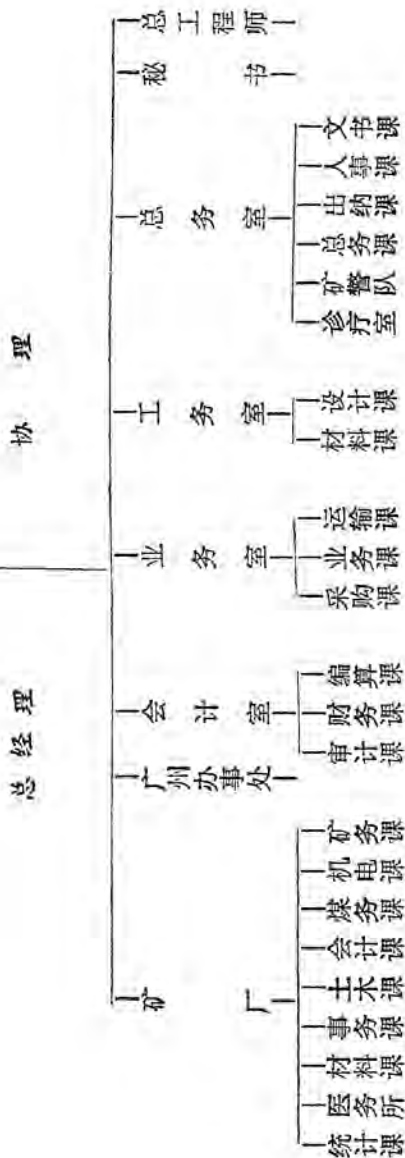
头分成二至四层的碌架通铺，每人只得约0.7米宽的位置，吃住由把头设一专人统理炊事，每人每日2斤米，到时分饭菜则各人自备，在木柱杉皮的厨房里，摆一木案，一块切菜板，一把菜刀、轮流使用。洗澡的热水只用煮饭后的锅头烧上一锅分给。工人劳动及生活都不停地遭受到折磨，尤其是下井的更惨。工人下井采煤，全无劳动保护用品，光着身子，赤着脚，一用一块布围着下身，这块布下井后改作护头巾使用，整个生产过程，全凭人力，手镐采煤，肩头运煤，自然通风，油灯照明，工人的伤残病死，毫无保障。直至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

1949年10月28日，一声春雷，南岭宣布解放。1950年4月，改名为南岭煤矿。1957年1月1日起，隶属广东省管理，1959年10月，成立坪石矿务局，隶属煤炭部管理，1963年10月，又由煤炭部下放到广东省管理至今。

解放后的南岭煤矿，万象更新，生产蒸蒸日上。所产原煤和焦煤，全部用于广东的工农业生产，同时也对湖南宜章的关溪、岩泉、栗源，以及粤北乐昌的梅花、秀水、坪石等区乡，在农业水利建设、用电、发展乡镇企业、开发交通、安置就业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援，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刘玉泉1956年起在南岭煤矿工作，曾任矿办公室主任、矿区工会副主席，现是矿志办副主任。）

附： 粤北工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表
董 监 事 会



乳源瑶、畲族房屋及桥路建筑

许化鹏

乳源瑶族自治县境内，有瑶、畲两个少数民族。瑶族现有1.8万人口，主要居住在县境东北部和中部的崇山峻岭之中。瑶区总面积424平方公里。畲族现有400人，其中近300人居住于县境西南部洛阳乡的深洞。

瑶族房屋建筑

乳源瑶族的村寨分布在群山中的山头、山腰、山坑、田峒、山窝之间，高度一般都在海拔500米以上，有的高达海拔1000多米。瑶族一般以姓氏为基础，小聚居，大分散，“流布岭表溪峒间”，随山散居。房屋依山傍险建筑在半山腰。村寨有大有小，大的有近百户，小的仅二三户。清朝以前，多“茅舍板屋”。随着社会的发展，瑶族房屋建筑也不断从“茅屋穴居”向砖瓦屋过渡，“间有露处”的历史也告结束。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瑶人之建筑却依然保留着其独有的格调和原始的色彩。今瑶族人保存较久的房屋多是清末或民国时期所建造的。

一、住屋。有平房和楼房两种。

平房：有多间平列和单间独立两种形式。多间平列式有三间五间，多则七间九间相连成排，每间内外建筑一致，门

户并列，式样一律，但正中间的门户退入一米左右。各屋除有大门出入外，亦有小门与左右间互相通连。屋后，建有安放水槽和洗澡的附属建筑。单间式的其样式与多间式的形式一样，实则多间式的一间，屋后亦有附属小屋放水槽。

建筑方法和材料，屋基就地挖尺许深坑，用石块砌筑墙脚，离地面高三四十厘米或再高一些开始用泥砖（用木模架压实粘土，使之成型，然后脱模取出来晒干，外型尺寸一般长30多厘米，宽20多厘米，厚10多厘米）砌筑。也有春墙（即干打垒）。建筑技法比较粗糙，且墙壁又不批荡，砖痕裸露。屋的高度一般为3米左右到檐口（滴水）。悬山式顶，无柱拱。上盖杉树皮、茅草，也有盖瓦者。多间排列的正中一间和单间的厅中间建炉灶，墙上设有神龛。所有梁檩、椽子和门窗的木料全部系杉木。

屋的实际使用上，厅也即是厨房，卧室又同时堆放杂物，实为混合使用。屋内，因低矮和窗户狭小而较阴暗，尤其炉灶日夜烧火，又无排烟孔道，火烟笼罩屋中，烟尘挂满墙壁。屋外，屋檐滴水且无阴沟，因房屋建于半山腰，水自能流下。最妙之装置则为引泉入屋，瑶人家家家户户都用大竹戳穿其节，一根根地连接起来，从山间将泉水引至屋后的小屋，流入水槽储水，供洗涤和饮用。

楼房：有上下可居人者，这种建筑一般为较富有的人家才建造。建造方法与单层屋基本相同，基脚砌石块，墙壁砌土砖，离地面两米多高架楼梁，铺楼板。楼房的高度至滴水处一般4米以上，悬山顶，盖杉树皮或瓦。楼内有梁无柱、无拱，不设炉灶。另有一种谓之“吊脚楼”，即在斜坡处起屋不用平整地基，随斜坡立起木柱或用石垒起柱子，柱子下段架横梁与柱脚上方的斜坡地呈平，铺上木板，四边多用水

板或用竹篴代替墙，上构木架盖上杉树皮。这种楼只利用楼上，用以住人或放物。而楼下实际是呈竖三角形的斜坡空间，无从利用。还有一种两层屋，这种房屋下截用石块砌筑，上截砌泥砖，上盖杉树皮。上层住人，下层养猪，保留着古人所谓的“上楼下牧”的原始色彩。也有上层用来堆放杂物，下层养猪或者两层都堆放物者。瑶族人的“田寮”，大多是这种建法，其实际使用上，有上层住人下层放物或者两层都放物的。

二、粮仓。瑶族人存放谷物等粮食储仓，设在住屋邻近，一律与住屋隔开。粮仓均用杉木板相拼做成。仓底用木桩或砖石作脚柱，使整个仓悬离地面。仓做成四方形，四角贯木方，再用木板构成仓壁，其中的一面留仓门。仓顶另构支架盖上杉树皮，多为双坡滴水。仓有单间式或双间式和多间式，多间式一字排列。规格每间一般为1.5至1.8米正方。

三、碓寮。瑶族人引用山坑的泉水安装水碓，就地用木或竹搭架，盖上杉树皮或茅草，即成碓寮。

四、猪牛栏。瑶族人独立建造的猪牛栏，设在住屋邻近。用木搭成屋架，再横装以劈成对半开的木片作墙，上盖杉树皮或茅草。再一种，将地坎挖进数尺，挖成长宽二米左右的方坑，上搭架盖以杉树皮或茅草，构一简单的栅门即作牛栏。

五、厕所。瑶族人的厕所均设在住屋的后面或邻近，用木或竹搭成架，盖以树皮或茅草，极低矮。粪池有就地挖成的土坑，也有悬地坎盖的厢所，下放一烂水缸或烂铁锅作粪池的。厕所门有用竹篴，有用杉树皮做成。人上厕所，须躬身方能入内。

瑶族人的房屋，皆因地势而建筑，在较平坦的地面建成

三五七间成排，山坡地面狭小处则一间或两间。瑶族人建屋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门前不得有物遮挡，故瑶人建屋于斜坡上，前栋与后栋，地基高低相差很大，后栋屋的地板往往高出前栋屋许多，甚至超过前栋屋脊。若有数十户人家的瑶寨，从下向上望，层叠递升，扶摇直上；从上往下看，穷低速落，建筑而下，颇具特色。房屋门窗均开于屋前，窗的位置在门的两边。瑶人村子无论大小，并无公厅众院、香火祖堂之类的公共场所，亦无围墙、街巷、廊门等。

纵观瑶族人建筑之特点，既“简”又“散”。“简”即简单粗陋。这是因为：一、历史上瑶族人迁徙频繁，刀耕火种，“吃尽一山则移一山”。居住地点不大固定，每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山坡上选择一块地基随便搭盖一个暂时的住处。二、瑶族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山高路险，砖瓦等建筑材料自己不会烧制，要到汉区购买，来之不易，而且经济又非常困乏，只能就地取材，用杉木、杉树皮、茅草、竹子等搭盖房屋。三、瑶族人过去有文化的人极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对生活吃住的要求还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境地。

“散”即杂乱无章。瑶族人建屋随意性强，不求规整，随心所欲而搭建。

而瑶族村寨最有特色之处那就是“茅舍板屋”。杉木、杉树皮、竹子、茅草是构成瑶族房屋建筑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是瑶山的丰富资源，瑶人随处可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法令。1963年成立了乳源族自治县，乳源瑶族地区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瑶族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瑶族房屋很多从原来盖茅草、杉树皮改为盖瓦，部分家庭在新建房屋时用上了火砖。

旧的格局也逐渐更新，有些村寨的一些瑶人建起了较高和明亮宽敞的单层屋或二层楼房，墙壁也用灰砂批荡和白灰水粉刷，新建房屋时有计划地趋于规整。

瑶族地区桥路建筑

乳源瑶山，山高路岖，瑶族人民居住在深山之中。每一个自然村由狭小的山道连通，这些山道却都是瑶人依山势开辟的。小道或就山间原有之岩石凿为阶梯，或用大石镶入土中使可踏足上下，所凿之石梯或所铺之石级，均不将它打磨光整。山道弯曲崎岖，穿崖越涧，有的地方是悬崖峭壁，下为万丈深渊，小道通达其间，人行如攀檐走壁，非常惊险，必须小心谨慎。有的路段陡峭壁立，人须攀藤而上，蹲身而下。

乳源瑶山四处有山道通往汉区，其中有条横亘瑶山的古道：一是狗尾嶂古道，此道西头为大桥汉区，东头系桂头汉区，横贯瑶山的狗尾嶂峰巅、公坑、杨梅浪、中心洞等地，全程约40公里。一是柳坑至东坪的古道，东起柳坑乡，西至东坪乡，途经塘肚岭、营坑、大寮坑、鸡竹园、茶山口等地，全程约30公里。古道有泥路段，石铺路段，逶迤曲折，狭小崎岖，只能容单人步行。

瑶山山高谷深，岭涧水流成溪。其中有必背、游溪河等较大的溪流。溪涧与路的相交处一般都架有便桥。除狭小溪流上之木桥系用两片厚木支架而成外，较大溪流之上，长达二三十米的桥之建筑也同样以木搭架架设。即用大圆木四棵搭作两支架，架与架间及架与岸间用长数丈之大木，四周削平，三棵连贯安放于架上。每座桥除支架之外，只须用大木

九株即可造成。桥上每段三株大木，两端用二小横木嵌入，将之联串结实。圆木支架之构造也极为简单，以两大圆木作八字形，上段各凿一方孔，用横木穿入孔中固稳即成。木架在溪中亦不栽入泥里，即插入大石逢中再以小石夹紧。其建造虽极为粗陋简单，但却坚固平稳。这种简易建桥法由来已久，据有碑记载的游溪子背村龙古坑桥，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其后数年换木一次。

历史上，也有瑶、汉两族人共建瑶山桥梁的史实。据今存一块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立的《重修桥碑》记载，清乾隆三十年，游溪乡中心洞木笼桥，由当时的盘、赵、邓、李、张、曾、杨、朱、周、何、熊、尧、黄、陈、邢、马等姓瑶汉人共同捐资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乳源瑶山乡镇以及部分瑶村已通公路，大溪流的桥梁用钢筋混凝土建造。

畲族房屋、拱桥

乳源畲族人按姓氏聚居，如今洛阳乡深洞的蓝屋村，居住的是纯蓝姓的畲族人。其房屋建筑形式与当地汉族人之建筑基本相同，选择平地建房居住。建筑格局及形式，村子正中是香火祖堂（又叫厅厦），祖堂正面墙做神龛安放神位。祖堂为上厅，往前有中厅和下厅，外面是大门。大门一般是整个村子出入的主要门道。从大门至祖堂，是全村建筑的中轴，居家依附祖堂分建于左右两边，栋宇整齐，排列有序。祖堂前截和居家门前与前厅之间的地方设天井。建筑用石块来砌墙基，用火砖砌了一米多高后再用泥砖砌筑到屋顶。有的整堵墙均为火砖砌成。木梁桁，盖瓦，悬山式顶。房屋高

度从地面到檐口（滴水）一般4米以上。居家住屋设二楼，祖堂设柱拱。一户人家一般有专门的吃饭厅、卧室和厨房。猪牛栏设于住屋邻近，厕所做在村子外面，多为泥砖瓦屋。

蓝屋村的左边有一座石拱桥，名叫“福龙桥”，长14米、宽2米、高3.5米，拱跨4.5米。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系用打制成长方形的青石块建造。桥头立有建桥碑，记载当时蓝姓畲族人和当地其他姓氏汉人共同捐资建桥的史实及捐资人名单。

对武溪公园的回忆

李竹园

韶关市旧为曲江县治，文化颇为发达，原较有名的风景点有十处。不少文人雅士，在良辰佳日，免不了各处游赏寻兴。可惜陵谷沧桑，旧时风景，先后沉寂，或因荒废，仅存形迹；或因变迁，已无可寻。吾童年时还知有吕祖阁、九成台，但其时亦已荒颓不堪，其形胜风貌，落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新建的“武溪公园”。

武溪公园是1933年李汉魂出任广东省西北区绥靖委员公署要职时倡建。园建在武江左岸关帝楼的左方，面积只不过半亩，但其设计精美，园内亭台花木，用假山相间，砖木架相叠，足可有亩余容量的地方。其结构仿佛仿照前人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闲情记趣园艺部分。名花异卉，千数百计，疏密高低，各得其宜。围墙旁植以桃、李、杏、柳，安排整齐有序，不觉其滥，适当地方还设具休憩坐具。

武溪公园紧接关帝楼左下地方，背阁临江，不仅风景优美，还感到非常雄壮。园右角为长廊，占园六分之一长径，颜曰“诗境”，竖碑石十数块，最高2米以上，低者亦不止1米，正、草、隶、篆、字体齐备，正楷居多，碑石均是青坚麻石，为首第一块即为东坡笠屐像，阴纹线条，缕缕分明，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块是禁伐林木，保护水源，碑是先祖父占春公领衔票请上宪批准的，其他不甚记忆，似有三二块移

置在南华寺灵照塔四周的壁间。廊前栏杆，供人俯瞰，下见河水澄澈，绿油如镜。那时韶关两河过冬犹水涨，武江水绿，浚江水红，民间传说武江因关帝绿袍角拖水，故常绿；浚江因天后红袍角拖水，故水红。其实，原来武江上游河床为沙石质，所以河水油绿；浚江上游河床是黄泥土质，所以河水橙红。今则污染关系，完全不同了。当时武江尚未建桥只用渡船载人过往（后来架起浮桥）。每到傍晚，凭武溪园栏杆展望，西左角上的芙蓉山，红日半吞，园背后的皇岗山帽子峰微茫渲染，船经中流，红霞成一直线照映水底，构成一幅艳丽绝伦的扁舟夜景图画，于今回思，令人向往。如在月夜欣赏，又另一境界，水天一色，园月交融，身在园中，影在广寒宫里，此际佳妙，非笔墨所能形容。

特别武溪公园大门左角有一石径，两旁植有石榴树。每当春夏，树叶繁盛，花红点缀，成为一条幽美阴翳的芳径，径尽处，种有翠竹数株，牌示潇湘，要到此观赏，四周不通，必须沿径前进，又要低头而过，我曾有诗：

带飘裙履径深幽，欲到潇湘必此由。

倘得垂青甘下拜，何妨过此一低头。

盖用拜倒石榴裙下典故的意思，时予方十八九岁少年，故有此艳思诗作。

武溪公园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背阁临江，左芙蓉，上皇岗及帽子峰，山明水秀，加以一渡中流，实是韶城一处美胜风景园地。园成日，曾征诗编成卷册志盛留念，当时我曾献诗二律，载入武溪公园特刊，其中诗句有：

“武溪园里栽新卉，诗境廊中列古贤”。

“一泓绿水波千镜，半亩芳园花百丛”。

如此美好的芳园，不幸于1941年被日寇飞机所炸，关帝楼倒

塌，武溪公园荒废，名园建造不十年竟毁于日寇的疯狂轰炸，日寇侵略中国的罪恶，实在令人切齿发指。

忆昔日，我适在绥靖公署工作，晚上闲暇，多到园中观赏，有时深夜才归，感情实厚。园被炸时，我在西江肇庆，闻讯顿足痛惜。后我回韶每过其处脑际旋转园楼形影，曾有诗句吊念：

“每过园楼疑宛在，斜阳犹恋改途中”！

其园楼原址，即在今时建造的“沁苑”附近，风景胜概，不减于武溪公园当年，苑背一带高楼，高出关帝楼两倍，更见雄伟。每当春夏佳日晚上，游人如鲫，往来频仍。我常去欣赏，曾先后得诗二十余首，有三数首已刊载在《韶关日报》上。今录拙题“沁苑”一首，以见赞叹情怀：

韶关佳胜著西堤，“沁苑”浓阴与颍齐。

百尺栏杆行不尽，立身处处有诗题。

长江商团军

仁化县长江商团军组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负责人是郭济平，官兵共30名，有残旧步枪30支，队伍驻扎在“营盘”（土名）即现在的长江食品站养猪场内，经费由长江纸行供给，其任务是押解银帮和保护纸行商家的利益。

成立商团军时，铸有纪念章，银质含钢，圆形，直径41公厘，厚2公厘，重6.2钱。章的两面均铸有图案和文字，并有编号，章的上端铸有两耳小孔，用于别在衣服的胸前。

刘森华

鸣 谢

本刊在编纂第十七辑文史资料——《襄公风采誉神州》时，曾得到韶关市博物馆的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资料，特此表示感谢！

编 者

更 正

1. 本刊第十六辑第106—107页中的“刘健行”应为“列健行”。

2. 本刊第十七辑第60页倒数第九行中的“使喧朝野”应为“传喧朝野”。

编 者

封面题字 赵朴初

封面设计 苏广赞

编 辑 苏广赞

汪 波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八 辑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2 粤印准字第 22 号

邮政编码 512002